

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JOURNAL OF YUNNAN INSTITUTE OF SOCIALISM

2022
第2期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收录期刊
《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全文收录期刊
《中国期刊网》全文收录期刊
万方数据——数字化期刊群期刊
《中国核心期刊（遴选）数据库》收录期刊
超星学术期刊“域出版”收录期刊

2022年6月 第2期(总第94期) 第24卷
Jun.2022 No.2 Sum.94 Vol.24

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二〇二二年六月第二期(总第九十四期) 第二十四卷

云南省社会主义学院与云南开放大学 签订合作框架协议

4月21日上午，云南省社会主义学院与云南开放大学合作框架协议签订仪式在省社会主义学院三楼报告厅举行。省政协副主席、民盟云南省委主委、省社院院长徐彬，省委统战部副部长李涛，云南开放大学党委书记罗国权，省党外知识分子联谊会会长、云南开放大学校长郑毅，副校长杨丽宏、顾丽姝，省社会主义学院党组书记蔡勇，常务副院长何云葵，副院长陈友康，一级巡视员袁光兴，党组成员、秘书长谢灿坤出席签订仪式。省社会主义学院常务副院长何云葵与省党外知识分子联谊会会长、云南开放大学校长郑毅代表双方签订协议。仪式由省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陈友康主持。



双方一致认为，在迎接党的二十大召开的重要时刻，签订合作框架协议是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社会主义学院工作条例》及省委印发的《贯彻〈社会主义学院工作条例〉实施细则》的重要举措，也是推进开放办学、合作办学的重要体现。双方一致表示，将围绕课程开发建设、线上教学、科研项目、云南省“学分银行”建设、面向南亚东南亚的中华文化研修和文化交流等方面开展深层次、全方位的合作。

郑毅首先介绍了云南开放大学的历史沿革和近年来取得的办学成效，他表示，本次框架协议的签订是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高校提出的“为人民服务，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服务，为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服务，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四个服务重要思想的具体体现。



双方将在共同推动人才培养与素质提升，推动新时代两校事业高质量发展，进一步服务好党的统一战线工作，为实现民族复兴伟业不断做出新的贡献。

何云葵表示，省社院与云南开放大学合作，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和对云南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服务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建设、深化云南对外开放的务实之举。双方将立足新时代云南开放教育发展需要和统一战线人才培养需求，充分发挥各自优势，整合利用优质资源，促进优势互补，推动形成面向更广阔未来的联合办学、开放办学新格局，努力为推动云南高质量跨越式发展，谱写好“中国梦”的云南篇章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JOURNAL OF YUNNAN INSTITUTE OF SOCIALISM

季刊·2022年第2期(总第94期)

本刊顾问

杨保建 徐 彬 高 峰 李玛琳 喻顶成
张宽寿 杨 洋 李学林 杨晓红

编辑委员会

主 任:蔡 勇
常务副主任:何云葵
副 主 任:陈友康 杨春禄 袁光兴
委 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寅平 李从贤 杨松禄 钟瑞华
罗建生 诸 芳 谢灿坤 魏贵华
主 编:陈友康
副 主 编:杨松禄

编辑部

主 任:杨松禄
副 主 任:罗 雷 李亚强
责任编辑:念兴昌 刘林华
英文翻译:李志凌
封面设计:严维国
编 务:郭周静

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目 次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 新时代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终身教育的五个向度 邵鹏峰 (5)
- 中国共产党对青年价值引领百年历程的目标变迁及其启示 徐喜春 (13)
- 新时代科学家精神的内涵阐释与践行路径 毕俪文, 王文浩 (21)

●统战理论与实践

- 香港特别行政区宪制中文化主权的规范诠释 张 博 (28)
- 人民政协统战工作的优势与作用论析 李旭辉, 江生亮, 周可嘉 (36)
- II型大城市网络人士统战工作研究
——基于湖南常德的调查分析 罗米娜 (46)
- 论民主党派机关中青年公务员的成长 李续亮 (52)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 台胞国家认同的重构路径探析
——基于对“两岸族”台胞的深度访谈 邱鸿博 (60)
- 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创建理路与实践的云南探索 张志远 (72)
- 长征时期中共对云南民族工作的探索与实践 赵玉春, 赵善庆 (79)
- 秦汉时期西南民族融入中华民族研究 马宜果 (85)

[期刊基本参数:CN53-1133/D*1999 *q*A4*120*zh*P*¥9.00*1000*15*2022-02]

●历史与文化

云南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及保护问题研究

——以迪庆藏族自治州为例 杨绕才 (91)

以微显宏：名人故居的国家叙事与文化实践

——以昆明市聂耳故居为例 罗夏梓平，孙俊烈 (99)

●云南故事

云南统一战线历史文化宣传宣讲的特色优势与实践路径 念兴昌 (107)

沧源“班洪抗英斗争”红色文化历史意义及其时代价值探究

——对“八月回信”精神内涵的学习思考 杨逸平 (115)

《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声明

《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以下简称本刊)刊发的文章,内容及观点均由文章署名作者自负文责,不代表本编辑部意见。本刊保有对来稿的编辑修改权,若不同意编辑修改,来稿时请特别声明。本刊已许可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在中国知网及其系列数据库产品中以数字化方式复制、汇编、发行、信息网络传播本刊全文。在论文发表后由本刊向作者支付的稿费中已含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的著作权使用费及论文的稿酬。作者向本刊提交文章发表的行为即视为同意上述声明。

《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编辑部

JOURNAL OF YUNNAN INSTITUTE OF SOCIALISM

No.2, 2022

Contents

Theories and Practice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 Five Directions for Lifelong Education of Marxist Theory in the New Era Tai Pengfeng(5)
Target Variations of the CPC's Centennial Guidance to the Youth's Values and Their Inspiration
..... Xu Xichun(13)
Elaboration of the Scientist's Spirit in the New Era and Its Practice Approaches
..... Bi Liwen, Wang Wenhao(21)

Theories and Practice of the United Front

- Normative Annotation of Cultural Sovereignty in the Constitutional System of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Zhang Bo(28)
Analysis of the CPPCC United Front's Work: Advantages and Functions
..... Li Xuhui, Jiang Shengliang, Zhou Kejia(36)
The United Front's Work with Netizens in Type-II Metropolises: A Survey on Changde in Hunan Province
..... Luo Mina(46)
On the Growth of Young Civil Servants in Democratic Parties' Institutional Offices Li Xuliang(52)

Forging the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 Ways to Rebuild the Taiwan Compatriots' Awareness of National Identification: Based on Deep Interviews
with the "Cross-Strait" Taiwanese Qiu Hongbo(60)
Yunnan's Exploration of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Establishing a Demonstration Area for National Solidarity
and Progress Zhang Zhiyuan(72)
The CPC's Exploration and Practice of Ethnic Affairs in Yunnan Province in the Long March
..... Zhao Yuchun, Zhao Shanqing(79)
The Southwestern Ethnic Groups' Merging into the Chinese Nation during the Qin and Han Dynasties
..... Ma Yiguo(85)

History and Culture

- A Study of Inheritance and Protection of Yunnan's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n Example of Diqing
Autonomous Region of the Tibetan Yang Raocai(91)
Magnification of the Micro: Nationalized Narrative and Cultural Practice on the Basis of Celebrities' Former
Residences: An Example of Nie'er's Former Residence Luo Xiaziping, Sun Junlie(99)

Tales of Yunnan

- Advantageous Characteristics and Approaches to Practice of Yunnan United Front's Publicity Themed on
History and Culture Nian Xingchang(107)
Research into Historic Significance and Contemporary Value of the Revolutionary Culture Conveyed by
"Banhong Resistance War against British Invasion": Thoughts on the Spirit of Xi Jinping's "August Letter
in Reply" Yang Yiping(115)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新时代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终身教育的五个向度

邵鹏峰^{1,2}

(1. 上海中医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上海 201203;
2.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北京 100732)

摘要: 马克思主义理论终身教育是新时代构建终身学习体系、推进终身教育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是由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时空环境、内在品质、历史前提等因素决定的。其中, 包括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论与实践品质、党和国家的新要求、培养社会主义时代新人的内在要求、“学思结合”的教育规律、传承革命年代巨大的教育成效等五个方面。这五个方面充分决定了新时代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终身教育的必要性。中国共产党依靠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终身教育走到今天, 也必然要依靠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终身教育走向未来。

关键词: 新时代; 马克思主义理论终身教育; 必要性

中图分类号: G4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2811(2022)02-0005-08

构建终身学习体系、推进终身教育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1979年,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报告《学会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提出“终身教育”和“学习化社会”^①等理念, 引起广泛关注。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紧跟国际发展趋势, 站在党和国家发展全局的高度指出: “要构建终身教育体系, ‘形成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 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这是一个关系到中华民族能否持续发展、能否实现民族复兴大业的战略问题。”^②2019年2月,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 聚焦教育发展的基础性工程, 立足实际, 着眼长远, 把构建服务全民的终身学习体系列为“十大战略任务”^③。马克思主义理论终身教育是构建终身学习体系、推进终身教育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马克思主义理论终身教育的必要性成为当前重要研究议题。

一、马克思主义的品质决定了新时代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终身教育

马克思主义的品质主要包括理论品质与实践品质, 其中理论品质的内核是与时俱进, 实践品质的内核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马克思主义理论品质与实践品质紧密结合, 共同奏出了一系列精彩的时代乐章。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创新的逻辑进路”(20FKSB031)。

作者简介: 邵鹏峰, 上海中医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访问学者, 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理论。

①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发展委员会:《学会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 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 1996年, 第180页。

② 习近平:《之江新语》,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7年, 第41页。

③ 《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 2019年2月23日, http://www.moe.gov.cn/jyb_xwfb/s6052/moe_838/201902/t20190223_370857.html, 2022年4月24日。

（一）与时俱进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终身教育的根本前提

马克思主义是经过亿万人民群众实践检验的、科学的世界观，是引领人民群众面向未来、走向辉煌的正确历史观，是指导人民群众改造客观世界与主观世界的方法论。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及其内容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推陈出新、日趋丰富。因此，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当今时代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才能始终保持其旺盛的生命力，保持其不朽的引领力。

马克思主义理论终身教育就是马克思主义不断实现中国化的过程，其植根于中国土壤、成长为时代引领者；就是马克思主义不断实现大众化的过程，内化于亿万人民群众的心中，发展为行动指南；就是马克思主义不断实现时代化的过程，外化于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的实际行动中，表现为使命自觉。对于新时代党员干部来说，需要有终身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决心，需要有钻研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韧劲，要善于结合时代要求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解决社会问题，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进而实现新飞跃。马克思主义理论终身教育就是要确保党员领导干部带领亿万人民群众，围绕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经典作品，坚持不懈学，真正地做到活到老、学到老，真正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

（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终身教育的关键路径

一切从现实出发，根据事物发展的规律，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品质。列宁明确指出，具体地分析具体情况，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所在。如何做到具体地分析具体情况？列宁认为，要结合事物发展的本质，把握事物发展的规律，运用辩证方法，找出解决问题与矛盾的适当形式与科学方法^①。通常所说的“对症下药”“量体裁衣”“因地制宜”等，就是其通俗说法，这意味着要办好一件事情，必须根据事物发展的内在规律，根据事物自身的特点，用恰当的形式与方法分析和解决矛盾或问题。

在马克思主义的视域下，真理不可能是抽象的，真理所反映的客观对象是具体的。要完成对事物的正确地、科学地认识与客观把握，就必须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坚持围绕具体事物进行具体分析。从客观实际的具体条件出发，通过实践，通过研究客观事物和现象，分析事物的内在矛盾与规律，充分研判具体矛盾、矛盾各方面的地位和作用，研究矛盾及其各种关系或联系，只有这样，才能避免片面性、表面性、主观性的倾向，从而做到全面地、深入地、客观地认识事物，才能真正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人的发展是社会生产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人的发展离不开社会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人的发展与社会生产发展相一致。社会的发展一日千里，作为社会重要力量的个体与组织，要跟上社会的进步，就需要不断地学习以获取知识、增长才干，尤其是持续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以不断增强驾驭社会发展的本领。只有在实践中持续贯彻马克思的实践哲学中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断解决在实践中遇到的各种具体问题与矛盾，才能不断投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力量、贡献智慧、贡献才华。

（三）人民群众的自觉要求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终身教育的根本动力

人民群众要掌握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单纯靠实践是无法完成的，还需要有终身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意识与行动。一方面，现实生活的人要主动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对标现实世界的实际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着眼改造世界的目的深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认识。另一方面，仅仅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是远远不够的，只有实践马克思主义，才能不断克服未来征程中的各种艰难险阻，开辟更加美好的未来。

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终身教育的根本价值属性。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群众的终身教育需

^① 列宁：《列宁全集》（第3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28页。

求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终身教育的奋斗目标。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终身教育学习体系，广大人民群众将会充分受益。从这一视角出发，聚焦亿万人民群众的主体性，通过各种方式开展丰富多彩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活动，形成亿万人民群众“主动学、我要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终身教育的氛围，将马克思主义理论终身教育真正落到实处。

二、党和国家的要求决定了新时代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终身教育

2018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重要讲话中强调指出，新的时代中国共产党人仍然要学习马克思主义，践行马克思主义，不断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汲取智慧，不断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获取理论创新的灵感，以更有智慧、更有定力、更有自信地投身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新征程^①。

（一）党和国家历来重视终身教育事业

199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制定并印发《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提出“坚持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的同时，指出成人教育是从传统学校教育进入终身教育的一种标志性制度^②。这是首次对终身教育相关内容的表述。1995年，全国人大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提出终身教育是未来中国教育的重要方向，必须要积极加快相应体系的构建^③。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从招生政策、学生培养、制度建设等方面提出要逐渐完善终身学习体系^④。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着眼全局，运筹帷幄，从“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两个维度全面推出一系列决策部署，对教育工作尤其是终身教育工作作出新要求，明确了正规教育与非正规教育、职前教育与职后教育等方面的方向，构建了纵向衔接、横向贯通的终身学习体系，为实现教育对人的整个生命的全周期覆盖，发出了总动员令。党的十九届四中、五中全会提出，构建完善的教育体系，以终身学习作为重要目标，更好地服务于人民群众，积极推动相应体系的完善，从全社会范围内营造良好的氛围，构建学习型社会。

（二）马克思主义理论是终身教育体系、学习体系的关键内容

对终身教育的研究，思想流派较多，影响较大。除了以保罗·朗格朗和埃特里·捷尔比为代表的思想流派之外，还存在着一种“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终身教育论”。这一思想流派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基础，强调终身教育理论是一种理念，其中每个人的人格发展、道德品质的向上、社会主义社会共同体等内容要素有机地结合在一起^⑤。

中国共产党历来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终身教育事业，始终把它作为头等大事，并从这一意义出发，适时提出要着力构建完善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终身教育体系，以终身学习作为重要目标，更好地服务于亿万人民群众。这需要各方积极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体系的完善，从系统的视角，结合实际的情况，制定出相应的措施，协力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终身教育事业获得更好的发展。

^① 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18年5月4日，https://www.ccps.gov.cn/xx-sxk/zyls/201812/t20181216_125693.shtml，2022年4月24日。

^② 《中国法律年鉴》编辑部：《中国法律年鉴1994》，北京：法律年鉴出版社，1994年，第485页。

^③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2021年4月29日，http://www.moe.gov.cn/jyb_sjzl/sjzl_zcfg/zcfg_jyfl/202107/t20210730_547843.html，2022年4月24日。

^④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2013年8月28日，<https://xsc.jhun.edu.cn/fl/7c/c1472a61820/page.htm>，2022年4月24日。

^⑤ 吴遵民：《关于现代国际终身教育理论发展现状的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2年第3期，第43页。

（三）马克思主义理论终身教育体系是全民终身学习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学习型组织理论在现代管理理论中居于重要地位，是当今时代最前沿的理论，是国际共创、共识的现代管理理论，备受世界各国关注与重视。世界银行发布的《知识与发展报告》指出，要解决发展中国家与国内欠发达地区在知识差距上的问题，就必须提高获取现代存量知识的能力，努力增强自主知识创新与创造的能力^①。由此可见，构建终身学习体系最主要的任务就是学会学习，尤其是学会创造性地学习。

建构马克思主义理论终身教育体系，让广大人民群众都可以真正地接受终身学习，并把所学落实到实践中，这对于进一步完善学习体系具有关键性意义。树立终身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观念，在全社会形成高度的学习自觉，把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首要任务，作为一种责任担当、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方式；树立“梦想从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开始”的观念，让勤奋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成为青春成长成才的内在源泉，成为个体谋求进步的内在动力。现代社会是终身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社会，是学习型社会，是知识信息急剧增长的社会。我们只有勤于学习理论，提高学习的主动性，才能勇立时代潮头，做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中坚力量。

三、培养时代新人的紧迫性决定了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终身教育

党的十九大报告旗帜鲜明地提出要着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这一方向性的思想，突出体现了新的时代我们要围绕“人”，要聚焦“人”，要培养“人”。2018年的全国教育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指出，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从根本上决定了我们人才培养的根本任务与目标，决定了我们应该如何培养“人”^②。因此，“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拥护社会主义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长期执政”等关键词成为培养社会主义的时代新人的应有之义。

（一）持续培养社会主义的时代新人是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现实基础

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不断保持党的战斗力、影响力、引领力，不断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是百年大党的宝贵经验。围绕持续培养社会主义的时代新人，采取强有力的举措，做好马克思主义理论终身教育，不断强化自身的执政能力与执政水平，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与纯洁性，是党的建设的主线。由此可见，“如何持续培养社会主义的时代新人进而实现党的长期执政”问题之重要。

社会主义的时代新人是党长期执政的根本力量。国际国内环境瞬息万变，要有效应对复杂多变的局面，就要高度重视对社会主义时代新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有效引导他们自觉拥护中国共产党，自觉投身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2013年8月19日，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指出：“我常想，中国共产党人如果遇到了战争，是否可以真正的做到：战必胜，攻必取，从历史角度来说，共产党人是完全可以做到的，最好的例证就是建立了新中国；中国共产党人是否可以让国家得到发展，从历史角度来说，共产党人是完全可以做到的，最好的例证就是改革开放；不过，现阶段，国际国内环境瞬息万变，党所面临的挑战是巨大的，那么共产党人是否依然可以坚持党的领导，让社会主义在中国进一步的扎根，对于这个问题，只有时间才可以回答。”^③一代一代共产党人的首要回答就是长期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终身教育，就是坚持以实际行动践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终身教育。只有如此，才能从根本上实现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长期领导、实现中国共

① 世界银行：《1998/99世界发展报告：知识与发展》，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年，第2—3页。

② 习近平：《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2018年9月10日，<http://jhsjk.people.cn/article/30283643>，2022年4月24日。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政治建设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25页。

产党的长期执政。

（二）马克思主义理论终身教育是持续培养社会主义时代新人的内在要求

中国共产党历来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终身教育，从成立之日起，就把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全党、教育群众作为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键环节和中心任务。1941年，在延安干部会议上，毛泽东作了题为《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拉开了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的序幕。通过整风运动，进一步纠正了教条主义、主观主义的错误，解决了无产阶级思想和小资产阶级思想、小农思想的矛盾，提高了全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水平。这是一次全党范围内普遍的马列主义教育运动。

我们不仅要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党员、干部的头脑，还要让人民群众掌握并利用马克思主义这一思想武器的正确方法，而最有效的途径就是在全社会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在全社会倡导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终身教育。农民运动讲习所的举办堪称在全社会各年龄段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终身教育的典范。毛泽东、彭湃等人投身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积极参与举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向各年龄段广大农民讲授、普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常识和宣传革命道理，动员和组织农民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以来，党中央坚持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开展灵活多样的思想政治工作；利用现代科技，充分发挥电视、广播、报刊、网络等对群众进行宣传，起到了教育群众、鼓舞群众的作用；面向未来，推进各级各类学校打造马克思主义理论终身教育的基地，加强大中小一体化视域下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以扎实有效的行动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的显著成效，使各年龄段不同层次的广大人民群众逐渐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这一斗争武器。

（三）马克思主义理论终身教育的对象是全年龄段的时代新人

人的思想是如何发展变化的？人的思想如何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马克思主义认为，思想的发展变化是由复杂的主客观原因造成的。复杂性主要涉及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和各种社会关系、社会的精神条件等因素，其中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环境等对人的思想变化影响最大，国内外形势、政局、政策和路线的变化也对人的思想有重大影响，工作单位和家庭状况的好坏也不可忽视。人的思想常常难免同客观世界的实际不相符合或不完全符合，人们需要而且必须在实践中加深对客观世界的认识，证实思想中正确的东西，纠正错误的东西，并在实践中吸取养分，不断充实、丰富和发展自己的思想，以更好地适应客观实际的发展变化。作为个体的人，思想认识的发展，世界观、人生观的形成和发展，都遵循“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这一规律。

新的时代要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继往开来，就必须坚持以发展的观点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努力做到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持续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终身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正确认识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终身教育的应有之义。这不仅是因为客观形势是不断发展变化的，而且也因为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一个开放的理论体系，是一个在与教条主义、经验主义作斗争的实践中不断发展的理论体系。克服和避免教条主义影响并不是很容易的事情，苏联模式的形成和长期存在、中国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王明路线、“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两个凡是”，无不是教条主义的反映。不断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落脚点在于要不断打破教条主义的深刻影响，不断开创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新局面，不断深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新境界，不断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提供有力指导与科学支撑。对此，经典作家早在1844年就说过：“历史将会带来这种共产主义行动，而我们在思想中已经认识到的那个正在进行自我扬弃的运动，实际上将经历一个极其艰难而漫长的过程”。^①

^①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40页。

四、“学思结合”规律特征决定了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终身教育

2013年,习近平在中央党校建校80周年庆祝大会上讲话时提出,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做好一切工作的看家本领^①。此后,习近平在多个重要讲话中强调,学习与思考、勤学与深思是相互联系的,是相辅相成的,要结合自己的工作,反复思考。

(一) 坚持“学思结合”方法才能取得马克思主义理论终身教育显著成效

学思结合是教育的基本规律之一,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终身教育能否取得显著成效的重要因素。正如孔子提出的“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任何教育在任何时代都必定受这一规律制约。简单来讲,学思结合就是把学习和思考结合起来。首先是学,学是获取知识的源头,也就是通过博学、好学、多闻、多见获取大量感性知识,形成感性材料库,这是第一步。同时,学习不能仅仅停留在感性认识和对感性材料的简单堆砌上,还必须善于运用思维,开展思维活动,对通过博学、多闻、多得来的感性材料做进一步的思考,进行分析、提炼、加工,并将其上升为理性认识,为指导实践提供科学的理论支撑。

那么,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终身教育应如何遵循学思结合的教育规律呢?首先要对标“学思结合”的典范孔子。“学”与“思”结合是一种重要方法。在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学习时,不能教条,必须要坚持灵活与原则的统一,结合现实,进行深入的思考,才能学得明白,理解得深刻,有所收获,有所提升。如果仅开动脑筋进行思考而不去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就会陷入自以为是,那也很危险。所以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既要学,也要观察现实,更要深思,一边学,一边深思,既要听别人的,看别人的,也要听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终身教育不仅强调学,更强调学思结合,在学习的过程中需要做到不断地反思,强化对理论内容的感知与体悟。思考是认识过程中的理性活动,是重要环节。我们需要进行不断地思考,进行有深度地思考,这样才可以实现对学习效果的检验,从而深化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认识。

(二) 坚持教育对象层次化才能够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终身教育的针对性

学习者在完成了学习任务后,仅处于学习收获的第一层次,还必须进行不断地“思”。只有这样,才可以更好地理解所学到的东西,使得自己的学习水平得到有效的提高,同时真正地做到学以致用。要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针对性,就要充分考虑到学习者所处的年龄段差异。对于个体来讲,其所拥有的“思”的能力也会有一定的差异,在此基础之上来展开针对性的教育,使得“学”可以真正地协同于“思”,教育效果才可以得到显著的提升。马克思在《临时中央委员会就若干问题给代表的指示》的报告中指出,为了实现教育目标,对少年儿童进行类型的划分,在进行类型划分的过程中,主要遵循的分类依据为生理状况,对于第一种类型的儿童来讲,其所处的年龄段为9—12岁的儿童,对于第二种类型的儿童来讲,其所处的年龄段为13—15岁,对于第三种类型的儿童来讲,其所处的年龄段为16—17岁,并提出法律最好限制单日工作时长:第一种每天工作持续的时间为2小时,第二种每天工作持续的时间为4小时,第三种每天工作持续的时间为6小时^②。在这里,马克思对现代工业吸收男女儿童和少年来参加伟大的社会生产事业进行了肯定的分析与论证,认为是一种进步的、健康的和合乎规律的趋势。以此为基础,欧文提出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著名观点,这一观点得到很多人的认可,这也推动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这意味着要想更有针对性地做好教育工作,必须要将其全方位地结合于生产劳动,才可以获得更好的效果。欧文进步思想有闪光的地方,同时也有糟粕,通过不断地接受批判以及优化,最终形成了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这意味着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并不是独立存在的,其源自欧文的

① 习近平:《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创新理论武装全党》,《求是》2021年第22期,第4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六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216页。

成就。从这一角度来说，两者间存在着十分紧密的关联性^①。

在切实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终身教育期间，必须始终遵循因人施教这一原则。从根本上来看，马克思主义理论终身教育其实就是基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去教育党员，教育我们的干部，教育我们的人民，在教育中统一全党、全国人民的思想，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因此，马克思主义理论终身教育的对象是人，而且这个人不是个别人，也不是一部分人，这个人就是全体社会成员。社会成员在年龄阶段、文化程度、生活环境、工作性质和思想状况等方面存在差异，针对这种差异，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内容、途径、方式、方法等也应该有所区别。由于接受教育的对象间存在显著的差异性，在对其进行层次划分也就不可能只有一种模式，可以根据不同的年龄阶段、不同的文化程度所在行业和工作性质、思想状况等来划分，也可以综合来划分。这一区分，必定为我们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取得良好的效果奠定坚实的基础^②。

（三）坚持对标年龄规律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终身教育的系统性

通常，人在逐步成长的过程中，在“思”这一方面具备的能力也会持续加强。对于完全一致的学习内容，在年龄更大的时候来“学”可能会取得更良好的效果。相对于年龄较小的时期，在年龄更大的情况下，人的阅历会更加丰富，对知识的整体积累情况及运用能力也相对更强，所以在“学”内容保持统一的前提下，年长者在“思”这一方面会具备更强的能力。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中，这一情况得到了较为鲜明的体现。如在学习“公有制经济”时，在校内尚未真正进入到社会中，也没有亲身开展过实际的经济活动，因此虽能基于理论层面形成对课本知识的理解，但无法结合实际完成“思”及体会的过程。参加工作的人员则能对“公有制经济”所带来的有利影响形成更深刻的体会，这是因为他们能结合自身实际在更深层次上完成“思”的过程。所以，马克思主义理论终身教育必须要面向各个年龄段的人群，这样才可以跟学思过程本身存在的规律保持一致，继而达成更好的成效。

围绕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层次性，对具体的教育对象，我们可以提出恰当的教育要求，避免“一刀切”现象；对标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层次性，我们可以引导、激励各个层面的人们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已有实践证实，那些本身品德十分优良的人员，在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共产主义教育后，其具备的道德水平会得到极为明显的提升。相反，部分在道德方面未能达到较高水平的人，从根本上来看大多是由于其未能遵循社会公德。以社会公德为基础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也符合青年学生的年龄特征和成长需要^③。

五、传承革命年代成效决定了新时代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终身教育

随着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马列主义进入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到底是什么样的学说和思想，为什么它可以作为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在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最早接触马克思主义的一大批先进知识分子和共产党人作出了艰辛的探索和努力。他们一是积极创办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报刊，如陈独秀主办的《新青年》杂志等，以通俗易懂的白话文尽量全面地翻译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著述；二是积极创办进步社团和学习机构，建立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主阵地；三是勇敢参与论战，在思维碰撞和思想争辩中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彰显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和批判性。

在中央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人陆续设立各种不同类型的组织开展宣传工作，如工农俱乐部、列宁室等，以此来展开积极的宣传教育工作，通过会议、戏剧等不同的传播方式，让马克思

① 彭小奇：《毛泽东早期教育实践与教育思想研究》，湘潭：湘潭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58页。

② 赵玉萍：《当前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有效发生：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为例》，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274页。

③ 曲华君、罗顺绸、钟晴伟：《德育教育与创新能力发展》，北京：中国财富出版社，2019年，第29页。

主义逐步融入工农群众中,并充分发挥教育及动员这两项重要的功能,让民众接触并学习到这一科学理论,进而具备更高的思想政治水平。同时,马克思主义也因此中央苏区立足,并被更多群众了解、掌握,当地群众的精神面貌实现了质变,革命事业得到了巩固和发展。

在延安时期,党的指导思想创新获得了重大突破,毛泽东思想被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并写入党章,并成为指引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旗帜。同时,马克思主义理论普及工作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辉煌成就。在这一时期推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终身教育,学习的最主要理论便是具有更强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基于内在层面提出的要求为“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善于使用一切宣传手段”,是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理论终身教育的有效路径。^①这一时期,党报成为党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最有力的喉舌。毛泽东特别强调报纸在宣传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要求“中央同志要善于利用报纸,要有一半的时间用在报纸上”^②。他亲自对《解放日报》的整改做出指导,并在撰稿方面担任了重要工作。另外,当时还特别注重运用标语、口号等更容易为群众所接收的方式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毛泽东曾总结说,第一口头讲话,第二在合适的场所通过合适的方式来贴布告,第三在合适的场所通过合适的方式来写标语,第四在更大范围内来发送传单,第五在合适的时机去演新剧,第六需要做好墙报^③。由于宣传过程中采用了更加多样的方式,且大多较为通俗,党员群众更容易接收,因此马克思主义逐步为更多人所理解并真正成为大家的行动指南,从理论层面为革命运动的开展锻造了强大的武器^④。

“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⑤毛泽东指出,在一些人的眼中存在误区,认为没有必要关心政治、祖国的前途、人类的理想,甚至错误地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时行,不是时时行。这种不正确的趋势,需要通过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予以解决。无论是知识分子,还是青年学生,只要在学习专业知识的同时,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各个方面均能得到进步。^⑥

在革命年代,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所面向的对象,是年龄处于不同阶段的所有群众。也正是因为当时采用了这种全年龄段覆盖的方式,才让更多的群众理解了与革命相关的各种知识,并能对历史、现实及自己需要肩负的使命形成正确的认知,进而形成更加强烈的爱国主义热情,并在建设革命根据地方面投入更多的热情,革命区所有的群众也因此而形成极为强大的凝聚力,成为党、政、军开展各项活动所具有的坚不可摧的基石。

唯有不断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才能实现认识的进步、事业的传承。中国共产党依靠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终身教育走到今天,也必然依靠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终身教育走向未来。

责任编辑:李亚强

① 马福运:《延安13年: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经验探索》,《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3月2日,第B02版。

② 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1页。

③ 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71页。

④ 袁秉达:《超越乌托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210页。

⑤ 毛泽东:《毛泽东早期文稿》,长沙:湖南出版社,1990年,第554页。

⑥ 龙剑宇:《毛泽东青春启示录》,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271页。

中国共产党对青年价值引领百年历程的目标变迁及其启示

徐喜春

(华南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广东 广州 510641)

摘要: 加强青年的价值引领始终是中国共产党青年工作的中心任务。百年来, 中国共产党结合中心任务的变化与时俱进地提出价值引领目标: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分别以培养“革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者”、社会主义“四有”新人以及“担当民族复兴大任时代新人”作为导向。百年历程证明, 加强青年价值引领必须强化中国共产党对青年工作的领导权, 始终用理想信念凝聚青年, 保持青年价值引领实践与时代同脉动, 发挥共青团的助手作用。

关键词: 中国共产党; 青年; 价值引领; 百年历程

中图分类号: D43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2811(2022)02-0013-08

2022年4月21日, 我国首次发布了专门针对青年群体的白皮书《新时代的中国青年》。白皮书高度肯定了中国共产党与青年运动之间的“血脉关联”, 总结提出“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朝气蓬勃的中国青年运动”^①等宝贵的历史经验。中国共产党始终高度重视青年工作, 致力于为青年提供价值引领与行动指南。中国共产党对青年价值引领的理念与实践集中反映在“培养什么样的青年”这一目标之中。马克思指出:“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 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②马克思明确了“理论实现”与“国家需要”之间的深刻关系, 为中国共产党的青年工作提供了重要的实践遵循。中国共产党对青年价值引领存在一个“国家需要”的逻辑前提, 即“党需要什么样的青年”和“时代需要什么样的青年”。纵观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历程, 党总是基于不同历史阶段对青年提出合目的性与合时代性的价值引领目标, 为青年的成长成才“点灯引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不同历史阶段, 与时俱进地提出了差异化的价值引领目标, 不仅有效回答了“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样的人、怎样培养人”的时代追问, 体现了

基金项目: 共青团中央2021年“青少年发展研究”重大课题“百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青年运动的体制机制及其制度优势研究”(21ZL002)。

作者简介: 徐喜春, 华南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工商管理学院讲师, 主要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办公厅:《新时代的中国青年(2022年4月)》,《人民日报》2022年4月22日,第11版。

②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1页。

思想政治工作“因事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的规律与特点，而且实现了“政党—社会—青年”之间的同频共振。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培养“革命青年”

中国共产党诞生于“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自成立之日起，便承担起思想启蒙与救亡图存的历史使命。青年是整个社会最具生气和活力的力量。国家危亡之际，中国共产党必须将青年从封建专制的蒙昧思想中解放出来，帮助他们突破无知、迂腐、奴化的思想桎梏，并投身到“革命救国”的洪流中。在此之前，首先要回答好“何谓革命”和“为何革命”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从共产主义运动的视野出发，认为“共产主义者的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①，他们将“使现存世界革命化”作为共产主义者的历史使命和时代责任，即要求共产主义者实践地改造世界。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革命就是“无产阶级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而建立自己的统治”^②，价值旨归在于实现“一切人的自由发展”^③。在封建落后与腐朽破败的旧中国，中国共产党“革命”的内涵即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实现国家独立与人民自由。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强调了“革命”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而是“暴力活动”。毛泽东将“革命”的内涵斗争化，认为革命应当是推翻旧阶级统治的手段方式。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主题和现实条件要求中国青年必须“革命化”，以高度的历史自觉担当起救亡图存的时代责任，既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又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中国共产党引导青年在“破”与“立”并举中担负起“革命救国”的使命与责任，这也成为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对青年价值引领的目标定位。

1922年5月，中国共产党创建成立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并通过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纲领》（以下简称《纲领》）。《纲领》明确表达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任务在于：“养成青年革命的精神。”^④中国共产党引导青年养成“革命的精神”，目的在于教育他们掌握“批判的武器”，为争取国家和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与一切反动势力作积极的斗争。1922年7月，中共二大提出的《关于少年运动问题的决议案》（以下简称《少年决议案》）直接将中国共产党对青少年价值引领的任务概括为“革命的教育”，提出这种革命教育的任务在于“训练少年劳动者成为阶级觉悟的革命分子”。作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青年运动的纲领性文件，《少年决议案》明确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对“革命青年”的价值期待，号召广大青年“做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奋斗”。《少年决议案》集中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青年价值引领的方向与目标，即唤醒他们的革命意识，教育他们从“青年”向“革命青年”转型。无论是《纲领》或者《少年决议案》，都尤其强调培育青少年革命的意识，使其加入爱国救亡的革命队伍。

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革命青年”的价值引领实践与抗日救亡运动更加紧密地结合了起来。毛泽东多次阐释了“革命”的“斗争”内涵，认为“革命青年”应当付诸实际行动，而“投身革命、抗日救国”便是最直接的价值行为实践。1936年11月，中共中央为最大程度将广大青年统一到抗日统一战线，出台了《关于青年工作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提出了青年教育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155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412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422页。

④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一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74页。

任务：“这在目前阶段上，即是以仇恨日本帝国主义和忠实于本国人民解放事业的教育来教育他们。”^①《决定》提出现阶段青年工作的重点在于激发他们捍卫国家领土完整和民族尊严不受践踏的坚定信心，更大范围地调动和引导青年投身抗日救亡的革命斗争。《关于青年工作的决定》与之前的《少年决议案》《青年决议案》等青年政策文件相较，其价值目标更加浅显直白，直截了当地指出要教育引导青年成为抗日的“革命者”。1941年6月，《关于青年工作的决议》提出做好青年工作的“十条意见”，高度凝练了中国共产党青年价值引领工作的原则与策略，并再次强调“今天青年工作的中心任务应该是根据统一战线方针，继续发展与充实青救会的组织与工作”^②。这些文件旨在广泛调动青年参与革命的积极性，为抗日战争输送源源不断的年轻力量。

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国民党反动集团不顾国家民族大义，勾结美帝国主义继续推行其残酷、反动、专制的独裁统治。中国共产党及时调整革命斗争的内容与方式，高扬“和平”“民主”“正义”等旗帜，引领青年加入“制止内战”“保卫民主”“争取和平”的行列之中。在共产党的感召下，中国青年“革命救国”的热情高涨，相继掀起了1945年底的“一二·一”运动、1946年底的抗议美军暴行运动、1947年春夏之交的“五二〇”运动、1948年上海学生的反美扶日运动等。这些运动始终围绕思想觉醒、救国图存等内容而展开，深刻地揭露了国民党统治的虚伪面目，有效地团结了更多进步青年投入中国革命的正义洪流。由此可知，解放青年思想，坚定他们“革命救国”的立场、意识与行动，始终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青年价值引领的主题。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培养“又红又专的社会主义建设者”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结束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任人宰割的屈辱历史，彻底砸碎了封建统治和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人民的枷锁，使中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独立自主的国家。刚成立的新中国不但“一穷二白”，而且面临着帝国主义和国内反革命势力对新生政权的干扰与破坏。基于来自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严峻挑战，以及国民党反动派残余力量和国内土匪势力相互勾结、西藏和平解放、祖国大陆与台湾尚未完全统一等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中国共产党深刻洞见到所处历史方位与发展阶段的变化，及时调整对青年价值引领的目标。面对巩固新生人民政权与恢复国民经济的实际需要，中国共产党将对青年价值引领的目标确立为“培养又红又专的社会主义建设者”。“红”与“专”是青年价值引领目标的概括性表述，指的是既在精神上信仰马克思主义，用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解释世界”，又要掌握和学习应用好专业知识与技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中“改造世界”。“又红又专”的价值目标契合新中国成立初期“一穷二白”的客观实际，既培养拥护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又锻造了具有过硬本领的党和国家事业建设者。1949年9月29日，新政协通过了《共同纲领》，明确了“给青年知识分子和旧知识分子以革命的政治教育，以应革命工作和国家建设工作的广泛需要”^③的要求，为后来中国共产党广泛动员青年投身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提供了重要的政策支持。《共同纲领》指明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青年价值引领目标的基本方向。沿着“又红又专的社会主义建设者”这一价值引领目标，党中央向广大青年发出了“在新中国的广阔天地忘我劳动、艰苦创业”^④的号召。

1949年12月，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提出当务之急在于“培养国家建设人才”^⑤，而在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十三册），第374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十八册），第358—359页。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二十六册），第767页。

④ 习近平：《习近平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时的讲话》，《人民日报》2013年5月5日，第1版。

⑤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一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87页。

“青年学生中进行政治与思想教育，其主要目的乃是逐步地建立革命的人生观”^①。“革命的人生观”注重从思想源头回答“为什么而活，为谁而活”的问题，强调青年要树立奉献、奋斗的人生态度，将爱国、进取、拼搏的精神融入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之中。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用“革命的人生观”对国家建设人才的培养目标进行了限定，凸显了“又红又专的社会主义建设者”的价值取向，逐步将青年价值引领目标转向革命与建设。1953年10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强党对青年团的领导给各级党委的指示》，认为我国已进入逐步实现国家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进行有计划的经济建设时期，并动员全体青年“站在工业、农业、国防和文化的战线上的最前列，以示对祖国对人民的无限忠诚”^②。新中国成立的头七年，中国共产党对青年价值引领的目标主要在于号召广大青年自觉进行共产主义世界观的改造，积极投身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巩固新生人民政权的物质基础。

1956年底，我国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逐步确立起社会主义制度。面对中国所处历史方位的转变，中国共产党对“又红又专的社会主义建设者”这一价值引领目标继续深化发展，强调广大青年要持续学习共产主义道德，成为“自觉的共产主义战士”。1958年6月，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共青团三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组织广大青年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毛泽东著作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提出青年应当成为“自觉的共产主义战士”。《决议》指出，培养“自觉的共产主义战士”就是要求广大青年“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红旗，用最高速度推进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而斗争”^③。“自觉的共产主义战士”并非是对“又红又专的社会主义建设者”这一价值目标的否定或者背离，恰恰相反，它是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改变之后，对“又红又专”的时代性表达。“自觉的共产主义战士”更加强调广大青年置身于崭新的社会主义社会，要保持为共产主义奋斗的高度自觉性，主动与反社会主义、非社会主义现象作斗争。引导广大青年成为“自觉的共产主义战士”，既要在政策文件层面明确和呼吁，又需要发挥榜样的示范引领作用。1963年2月，党中央指示团中央在全国青少年群体中开展“学习雷锋好榜样”活动，强调广大青年应当学习雷锋在社会主义建设火热实践中保持对党忠诚、对国家热爱、对人民奉献、对社会不求回报的精神。从这里可以更加直观地感受到中国共产党对青年价值引领的具体方向与内容，即使青年成长为具有高尚共产主义精神的社会主义建设者。“文化大革命”发生之后，党对青年价值引领的目标和行动受到严重歪曲和破坏。直到1976年底，“四人帮”被彻底粉碎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共青团与青年工作才逐步调整和恢复，推动青年价值引领系统工程的正常化。

三、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培养“四有新人”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进行了调整，确立了经济建设这一中心任务。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对青年的价值引领目标则围绕这一主题而展开，提出了许多新的思想观点。1983年4月，邓小平表达了“社会主义新人”的思想：“广大人民有共产主义的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④同年10月，邓小平再次对培养“四有新人”进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一册），第91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四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489页。

③ 《共青团三届三中全会关于组织广大青年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毛泽东著作的决议》，《读书》1958年第15期，第3版。

④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8页。

行阐述：“真正做到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为伟大壮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而英勇奋斗。”^①邓小平关于“四有新人”的系列论述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的青年价值引领提供了方向。

一方面，培养“四有新人”的价值引领目标蕴藏于火热的实践之中。1979年3月，团中央响应党中央的要求，在全国青年中开展了“争当新长征突击手”活动。广大青年以饱满的热情投身到“新长征”突击活动中，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贡献了巨大的力量。“新长征”活动引导青年将经济建设与思想建设有机结合起来，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特色。2000年2月1日，江泽民发表了《关于教育问题的谈话》，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揭示了广大青年投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与锤炼思想觉悟之间的辩证关系：“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为年轻一代的成长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只要他们有为祖国、为人民贡献青春的志向，满腔热情地投入到建设祖国的伟大事业中去……就一定能够成长为有用之才”^②。2011年4月，胡锦涛向广大青年学生提出了“在实践中发现新知、运用真知，在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中增长才干”^③的要求，更为直白地点出实践对于增知、明智和强能的重要性。这些论述不仅凸显了中国共产党将培养“四有新人”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机联结起来，而且为新世纪的青年价值引领政策提供了重要的实践遵循。

另一方面，面对国门打开之后出现的多元思想价值观念相互交锋的社会现实，中国共产党集中开展了一系列的培养“四有新人”的价值引领活动。1985年3月，邓小平在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上强调：“教育全国人民做到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④“四有”涵盖了理想信念、个人品德、文化素养和纪律意识等方面，突出思想价值引领的重要性地位，为全国开展青年价值引领营造了良好的舆论氛围。在党中央的领导和共青团的组织下，广大青年相继掀起轰轰烈烈的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投身四化活动、“送人玫瑰，手留余香”的青年志愿者行动、“青年文明号”活动、学习张海迪活动、争做“四有新人”等活动。这些活动围绕“我们应该成为什么样的青年”这一问题而展开，引导广大青年从“四有”中寻找答案与方案，是对当时社会上弥漫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的有力反击，也是对正确人才培养方向、社会主义建设者与接班人培养标准的有力宣传，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学习先进、争当先进、成为先进风气的传播。一言以蔽之，这个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广大青年的价值引领体现出鲜明的“改革发展”的特征，即要求广大青年用“四有新人”的思想自觉抵制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争做先锋。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新时代青年价值引领的目标确定为“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⑤。习近平总书记用“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高度概括了新时代青年价值引领的目标定位。这一论述用“担当民族复兴大任”与“时代新人”等表述和范畴体现了新时代青年价值引领目标的一脉相承性与独特性。一方面，“担当民族复兴大任”明确了新时代青年的历史使命，即在“历史—现实”的时空链条中担当复兴大任；另一方面，“时

①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40页。

② 江泽民：《关于教育问题的谈话》，《中国高等教育》2000年第3期，第3—4页。

③ 胡锦涛：《在庆祝清华大学建校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国教育报》2011年4月25日，第1版。

④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10页。

⑤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人民日报》2017年10月28日，第1版。

代新人”体现的是对邓小平提出的“四有新人”这一命题的继承与创新。“时代新人”既是指这一代青年成长、成人、成才于新时代的时空场域，又是在对“四有新人”价值内核合理继承基础上的有效发展。

“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新时代青年树立远大理想，主动承担历史重责的价值期待。在新时代，青年面临着“我是谁”“身处何处”“我应何为”等时代追问，亦面临着文化多元化、信息混杂化带来的风险和挑战。要回答时代之问，抵御各类风险和挑战，广大青年必须自我锤炼，主动担当，投身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中。只有理想远大、信念坚定，自觉树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实现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拥护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才能发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先锋力量。广大青年自觉成为中国共产党理想信念的信仰者与实践者，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源源不断的内在动力。

“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强调了中国共产党对青年“打铁还需自身硬”的价值期待。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①从这里可以得知，中国共产党对新时代青年的价值期待较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的“四有新人”价值目标而言，更加突出了“有本领”与“有担当”，这是与新时代统筹“两个大局”的时代任务要求密切相关的。新时代青年所处的时代“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②，要担当这一历史使命必须时刻保持“本领恐慌”，提高新时代建功立业的本领。

五、中国共产党对青年价值引领目标百年变迁的启示

中国共产党对青年价值引领的百年历程浸润着党对青年的价值期待，充分体现了党的青年工作的独创性。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围绕党的中心任务、时代的发展课题、青年的身心规律，探索形成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经验和路径。立足当下，凝聚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青年力量，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战略任务，也是新时代思想政治工作的题中应有之义。为此，必须汲取中国共产党百年青年价值引领的成功经验，采取契合时代与青年的价值引领策略，引导青年做共产主义理想的忠实信仰者与坚定实践者。

（一）强化中国共产党对青年工作的领导权

强化中国共产党对青年工作的领导这一命题，既是党对青年价值引领的实践前提，又是实现党对青年工作价值期待的目标任务。将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意志与意图贯穿于青年工作的始终，是党对青年价值引领百年历程的宝贵经验。百年的光辉历程充分证明，只有中国共产党牢牢把握住教育青年的领导权，才能保证广大青年“听党话、跟党走”。《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要求：“教育引导青年党员永远以党的旗帜为旗帜、以党的方向为方向、以党的意志为意志。”^③《决议》突出强调了党对青年工作的领导地位，即青年工作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体现党的旗帜、方向与意志，始终将党对青年工作领导权贯穿于教育引导青年的全过程。新时代，青年身处于社会经济高速发展、信息技术蓬勃兴起、思想文化激烈碰撞的环境，其思想价值观念更趋多元活跃，无形中加剧了价值引领的难度。面对如此背景，对

^①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人民日报》2017年10月28日，第1版。

^②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人民日报》2017年10月28日，第1版。

^③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人民日报》2021年11月17日，第8版。

青年的教育引导不但不能弱化“党管青年”的原则与指导思想，而且必须继续深化和持续提升中国共产党对全社会青年的价值引领力和实践感召力。强化中国共产党对青年工作的领导权需要有效借助青年社会组织的力量，促使党的领导在群团组织中得以深化。当前，青年社会组织呈现出蓬勃发展的势头，成为青年学习交往、运动娱乐的重要阵地，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党和国家社会建设、社会服务的短板。但青年社会组织的发展必须置于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大局之中，不越位、不错位。习近平总书记对此有深刻的论述：“党的群团工作只能加强、不能削弱，只能改进提高、不能停滞不前”。^① 只有在与群团工作结合中，在群团工作完善和改进基础上，才能不断提升和加强党的领导有效性和科学性，也唯有如此，才能不断强化中国共产党对青年与青年工作的领导权。

（二）始终用理想信念凝聚青年

中国共产党对青年价值引领的百年历程，是一个由系列阶段性目标组成并不断践行的历史过程，其具体化的目标任务始终处于不断调整变化之中，但无论什么阶段，党对青年工作的引导都始终强调加强对青年理想信念的教育。理想信念是人们对于未来的志向与追求，能为人们提供不竭的前进动力，尤其是在面对困难挫折之时能够促使人们依然保持高昂的精神状态，为人们面对挑战、解决问题提供精神支撑。对于青年而言，他们正处于“人生的拔节孕穗期”，这个时候树立什么样的理想信念决定了他们未来的方向与道路如何选择。为此，不论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如何调整变化，加强青年的理想信念教育应当始终是中国共产党价值引领的主旋律。中国共产党用理想信念凝聚广大青年，能够保证青年的成长成才始终与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同心同向。中国共产党由于深刻认识到这一点，把加强青年理想信念教育作为新时代青年工作的基础性工程，在强化青年理想信念、锻造青年坚强意志、形塑青年实践品格等方面成就显著。近年来，中国共产党相继出台了《关于新时代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等政策文件，突出强调了理想信念教育的重要地位。中国共青团为更好地领会与贯彻党的执政意图，在2022年4月20日发布了《新时代加强和改进共青团思想政治引领工作实施纲要》，构建了为青年理想信念教育“点灯引路”的系列策略，从方向与路径上为新时代加强和改进共青团思想政治引领工作、增强青年理想信念教育提供借鉴参考。概而述之，用理想信念凝聚广大青年既是中国共产党保证百年青年运动的成功经验，又是新时代赋予青年运动价值要义的必然选择。

（三）保持青年价值引领实践与时代同脉动

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阶段调整其青年价值引领的具体目标与策略，这是由党的中心任务变化发展决定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必须始终代表广大青年、赢得广大青年、依靠广大青年。”^② 这一重要论述一方面充分肯定了中国共产党与青年之间的血脉联系，另一方面又饱含着引领青年投身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的期待与要求。保持青年价值引领实践与时代同向同行需要从党的中心任务与青年身心发展两个维度进行思考与解读。其一，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具有动态性。“党的中心任务是一个历史范畴，是随着历史发展变化的，思想教育活动必须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开展，并因地制宜、与时俱进的做出改变，以适应党的中心任务而调整。”^③ 面对不断调整变化的中心任务，中国共产党对青年的价值期待自然因时而新。新时代青年置身于“两个大局”之中，其所面临的历史任务迥异于以往，这就要求他们具有鲜明的时代自觉性，主动力行，担当中华民族

^①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307页。

^② 习近平：《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9年5月1日，第2版。

^③ 王海亭：《中国共产党领导青年运动的发展规律与启示》，《西南林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2021年第3期，第12—26页。

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在实践中矢志践行党对青年的时代要求，不断满足党的中心任务对青年的期待。其二，青年的身心发展特点表现出鲜明的时代性。不同时代语境中的青年表现出差异化的思维方式与接受习惯，这就要求青年价值引领目标、内容与策略与时俱进。如此，党对青年的价值引领实践才能更加贴近青年，更好地引导他们投身到党和国家的建设发展大局之中。

（四）发挥共青团作为党的青年工作的助手作用

2022年是中国共青团成立100周年。回溯中国共青团成立发展的百年历程，中国共青团始终与中国共产党的使命和职责一脉相承。作为联系青年、服务青年、凝聚青年的青年群众组织，共青团始终不忘其宗旨和任务，坚持“党有号召、团有行动”，团结带领青年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贡献力量。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共青团用“革命救国”的思想理念引航青年的理想信念；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共青团教育引导青年发挥其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的先锋力量；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共青团开展了“长征接力有来人”、“五讲四美三热爱”、做“四有新人”等教育，为党中央培养“四有”青年提供了强大的精神支持；进入新时代以来，广大青年在共青团的组织下，在国家建设、创新创业、脱贫攻坚、污染防治、疫情防控等各领域积极作为，奉献力量。共青团将党对青年的价值要求与期待转化为切实可行的教育活动，形成了“共产党—共青团—青年”的有效联动格局。随着社会经济改革的深入发展，青年原子化分布的现象更加明显，这对中国共产党价值引领的实践也提出了很大的挑战。在此背景下，中国共产党要重视共青团的组织力建设，将其作为引领青年的重要“手臂”。中国共产党借助共青团的力量将广大青年团结起来，才能更加有力地推进其价值引领的工程。

青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先锋力量。加强价值引领，教育广大青年自觉接受党的领导，始终是中国共产党的凝聚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磅礴力量的有效做法。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围绕历史使命与时代任务等主题，确立了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价值引领目标，并通过理想信念教育、发挥共青团的手臂作用等方式推动青年运动的蓬勃发展。对青年的价值引领既是历史范畴又是永恒范畴，当前必须借鉴好百年历程的有益经验，将做好青年价值引领作为党的青年工作的重中之重，凝聚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青春力量。

责任编辑：李亚强

新时代科学家精神的内涵阐释与践行路径

毕俪文, 王文浩

(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2)

摘要: 科技创新是新时代增强国家竞争力的重要依托。科学家精神是涵括爱国、创新、求实、奉献、协同和育人六个维度的统一体, 既是支撑当代中国科研事业长足发展的精神支柱, 也是“十四五”时期把握发展主动权, 占领科技制高点的内生动力。广大科技工作者不仅是科学家精神的塑造者, 更是在新发展阶段致力实现科技创新自立自强、践行科学家精神的实践者。在新时代践行科学家精神, 科技工作者要恪守爱国主义原则, 主动担当作为, 以国家需要为科研导向, 同时严格遵守学术道德, 推动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建设, 并以亲身经历为科研体制创新建言献策, 积极营建崇尚科学的良好氛围, 继承和发扬求真务实的优良传统, 形成弘扬科学家精神的社会合力。

关键词: 科学家精神; 科技创新; 科技强国; 践行路径

中图分类号: D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2811 (2022) 02-0021-07

2021年5月28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两院院士大会和中国科学技术学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出“弘扬科学家精神, 涵养优良学风”的要求, 号召以两院院士为核心的中国科研群体积极践行科学家精神, 勇攀科技高峰, 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①。科学家精神是对广大科技工作者砥砺奋斗, 推动科技事业不断向前发展的精神提取。当前中国迈进新发展阶段,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征途更加险峻, 各方面的挑战更是层出不穷, 新一轮的产业革命和科技革新掀起了新的时代浪潮, 一系列复杂的结构性难题亟待解决, 而维护国家安全与利益的现实需要, 又对加快科技创新、延展科技优势提出更高要求^②。另外, “科学家的越界或不端行为, 已经严重危害了科学事业的发展”^③, 整治学风和学术乱象, 不仅需要从体制机制层面着力, 还需要精神引领和科技工作者自我意识的培育。在此背景之下, 广大科技工作者践行科学家精神, 正是回应时代命题、应对挑战之急、承担责任之重的必然要求。

基金项目: 武汉大学重点马克思主义学院建设项目“全球战疫视阈下中国力量、中国担当与中国精神研究”(WZM04004)。

作者简介: 毕俪文, 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 中国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党外知识分子统战工作理论研究基地研究人员, 主要研究方向为统一战线学、党外知识分子工作; 王文浩, 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 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共党史与党建。

① 习近平:《加快建设科技强国 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求是》2022年第9期,第14—15页。

② 《时代呼唤科学家精神》,《科技日报》2019年6月13日,第1版。

③ 潜伟:《科学文化、科学精神与科学家精神》,《科学学研究》2019年第1期,第2页。

一、科学家精神发展脉络梳理

一部中国近现代科学史，就是一部科学家精神发展史。不同时代背景下淬炼凝结的精神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前进的动力支撑，也是完成特定历史任务、承担历史使命的客观要求。科学家精神的内涵与外延是与时俱进、愈渐愈新的。五四运动以来，在内忧外患的夹缝中，一批先进知识分子担负起沉重的历史使命，开拓进取，孕育出求真务实的科学精神和矢志报国的家国情怀，是为科学家精神的始源。新中国成立后，广大科技工作者在“向科学进军”的系列科技攻关实践中，锻造和培育出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科学家精神。改革开放以来，科技工作者们接续奋斗，为中国科技事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与实践基础，锻造出勇于创新、至诚报国的科学家精神^①。进入新时代，广大科技工作者勉励前行，赋予了科学家精神新的时代内涵。

（一）科学家精神之缘起：五四运动时期，进步知识分子率先举起“赛先生”的伟大旗帜

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一批先进知识分子担负起救亡图强的历史使命，从学习西方的器物到革新制度，再到更新文化，一改盲目自大、闭关自守的社会风气。1919年，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积郁已久的民族情绪爆发出来，先进知识分子高举“民主”“科学”两面大旗，发动了五四运动。五四运动孕育出了“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宝贵精神财富，揭开了科学革命的历史序幕，对中国科学家精神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在这场运动中，中国青年知识分子群体将“德先生”“赛先生”引进中国的大门，科学知识在中国得到了空前的传播，各个国家的科学刊物广泛流传，使得科学精神深入人心。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中指出，“科学者何？吾人对于事物之概念，综合客观之现象，诉之主观之理性，而不矛盾之谓也”^②，认为“赛先生”代表着一种理性，并倡导实证主义、鼓励批判与怀疑的精神。此正所谓科学精神的基本内核，其对理性、求实的追求是科学家精神萌生和发展的源头。在五四运动时期，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等一大批先进的知识分子为中国近代科学精神的生成和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也让广大人民群众在这一场伟大的爱国革命运动中初步接受了科学精神的洗礼。之后，崇尚科学的精神与批判求实的学风逐渐在中国的学术研究中蓬勃兴起。

（二）科学家精神的接续发展：新中国成立后，老一辈科技工作者心忧祖国、科研攻关

新中国成立初始，面对一穷二白、百废待兴的国内局势，老一辈科技工作者矢志报国、前仆后继，以炽热的报国之心投入到祖国建设之中。“中国航天之父、导弹之父”钱学森，不顾一切阻拦，想方设法回到祖国，致力于新中国的导弹国防事业，潜心研究，成果丰硕；“世界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一生致力于杂交水稻的研究，即使身处最艰苦的环境，也矢志不渝，不断尝试和创新，促成杂交水稻产量指数式增长，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中国的粮食安全问题。广大科技工作者在“向科学进军”的攻关实践中，锻造和培育出朴素的科学家精神。这一时期的科学家精神展现出以爱国主义为核心信念，以科学精神为基础构成，以奉献为价值取向，以奋斗、协同、育人为实践和方法论原则的多维架构^③。科学家精神的内涵逐渐从“民主”“科学”的基本概念性阐释，过渡到热爱祖国、舍己奉献、科技攻关的身体力行之中。从“祖国需要我”的爱国使命，到“潜心研究，甘于奉献”的责任担当，老一辈科技工作者始终牢记使命、不忘重托，将自己的青春铭刻在祖国前进的大道上，铸就了一座又一座科技丰碑，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① 欧阳雪梅：《新中国以科学家精神推进科技创新的历史考察》，《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2020年第6期，第98页。

^② 陈独秀：《陈独秀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95页。

^③ 丁俊萍、李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科学家精神及其价值》，《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20年第3期，第67—69页。

改革开放后,科技工作者们接续奋斗,为中国科技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与实践基础,锻造出勇于创新、至诚报国的科学家精神。

(三) 科学家精神的新面向:进入新时代,广大科技工作者矢志不渝地致力科技创新

进入新时代,国内外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建设科技强国迫在眉睫,科技创新在大国竞争中的战略地位迅速攀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更需要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历史机遇。一方面,“全球科技创新进入空前密集活跃的时期,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重构全球创新版图、重塑全球经济结构”^①。另一方面,中国的科技创新事业也进入到新的历史方位,“创新”业已位居“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②,构筑健全高效的科技创新生态体系,推动科技创新跨越式发展,更需要新时代科技工作者们群策群力。在新征程上,我国广大科技工作者“扬科技之雄声”,在科技创新领域不断提出新理论、开辟新路径、寻找新方法,推动原始创新突破性发展。曾为武汉病毒研究所研究员的石正丽,一直围绕国家新发传染病防控需求开展研究,对“非典”病毒进行溯源研究,理清了完整的宿主传播链,为准确判断新冠疫情的病株提供了理论铺垫,并用全链条证据证实了新冠病毒的存在;新一代北斗导航卫星首发星研制团队进行了近百项大型实验和系统间接实验,终于制造出国内首创的卫星技术系统。新时代的科技工作者们始终秉持科学家精神,传承并弘扬老一辈科技工作者的赤诚热怀,用科研成果践行不负祖国和人民的责任担当。

二、科学家精神的内涵阐释

科学家精神并不是主观臆造的产物,而是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精神在科技领域的具体表征,它产生并孕育于“科学救国”“科教兴国”“科技强国”的伟大历程之中,其价值光辉闪烁在求真务实、开拓创新的科学实践之中。2019年6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联合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作风和学风建设的意见》,要求大力弘扬“胸怀祖国、服务人民的爱国精神,勇攀高峰、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追求真理、严谨治学的求实精神,淡泊名利、潜心研究的奉献精神,集智攻关、团结协作的协同精神,甘为人梯、奖掖后学的育人精神”^③,高度概括了科学家精神的深刻内涵,并将其作为引领我国科技工作者科技创新实践的价值理念与道德标杆。

(一) 胸怀祖国、服务人民的爱国精神

中国科学家爱国精神的形成,既有传统文化的情感浇灌,更有“落后就要挨打”的民族复兴使命的驱动,是科学精神的时代化、中国化和人格化,是中国科学家群体呈现出的独特精神气质,是爱祖国与爱科学的辩证统一。科学无国界,科学家有祖国,爱国是科学家精神的重要内容,这也是科学家精神区别于科学精神的一个重要方面。从李四光的“急国所急,赤诚报国”到钱学森的“我的归宿在中国”,再到黄大年“用生命谱写爱国人生”,一代又一代的科技工作者“终不悔为国为民,攀高峰只争朝夕”,将自己的科学追求融入维护国家利益和满足人民需求之中,潜学研究,无怨无悔,开拓创新,铸就了中国科学史上彪炳史册的伟大功勋,这也深刻昭彰了中国科学家对信念、原则的坚守,始终坚持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至上。正是因为广大科技工作者思国家之所思、急国家之所急,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舍我其谁的责任感,为建设世界科技强国提供了坚定的智力支撑。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部:《中国科技人才发展报告·2018》,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9年,第126—127页。

^②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人民日报》2020年11月4日,第1版。

^③ 《关于进一步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作风和学风建设的意见》,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4—6页。

（二）勇攀高峰、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

科技工作者以探究真理、发现新知为使命，因而任何一项核心技术的创新，无一例外源自科学理论的重大突破，这也意味着科技工作者需要在大胆假设严谨求证的基础上，对现有知识体系进行突破和创新。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惟创新者进、惟创新者强、惟创新者胜。习近平总书记在科学家座谈会上指出，“广大科技工作者要树立敢于创造的雄心壮志，敢于提出新理论、开辟新领域、探索新路径，在独创独有上下功夫。要多出高水平的原创成果，为不断丰富和发展科学体系作出贡献。”^① 2021年9月，中央人才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要求广大科技工作者要心怀“国之大者”，为国分忧、为国解难、为国尽责^②，在国家重要战略科技领域和核心攻关项目中砥砺奋斗，做出新的贡献。当前，国内外形势的深刻变化，要求广大科技工作者贯彻创新理念。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二十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五次院士大会和中国科协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强调，“以与时俱进的精神、革故鼎新的勇气、坚韧不拔的定力”^③，抢占先机，迎难而上，用科技创新破解发展难题，敢啃“硬骨头”，勇于跨越深化改革的“险滩”，努力实现更多“从0到1”的突破。

（三）追求真理、严谨治学的求实精神

求实是科学的品格，科学研究是面向未知领域的探索，科学研究一旦失去求实精神，就会失去最本质的要求，创新也就失去了原动力。诚如中国科学社创建人任鸿隽先生所指出，“科学精神者何，求真理是已。”科技工作者之使命，在于寻求真理。理性信念是人类反思自我、反思实践的产物，是人类社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精神支柱，科学家精神突出表现在对理性的崇尚和追求上。科学研究要发扬求实精神，就是要敢于质疑权威、不信教条、不因循守旧、不急功近利，始终坚守实践出真知的科研原则，而一味地“追速度”“求数量”“赶进度”是对求实精神的背叛和践踏。同时，贯彻求实精神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指导行动、开展研究，摒弃封建愚昧和资产阶级腐朽思想。

（四）淡泊名利、潜心研究的奉献精神

精神追求与物质生活的高度统一，是中国科学家的普遍品质，反映了中国科学家将自身追求与国家、民族命运紧密贴合的价值导向。如钱七虎院士所言，真正的科学家对名和利的追逐都很淡然，“我们搞科学是要当成事业，不是获得名利的手段。不为私心所扰、不为名利所累、不为物欲所惑、不计个人得失。这就是追求真理，献身科学，也是科学家精神的精髓”^④。奉献精神是崇高的精神品质，是科学家精神的独特印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祖国大地上一座座科技创新的丰碑，凝结着广大院士的心血和汗水。我们的很多院士都具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深厚情怀，都是‘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的民族英雄！”^⑤ 奉献精神需要实践斗争的磨砺，需要“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崇高情怀来滋养。我国科技事业的每一个突破，都源于科技工作者们将奉献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生动实践，诠释了时代赋予科学家精神的新内涵。

（五）集智攻关、团结协作的协同精神

科学需要合作，大科学需要大合作，这是科学家精神的内在要求，也是现代科技进步的客观

① 习近平：《在科学家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0年9月12日，第2版。

② 新华社：《习近平出席中央人才工作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2021年9月28日，http://www.gov.cn/xinwen/2021/09/28/content_5639868.htm，2022年5月15日。

③ 习近平：《加快建设科技强国 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求是》2022年第9期，第7页。

④ 詹媛：《赓续创新奋斗的精神血脉——科学家精神述评》，《光明日报》2021年10月12日，第5版。

⑤ 习近平：《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九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四次院士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8年5月29日，第2版。

规律和发展模式。纵观人类科技发展史，科学家“单打独斗”的个人探索时代一去不返，科技共同体的时代业已到来，科学研究的组织化程度日益提高，协同精神已经是全球化时代追求科技进步之必需品质。当今世界纵深发展，实现跨学科、跨部门科技创新的迫切性与日俱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有把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上，才能真正掌握竞争和发展的主动权，才能从根本上保障国家经济安全、国防安全和其他安全。”^① 研究核心科技，就是要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优势，聚天下英才而用之，构建协同攻关、跨界协作的科研体制，提升跨界思维和协作创新能力，突破科研瓶颈。当科学家的个人英雄主义汇入集体主义的洪流时，正是新时代科学家践行使命担当的具体体现。在世界关联日益紧密的当下，只有始终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宗旨，推动国家间的科技交流，加强团结协作，才能为人类的发展和幸福做出更大贡献。

（六）甘为人梯、奖掖后学的育人精神

终身之计，莫如树人。要在科技领域实现高水平自立自强，归根到底还是要依靠高水平的创新人才，“培养创新型人才是国家、民族长远发展的大计”^②。科学研究是一项承前启后、不断超越，站在前人的肩膀上继续奋斗的伟业，科学事业的发展需要薪火相传、代代相继才能持续繁荣。在科技界，一代又一代的科学家之间传递的不仅是知识和方法，更有支持青年科技工作者在重大科研任务中“挑大梁”的精神和门风。弘扬科学家精神也不在一时一事之功，只有培养并储备大量的优秀科技人才，才能接续提升国家的科技创新能力。因此，科学家精神还突出表现在科技工作者识才、育才、用才的过程之中。广大科技工作者要重视人才自主培养，慧眼识才，争当伯乐，以甘为人梯的博大胸襟，尊重人才、提拔人才、珍惜人才，让科研后辈有渠道可行、有资源可用、有知识可获。科研后辈也要甘于沉淀，甘坐学术的冷板凳，立下鸿鹄之志，争取在前人的基础上做出更大贡献，为国家发展提供更为有力的科技支撑。

三、科学家精神的践行路径

广大科技工作者具有独立的思考能力、丰富的知识储备和开阔的学术视野，是助力中国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跻身科技创新强国的中坚力量。“十四五”时期，科技工作者们应积极顺应时代潮流、担负时代重托，在现代化进程中施展科技抱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知识分子历来有浓厚的家国情怀，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重道义、勇担当。一代又一代知识分子为我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贡献智慧和力量，有的甚至献出宝贵生命，留下了可歌可泣的事迹”^③，号召广大科技工作者应时代所需，勇挑重担，传承、弘扬并践行科学家精神，共推中国科技事业发展进步。

（一）新时代科技工作者要勇于担当使命，恪守爱国主义原则

当前，国际科技竞争已进入白热化阶段，大国间综合国力的较量更多地依靠科技实力的支撑，而广大新时代科技工作者正是推进中国在新发展阶段提高科技创新能力、迈入科技创新强国的主力军和动力源，因而必须号召新时代的科技工作者践行科学家精神，勇于担当，以国家需要为科研导向，面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砥砺前行。一方面，新时代科技工作者要瞄准科技前沿和国家战略需要，选定研究方向，勇于承担基础性、长期性的科研攻关任务，将个人学术发展和科学追求融入祖国强盛的征途之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通过重大科技问题带动，在重大应用研究中

^① 习近平：《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九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四次院士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8年5月29日，第2版。

^② 习近平：《加快建设科技强国 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求是》2022年第9期，第13页。

^③ 《我国广大知识分子要主动担当积极作为 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多作贡献》，《人民日报》2017年3月5日，第1版。

抽象出理论问题,进而探索科学规律,使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相互促进”^①,强调以关键技术和基础学科为研究重点,完善科研体系的底层架构,推动原始创新,努力实现关键核心技术的自主可控,以及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良性互动、共同发展。另一方面,新时代科技工作者要加强理论学习,在唯物史观指导下研习“四史”,坚守红色阵地,坚定理想信念,进一步深化对党的宗旨和初心使命的认同,自觉增强广大科技工作者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主动担负起历史责任和时代使命,在科研事业上不懈奋斗、奋发图强。同时,要发掘和宣扬广大科技工作者的光辉典范,利用线上线下多种形式,开展“老一辈科技工作者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邀请新时代杰出科技工作者参与“现身说法”等活动,树立典型,丰富传播和弘扬科学家精神的渠道。

(二) 新时代科技工作者要严守学术道德底线,加强知识产权保护

在市场经济浪潮冲击下,社会思潮日渐多元,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商业化思维日渐渗透到科研领域,再加上相关部门监管不力和学术科研考核机制的固有弊端,以致学术造假、论文买卖等科研乱象一时间甚嚣尘上,严重损害了科技创新效率和科研工作者的积极性,并且造成了科研资源的严重浪费。鉴于此,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和学风建设,营造崇尚科学精神的社会氛围,真正做到“让学术的归学术”,成为应时之举。第一,新时代科技工作者要始终秉持学术真实性原则,严守学术道德底线,珍惜学术声誉,继承严谨求实的优良传统,潜心钻研、静心笃志、以身作则,培养独立思考和勇攀学术高峰的精神与能力,净化学术环境。第二,新时代科技工作者在砥砺奋进、严谨治学的过程中,要致力良好科技创新生态的营造与完善,发挥学会、研讨会等各类学术共同体的示范引领和监督纠察作用,推动开展学术道德和学风建设行动,弘扬科研诚信和科技伦理。同时,发挥榜样作用,打造一批具有学科背景和翔实史实的正反两面宣讲视频,鼓励和警示广大科技工作者在科研活动中秉承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推动建立风清气正的学术氛围。第三,新时代科技工作者要结合专业知识和发展需要,推动知识产权制度朝现代化方向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第一条即规定,“为了保护专利权人的合法权益,鼓励发明创造,推动发明创造的应用,提高创新能力,促进科学技术进步和经济社会发展,制定本法。”^②完善知识产权制度,是激励创新与打造优势品牌,规范市场秩序和促进交流发展的重要保障。科技工作者应基于自身在科研领域中的实际感悟与切身体验,为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建设建言献策,帮助填补法律漏洞,修正制度讹误,使其更好地适应科技创新现状,更好地为加强世界文化交流与科技合作服务。

(三) 新时代科技工作者要助推科研体制创新,为科技发展扫清障碍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科技管理改革不能只做“加法”,也要善于做“减法”,要通过科研体制改革完善评价体系,转变管理职能,帮助科技工作者们从不必要的繁琐事务中抽身出来,专心科研事业^③。广大科技工作者长期居于科技创新领域的第一线,更为了解当前科研体制的弊端与短板,而新时代科技工作者们所具备的国际视野与专业素养,又为其作为参与主体助力构建有利于“干事业”的科研体制机制提供了前提。首先,在政策层面,新时代科技工作者要利用智库、人民代表大会和听证会等平台,进入决策环节,结合科研实际有针对性地建言献策,提高科技政策与科技创新实践的适配度,纾解由政策理念和政策执行方式等与科研实际情况错位而招致的体制性困境。同时,政府以及科研管理机构要大力引进、培育和任用高端人才,创新政策工具的使用与配合,强化政策体系的顶层设计,有效衔接和匹配激励性政策与惩戒性手段。其次,在人才培养机制与评价体系方面,新时代科技工作者要充分利用信息时代广阔的知识交流渠道,推动搭建跨

① 习近平:《在科学家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0年9月12日,第2版。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13页。

③ 习近平:《加快建设科技强国 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求是》2022年第9期,第11—12页。

学科、交叉领域的学习与科研平台，整合不同学科专长，发挥集群优势，培育一流人才，打造具有竞争力的跨学科团队。另外，要推动破除“五唯”改革落到实处，结合科研工作者成长成才规律创新评价标准，突出目标导向，强化过程性激励，增强青年科技工作者的事业成就感和获得感。最后，在推动产学研融合发展与优化成果激励方面，新时代科技工作者要加快推进科技成果向生产力的转化，面向市场需要进行科技创新，构建产学研深度融合发展的平台体系，突破科研成果脱节于产业发展的瓶颈，并拓宽社会化增收来源，推动科技资源分配制度改革，扩大科研单位在科研成果收入分配上的自主权，加强科技成果产权收益的正向激励作用。

（四）营造崇尚科学的社会氛围，继承求真务实的优良传统

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将人的本质概括为“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①，强调社会关系对人的发展的重要意义。每个现实的人都不能脱离社会关系而独立存在，社会关系深刻影响着每一个人的生活状态和品行，推动着个体的社会化趋向不断深化。因此，营造尊崇科学的社会氛围，涵养风清气正的学术环境，继承求真务实的优良传统，建设严谨求实的学风，发挥优秀文化潜移默化的塑造作用，对于弘扬和践行科学家精神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实践价值^②。其一，通过主流媒体、网络教育平台等，开展科普教育，对优秀科技工作者事例进行报道和宣传，发挥社会舆论的正向引导作用，提升人民群众的认知水平和科学素养。同时，严厉打击以任何形式出现的论文注水、买卖等学术不端行为，惩治学术腐败和学术霸权，并对此类事件进行严肃处理 and 依法公示，以发挥其反向警示作用，厚植全体社会成员对科学事业的敬畏感。其二，构建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三位一体的联动机制，培养学生群体的科学态度与求实作风，进而带动良好科研风气的发展。在学校教育中，要引入科学普及类课程，提升学生群体对科学事业的认同感和理解力；在家庭教育中，要注重发展代际间的文化传递，长辈要以身作则，引领学生群体发展科学意识；在社会教育中，要深入挖掘历史资源，使广大科技工作者可歌可泣的科研事迹占领舆论阵地，进行广泛的科普宣传。其三，发挥广大科技工作者的主体作用，遴选出作风优良、术有专攻的朋辈榜样，并有计划地使其事例浸入广大科技工作者的科研工作与日常生活之中，发挥朋辈示范效应，推动尊重科学、严谨求实的学风建设，呼吁科技工作者践行科学家精神。

四、结语

“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长久生存的灵魂，唯有精神上达到一定的高度，这个民族才能在历史的洪流中屹立不倒、奋勇向前。”^③ 弘扬和践行科学家精神，既是持之以恒推动科技创新，建设科技强国的应时之举^④，也是疏解当前困扰科技创新事业的体制机制问题，涤除学术不端等恶劣行径的必然举措。时值新发展阶段的关键时期，中国的科技发展进程正处于从量的积累向质的突破、从点的飞跃向系统能力提升的重要节点，亟须筑牢科技创新自立自强这个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这正是新时代科技工作者们大有可为、大有作为的时代。身处历史洪流中的新时代科技工作者应积极践行科学家精神，承担时代责任、回应时代之问、解决时代之难，以“舍我其谁”的担当勇气和“顽强斗争”的坚韧毅力担负起新时代的历史使命，在实现自身价值与推动科技创新的二维共进中，打造科研高地，夯实国家在国际竞争中的优势地位，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做出贡献。

责任编辑：念兴昌

①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35页。

② 何鼎鼎：《用科学家精神激发科技创新》，《人民日报》2019年6月13日，第9版。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13页。

④ 荷浩：《科学家精神是宝贵的精神财富》，《团结报》2020年10月17日，第2版。

统战理论与实践

香港特别行政区宪制中文化主权的规范诠释

张 博

(华东政法大学 法律学院, 上海 200042)

摘 要: 文化主权系将本国民族文化上升为国家意志, 并基于此生成对本国族文化的最高且独立的支配性权力。文化主权作为国家主权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宪制亦应遵从、体现并加以确认。笔者从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宪制基础出发, 首先厘清香港的宪制基础, 进而通过规范诠释, 剖析其宪制层面国家文化主权内涵, 使国家文化主权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宪制中得以确立和维护, 在法治建设上为中央对香港特别行政区实行全面管治筑牢制度基础, 牢牢把握香港局势发展的大方向和主导权, 把对香港的有效管治落到实处。

关键词: 文化主权; 一国两制; 宪法; 香港基本法

中图分类号: D676.5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2811 (2022) 02-0028-08

国家文化主权是人民文化主权在宪法中确认和赋予国家行为体的主权的重要组成部分,^①文化主权受到侵蚀和践踏必将导致国家主权, 包括国家政治主权、国家领土主权, 受到威胁甚至破坏。然而, 许多事实表明, 香港社会尚未形成对“一国两制”中“一国”的高度认同感。^②香港社会强烈的“本土意识”以及从中异化而来的极端思想——“港独”意识及其势力, 在形形色色、林林总总的街头骚乱之中, 不断冲击着国家文化主权。文化主权在港长期被漠视、冷遇的现状, 源于文化主权在宪制层面未得到应有的确立与维护, 这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宪制基础建设完善中需要深入反思。

一、作为国家主权组成部分的文化主权的含义与表现

(一) 文化主权的含义

从主权理论的历史发展进程来看, 自让·博丹首次对主权理论进行系统阐述以来, 其所包含的具体内容是随着时代的变化不断充实、丰富的。现代国家的主权权力渗透在各种领域, 文化主权便是国家主权在文化领域的集中表现, 其与国家主权内在构造里, 与政治主权、经济主权同样重要且不可或缺。^③但是, 文化主权又不同于一般的传统政治主权和经济主权, 其具有自身的特殊

作者简介: 张博, 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学院硕士研究生, 主要研究方向为宪法学与行政法学。

^① 陶庆:《论人民主权与国家主权的两分性与统一性——政治文明运行机制中的宪政由来与本质》,《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07年第1期,第20页。

^② 王承就、赖慧婷:《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时代意蕴与培育路径——基于对香港民众国家认同教育问题的思考》,《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2年第1期,第35—38页。

^③ 韩源、张林:《中国国家文化主权及其战略构建》,《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7年第4期,第86页。

性，即其权力是以文化为载体得以实现的。

一方面，文化主权具有对内最高性，即有权根据自身的具体情况创制并实施本国的文化制度及相应法律。与此同时，当此种文化制度及法律一经创制并且实施时，就应当得到尊重与服从。一个国家的文化系由各文化单元共同构成的，任何地方、阶级、民族的文化都应当服从于至高的国家文化主权，不得有所超越，从而更好地维护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社会的稳定以及文明的赓续。

另一方面，文化主权具有对外独立性，即国家有权根据自身的文化制度及法律对关涉本国对内、对外文化事务做出处理，而不受任何外部因素干扰。这种对外独立性尤其是针对文化霸权而言的，是文化主权的积极表现形式。发展中国家在政治意识形态、价值观念以及生活方式等多方面，遭遇了来自发达国家的文化压力。此种态势促使文化更为紧密地与主权相结合，因此，捍卫本国的文化就是捍卫主权。^① 一个国家或民族的独立品格及个性的维持依赖于其文化上的独立性，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② 假若丧失了这种独立性，国家的完全独立也就无从谈起。所以，捍卫一个民族的尊严，必然上升到主权的高度，体现在文化的领域，必然以文化主权来表达和凝聚。

综上所述，文化主权系指现代民族国家将本国族的文化价值观、信仰以及习俗上升为国家意志，从而意味着对本国族文化所拥有的最高且独立的权力与权威。^③

（二）文化主权的表现

文化主权并非悬置的，而是现实的、显在的，处于风险、挑战、侵蚀、冲撞之中的。故，其一方面对内表现为高度的国族认同，即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感与归属感；另一方面，其对外表现为文化主权安全，即一个国家的文化生存与发展不被威胁或不处于危险的状态。

1. 文化认同

文化认同是一种人的社会属性的表现形式，具体指个人将自我归属于某一文化或民族群体的心理状态和价值认可。其作为一种民族或国家的文化心态，被杜尔凯姆称为“集体的良知”。^④ 其本质是对某一文化的信仰、道德、政治生活和社会实践等方面的认同。文化认同在规范个人行为、塑造社会心理、巩固统一、凝聚人心上发挥着重要作用。一方面，文化认同可以明晰身份，构建规范，维护公共秩序，供给个体精神动力并培养其群体安全感；另一方面，文化认同也是现代民族国家团结其成员、巩固统一的核心力量。在经济不断走向全球化、政治不断走向多极化的今天，文化认同与文化主权二者之间关联得越发紧密。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都是建立在文化认同的基础之上的，如果不能实现文化认同，国家和民族便失去了其精神凝结核，变得松散并易于分崩离析。届时，文化主权也会因文化认同的丧失而被削弱甚至一同消失。是故，文化主权，对一国国民而言，表现在其思想文化状态上则是对该国家及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念、主流意识形态等的高度认同。

2. 文化安全

文化安全的本质是国家文化主权不受侵犯，不受挑战，不受侵蚀。因此文化安全是对国家文

① 王沪宁：《文化扩张与文化主权：对主权观念的挑战》，《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3期，第10页。

②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40页。

③ 孙万菊：《论文化主权》，《兵团党校学报》2004年第4期，第43页。

④ 贺彦凤、赵继伦：《全球化时代中国文化认同的建构》，《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7年第1期，第202页。

化主权稳定和安定状态的主客观评价,其致力于在“文明冲突”中捍卫文化主权的自主性与独立性。维护文化安全的目的就是捍卫文化主权,进而捍卫国家的整体安全。邓小平高度重视文化安全的重要性,1983年,他针对西方的文化霸权指出:“如果我们不及时注意和采取坚定的措施加以制止,而任其自由泛滥”“后果就可能非常严重”,这“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①之后的苏联解体证明了邓小平的判断。从这样的意义出发,所谓国家文化安全,是指国家文化生存免于威胁或危险的状态。^②

二、香港特别行政区宪制中文化主权规范的识别、表述与内容

遵循法治是香港社会的核心价值观之一,香港特区宪制的目标中包含着对文化主权的维护,文化主权只有在香港宪制内得到规范诠释才能得以彰显,进而使港人信之、敬之、遵之。笔者借由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下简称《宪法》)、《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以下简称《香港基本法》)文本中有关文化主权的条款的梳理,力图推动文化主权在香港特区宪制中的存在与体现的规范化、体系化,形成保护文化主权的宪制秩序,进而化解香港社会的精神危机,即其社会心理与国家认同上的多元冲突性与矛盾性,最终落实港人的爱国义务,实现文化主权。

(一) 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宪制基础

《宪法》和《香港基本法》共同构成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宪制基础。^③《宪法》在香港特区的适用系“一国两制”中“一国”原则在法治上的最高体现。^④主权所及之处亦应当为宪法所及之处,此系宪法作为根本法、最高法的空间效力之体现,二者是不可切分的。我国国家结构形式所采用的单一制也是探讨香港特区宪制问题不可忽视的因素,^⑤根据单一制的原则,地方的权力在本源上全部属于中央,一个国家一部宪法,宪法效力及于全国。必须认识到,《宪法》中关于特别行政区的规定恰恰是国家治理对普遍性与特殊性原则相结合的遵循,同时也是立宪过程中结合一般性与例外性,坚守原则性之余不失灵活性的立宪规律之体现。

《宪法》是《香港基本法》的立法依据和效力来源。《宪法》中所规定的指导思想、领导核心、根本制度等反映的是全国人民的共同意志,是“一国”之体现,也是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命脉之所在。香港特区的设立以及《香港基本法》的制定是全国人民共同意志的体现。《香港基本法》是《宪法》的子法,脱离了母法来谈《香港基本法》的宪制性地位是无稽之谈。^⑥只有坚持《宪法》所蕴含的“一国”之大义,才能发挥其宪制性法律的制度保障作用。避而不谈《宪法》,而将《香港基本法》单独视为香港之“宪法”,是对“一国两制”的根本性违背,是对主权的冒犯。

应当认识到《宪法》第31条是《宪法》中的“但书”条款,其具有特殊性,乃设立香港特区以及规定其制度的总括性宪法依据。其并不与《宪法》中的其他条文相矛盾,因为《宪法》在某种程度上是主权者命令与意志的体现,而主权具有对外独立性和对内最高性。因而主权自身并

① 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5页。

② 胡惠林:《国家文化安全学》,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27页。

③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白皮书》,2014年6月10日, <http://www.scio.gov.cn/ztk/dtzt/2014/31039/31042/Document/1372893/1372893.htm>, 2022年3月31日。

④ 沈春耀:《切实维护宪法和基本法共同构成的特别行政区宪制基础》,《中国人大》2019年第24期,第19页。

⑤ 王禹:《“一国两制”下中央对特别行政区的全面管治权》,《港澳研究》2016年第2期,第6页。

⑥ 胡锦涛、刘海林:《论特别行政区宪制基础的变迁及其意义》,《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4期,第147页。

不受一切外部力量的制约，仅受自我意志的限制。因此，可以将《宪法》第31条视为“宪法特许”，这是在非实施联邦制国家，由全国宪法给予某些地方“高度自治”，从而产生类似地方最高法规范的情形。^①

《香港基本法》根源、从属于《宪法》并统一于国家法律体系之中，系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通过的国家基本法律，是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具体落实《宪法》关于特别行政区制度规定的法律，是全面规定特别行政区制度的宪法性法律。^②值得注意的是，《香港基本法》第11条规定，《香港基本法》是特别行政区内部各项制度、政策和法律体系的依据与基础。特别行政区各项制度和政策之所以是以《香港基本法》的“规定为依据”，是因为建立在“根据《宪法》第31条”的基础之上。

然而，《香港基本法》的制定并非单纯以《宪法》第31条为依据，而是依据《宪法》整体。这是由宪法的根本法地位所决定的，系宪法自身特性所要求的；另外，这也是主权的不可分割性与唯一性的体现。而且，倘若只有某一宪法条文孤立地适用于香港特区，此种认识在法理上亦存在障碍，毕竟单一的宪法条文仅仅是施米特口中的“宪法律”。^③宪法作为根本法意义上的整体宪法秩序的存在方是其效力的前提，否则，孤立来看，其并不存有宪法规范的意义。根据《宪法》奉行的单一制原则以及“一国两制”的精神，《宪法》应当整体上适用于香港特别行政区。

（二）《宪法》对文化主权的规定

1. 《宪法》序言

作为主权者，人民（中华民族）对自身历史文化的文明成果和发展传承的自豪、自信、葆有、宣示，是文化主权的客观基础与权力“客体”的昭示，是文化主权的本源、本体的客观性、必然性、正当性、排他性的根据和理据。《宪法》序言的产生首先是因为制宪者的需要。《宪法》序言第一自然段开宗明义：“中国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国家之一。中国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文化是共同创造的，这体现了中国在整体化国家建构过程中的文化属性。中国在某种程度上是以一种文化共同体的状态而存在的，文化是维系国家认同的重要纽带，中国一词不仅是地理上的，也是文化意义上的。有学者甚至认为，中国是伪装成国家的文明。^④这或许是文化主权所具有的政治大义，“文化中国”这一意涵是团结海峡两岸的有力武器，其站在道德制高点上，凭借对自身历史文化的肯定来实现“文化认同”，进而构建国家认同。这也是“一国两制”中“一国”原则的由来及其正当性的体现。

《宪法》序言第七自然段还规定：“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首先，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必然是文化上的强国，文明与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文明”作为前缀的形容词，已经点明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文化属性，展现了文化这一要素在中华民族复兴进程中扮演的关键角色，是文化这一要素的直接体现。其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强调两点：其一是中华民族，这种复兴是以中华民族为主体来主导的；其二，这种复兴必然囊括中华民族所创造的文化的复兴，伟大复兴必然是全方位的。《宪法》序言第十自然段关于爱国统一战线的规定中，也将“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爱国者”纳入其中。这种爱国必然包括爱中国的文化，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爱国者必然发自内心地热爱着

① 张千帆：《宪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9页。

② 刘志刚、张晗：《香港政制改革的宪法学透视》，《政法论丛》2017年第5期，第43页。

③ 郑琪：《卡尔·施米特论人民与宪法的关系》，《政治思想史》2015年第3期，第141页。

④ [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9年，第23页。

中华文明。爱国统一战线的扩大,能够汇聚更多民族复兴的力量,^①增强文化软实力,巩固中华文化圈。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必然要行使、维护、彰显大国的文化主权。文化主权具有团结人心、凝聚力量的重要功能,是这一伟大历史进程中的精神内驱。香港居民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员,也应当为这一伟大复兴应尽之责任,此在文化上最鲜明的体现便是“爱国爱港”。可以说,《宪法》序言为“文化主权”构建了宪制的顶层,发出了政治的宣言。^②

2. 国家文化制度

《宪法》第1条规定:“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社会主义文化制度自然也不例外,其当为国家文化制度的根本所在,任何对社会主义文化制度的破坏都应当被禁止。国家文化制度的建立源于其背后的国家文化主权的行使,国家文化主权根源于人民主权。《宪法》第2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文化事业”。这体现了文化主权的根本权力来源是人民。“人民依照法律规定”表明这种权力的行使受法律约束和规范,其的行使应当是慎重的,只能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加以规范。

而“文化事业”又具体体现于《宪法》第4条、第19条、第20条、第22条、第23条、第24条等条文上:(1)《宪法》第4条规定:“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都有保持或改革自己的风俗习惯的自由。”语言文字是文化的载体,保护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就是保存其文化的火种;风俗习惯的背后是千百年的历史积淀、民族历史记忆的传承,尊重其保存或改革的自由是尊重其在文化领域上的自治。中华民族的文化是56个民族共同创造的。此条可视为对中华民族文化在《宪法》上的规定和保护。(2)《宪法》第19条主要规定:“国家发展社会主义的教育事业,提高全国人民的科学文化水平”以及“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国家教育主权是国家文化主权的组成部分,通过教育才能传承、培育文化,才能培养出高素质的国民去创新文化,实现文化的复兴。^③全国通用的普通话则是为了促进各地域单元文化之间的沟通、交流、传播,增强民族、国家的凝聚力、向心力。(3)《宪法》第20条主要规定了国家鼓励发展科学事业。科技的进步是先进文化的体现。文化主权理应包含文化的进步与发展。(4)《宪法》第22条主要规定了国家发展各类文化事业,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发展各类文化事业是保障文化主权实现的物质基础,只有这样才能让文化为人民服务,使人民群众能够真正享受到文化主权的裨益。历史是文化的承载者、见证者,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则是保留一个国家自身独特的民族、国家记忆与文化记忆。^④(5)《宪法》第23条主要规定了国家培养各类人才。人是文化的创造者,国家培育各类人才,是文化主权自身性质的必然要求,也是文化主权得到实现、维护、发展的必然要求。(6)《宪法》第24条主要规定了“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以及“国家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属于“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文化建设的重要一环,在国家文化制度的版图中具有不可或缺的地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入宪体现的是国家对于本国社会主流价值观念,意识形态的主导权、支配权。

而国家文化制度的落实需要在国家权力结构中对文化主权维护、保障、促进、实现加以规定,

^① 宁凯惠:《我国宪法序言的价值构造:特质与趋向》,《政治与法律》2019年第6期,第65页。

^② 吴家清、宁凯惠:《论宪法序言的价值构造及其功能》,《法学论坛》2019年第3期,第41、43页。

^③ 麻艳香:《文化:教育发展的内在机制——教育与文化的关系研究》,《甘肃社会科学》2010年第2期,第219页。

^④ 庞妃、史春林:《习近平关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重要论述研究》,《湖南社会科学》2022年第1期,第156页。

这一点体现在《宪法》第 89 条规定的国务院文化行政管理职权上。国务院即中央人民政府，其所行使的文化行政管理职权是实现国家文化主权的重要中央管治权。

3. 国家象征系统

《宪法》第四章“国旗、国歌、国徽、首都”是国家象征系统的依次展现。《宪法》第 141 条规定了国旗和国歌，《宪法》第 142 条规定了国徽，《宪法》第 143 条规定了首都。国旗、国歌、国徽的设计、最终定稿以及首都的最终选定，其背后都蕴含着深层次的文化考虑，其本身带有浓厚的文化基因，承载着文化记忆，是文化主权的一种象征。

4. 公民义务

宪法义务是公民“应当”的善。^①作为中国公民，一项最基本的宪法义务就是爱国。该宪法义务具体体现于《宪法》第 52 条——“维护国家统一和全国各民族团结”与第 54 条——“维护祖国安全、荣誉和利益”等条文中，可以将其视为《宪法》向每一位中国公民所提出的爱国义务。这种爱国义务应当被落实于政治、法律、文化等各方面。这种爱国义务是抽象的，但亦是确实存在的。爱国的情感与义务随国家的出现而产生，这种情感应当得到尊重，这种义务应当得到履行，正如“不得有危害祖国安全、荣誉和利益的行为”。《宪法》第 52 条、第 54 条是命令性的规则，但其应当是更深层次的一种文化认同、身份认同、国家认同。文化主权的实现离不开爱国情感的培育，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孟德斯鸠说：“共和国的美德很简单，那就是爱共和国。”^②爱国既是法律上的，也是道德上的。爱国义务是文化与政治的结合。当这种忠诚的情感被宪法化时，文化主权也将随之坚凝。

（三）《香港基本法》对文化主权的规定及对《宪法》的确认与重述

宪法是文化主权确认和体现的重要支点。《宪法》与《香港基本法》就文化主权的规定具有一体性、一致性、不可割裂性，但同时又强调其不同的特点与功能。《香港基本法》没有资格对文化主权进行创设性规定，仅能基于《香港基本法》的义务与职责进行自我约束性规定，是对《宪法》规定的重述与宣告，其效力源于《宪法》。此亦为《香港基本法》应当承担的宪制义务。

1. 《香港基本法》序言

“香港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体现了中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的正当性与合法性，表明了香港与祖国内地之间深厚的历史文化渊源，这种渊源也可以被视为文化上的羁绊，二者共同作为构建香港对中国文化认同和国家认同的心理基础。“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保持香港的繁荣和稳定”是《香港基本法》的两大立法宗旨，这两者的实现均离不开文化主权的实现。保护文化主权是实现《香港基本法》两大立法宗旨的必由之路，亦是保障“一国两制”不走形、不变样的关键所在。

2. 《香港基本法》第 1 条

可以将“香港特别行政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视为一条禁止性的命令规范，其斩钉截铁的背后是为了斩断长时期的英国殖民带来的殖民母国想象与政治认同危机。百年间的文明纠葛所形成的殖民化意识心态乃至“港独思想”并非一朝一夕可以革除，“香港民族党”的出现便是一个例证，虽然其已经被依法取缔，但是其背后深层次的文化原因仍值得深思。《香港基本法》第 1 条，可以被视为文化主权在香港特区宪制中的一条底线条款。“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

^① 张恒山：《论义务的价值》，《政治与法律》1991 年第 4 期，第 45 页。

^② [法]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许明龙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 年，第 48 页。

在中华民族的集体心理中始终具有至高无上的价值。^①

3. 《香港基本法》第23条

《香港基本法》第23条立法的核心原则是国家安全，文化主权的保障是国家安全的题中之义。《香港基本法》第23条所规定的香港特区应“自行立法”予以禁止的事项包括：（1）叛国；（2）分裂国家；（3）煽动叛乱；（4）颠覆中央人民政府；（5）窃取国家机密；（6）外国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在香港特区进行政治活动；（7）香港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与外国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建立联系。毫无疑问，这7项都是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对其进行相关立法加以禁止是为了更好地保障文化主权。尤其是第6项与第7项，这是中央鉴于香港的特殊历史以及现实情况而加入的。如果第23条立法不能落到实处，那么香港特区的文化安全的防御机制上无疑是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纰漏。《宪法》第52条和第54条也不能借《香港基本法》第23条之立法将爱国义务链接入特区法制的法律体系之中，这样不利于更进一步制度化、法律化爱国义务。并且依据《香港基本法》第23条的规定，香港必须制定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这是香港特别行政区应当承担的宪制责任，系对国家文化主权安全的维护与保障。《香港基本法》第23条立法是保卫文化主权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落实《香港基本法》第23条立法可以有效地增强香港社会的文化安全，从而维护国家的文化主权。

4. 《香港基本法》第24条、第43条、第104条

香港永久性居民以《香港基本法》第24条为标准，区分为具有中国籍和不具有中国籍两类，两者的差异主要体现在政治权利上，无中国籍者会在担任政府公职上受到一定的限制。《香港基本法》第43条规定，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应当向中央人民政府负责。《香港基本法》第104条则要求，特别行政区主要官员应在就职时宣誓拥护基本法，效忠特别行政区。

“爱国爱港”不单单是统战口号，更是《香港基本法》所隐含的法律义务。首先，对于香港特首而言，“爱国爱港”的义务要求是最严格而完备的，其既需要在就职时宣誓拥护《宪法》《香港基本法》，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同时又要直接向中央人民政府负责。其次，对于特区主要行政官员而言，这种就职时的宣誓效忠起到了塑造政治文化、促进社会凝聚的作用，既符合普通法传统的程序正义，又暗合东方文化的忠诚思想，构建了行政官员与《香港基本法》爱国主义之间的政治契约，蕴含深刻的文化内涵。最后，对于香港居民而言，一方面是香港特区永久性居民中具有中国国籍的中国公民，其身份要求其基于《宪法》而爱国；另一方面是永久性居民中的非中国公民和非永久性居民，作为居民基于《香港基本法》而爱港，其作为居民应当遵守《香港基本法》，并且尊重基本法背后的“一国两制”原则，特别是其中的“一国”，不能做出有损中国主权之行为。

香港回归的核心挑战是治理香港，赢得人心。爱国者治港可谓切中了香港管治的要害。爱国者的标准则是“尊重自己的民族，诚心诚意拥护祖国恢复行使对香港的主权，不损害香港的繁荣和稳定”。拥护《香港基本法》，进而形成以《香港基本法》为核心的基本法爱国主义。围绕《香港基本法》形成中国公民认同，进而实践爱国者治港的原则。港人亦应根据其自身的身份要件构成，承担强度与形式不一的“爱国爱港”义务。^②

5. 《香港基本法》第149条、第151条、第152条

文化主权在《香港基本法》第149条、第151条、第152条文本中的体现系以“中国香港”的名义出现。此三条主要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在同世界各国、各地区及有关的国际组织交往的过程中应当冠用“中国香港”的名义。主权具有唯一性，香港特别行政区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国

^① 陈端洪：《论港澳基本法的宪法性质》，《中外法学》2020年第1期，第55页。

^② 田飞龙：《认同的宪法难题：对“爱国爱港”的基本法解释》，《法学评论》2015年第3期，第105页。

香港”是“一国两制”中“一国”的必然要求和有力体现。这种称谓亦会潜移默化地体现在文化中，影响着人们的文化认同。文化的存在恰在这一词一句之中，主权之争也往往是一字一词之争，“中国香港”正是我国文化主权的体现。在对外交往中，涉及文化主权的事项，应当属于中央事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应当由此获得授权，或者经法定程序由中央予以决定。特区的高度自治权应当在中央的全面管制权框架内行使，“中国香港”系维护国家文化主权的应有之义。

6. 《香港基本法》附件三

《香港基本法》附件三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都、纪年、国歌、国旗的决议》《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日的决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法》等涉及《宪法》第四章所规定的国家象征系统的全国性法律。国家象征系统在港确立、受保护并最终得到认同，是实现文化主权的必由之路。国家象征系统在港的正确使用，可以维护国家尊严，树立爱国风尚，提升香港居民的国家观念与爱国意识。此为在港全面落实文化主权的内在要求与有效途径，亦是对《宪法》中关于国家象征系统的宣告与重述。

《香港基本法》与《宪法》关于文化主权的规定是统一的、一以贯之的，而非对立的、割裂的，应当以一体的、融合的目光加以审视。《宪法》中关于文化主权的规定是创设，《香港基本法》中关于文化主权的规定是以“一国”为原则对“一国”中的文化主权做了确认与重述，系对香港特区宪制中关于实现文化主权所应承担的义务与职责的进一步细化。

三、结语

“明治病之术者，杜未生之疾；达治乱之要者，遏将来之患。”^①文化主权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宪制中的规定得到科学合理的释义，是国家文化主权在“一国两制”的香港治理中得以实现和维护的基本前提。《宪法》对国家文化主权的地位、性质、内容、效力予以了明确规定。《香港基本法》对于国家文化主权在港如何落地及实施予以强调和重申。争取人心始终是中央处理香港问题的至高境界。真正的回归应当使得港人归属于国家所创设或赋权认可的香港宪制以及随之产生的法律秩序，并基于此种秩序产生民族认同、制度认同、文化认同。在《香港基本法》序言中，我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所选择的表述是“恢复”，这种恢复应当是圆满的，包括文化主权在内的。祖国是地理的，也是肉身的，是制度的，也是文化的。^②国家文化主权在香港的实现，是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经挑战与必然选择。

责任编辑：念兴昌

^①（晋）葛洪著，张松辉、张景译注：《抱朴子外篇》，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202页。

^②陈端洪：《理解香港政治》，《中外法学》2016年第5期，第1127页。

人民政协统战工作的优势与作用论析

李旭辉¹，江生亮²，周可嘉¹

(1. 秦皇岛市政协，河北 秦皇岛 066000；2.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北京 100081)

摘要：人民政协是成员最广泛的统一战线组织，深入研究其在推动和实现统一战线大团结、大联合方面所具有的独特优势和作用意义重大。人民政协与统一战线的关系有以下几点：统一战线属性是人民政协的基本属性，统战功能是人民政协的基本功能；人民政协是在统一战线的发展中酝酿、筹备、建立、发展、壮大的；人民政协是统一战线组织与人民民主形式的有机结合。统战是人民政协的首要功能。人民政协统战工作的优势主要体现在涵盖面广，外延链长；和而不同，求同存异；坚持民主，重在协商等方面。人民政协统战工作中具有努力画出最大最美同心圆、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团结凝聚各界共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等重要作用；人民政协在新时代大统战工作格局中应发挥更大的优势与作用，一要加强党的领导，增强政治引领；二要加强制度建设，更好地凝心聚力；三是推进协商民主，努力寻求最大公约数；四要坚持大团结、大联合，合力画好同心圆；五要秉持人民政协为人民理念，同心筑梦新时代。

关键词：人民政协；统战工作；优势与作用

中图分类号：D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2811(2022)02-0036-10

人民政协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统一战线理论、政党理论、民主政治理论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伟大成果，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人民团体和各族各界人士在政治制度上进行的伟大创造；作为统一战线的组织、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机构、人民民主的重要实现形式，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要渠道和专门协商机构，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安排。^①人民政协作为统一战线组织与专门协商机构的有机结合，高举团结、民主的旗帜，以协商民主实现最广泛的团结，以团结不断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在平等议事、体谅包容中发挥人民政协在大统战工作格局中的独特作用，增进团结、凝聚力量，寻求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

一、人民政协与统一战线的关系论析

一是人民政协在成立之初就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统一战线的属性是人民政协的基本属性，统

作者简介：李旭辉，秦皇岛市政协办公室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区域经济、社会管理、人民政协理论；江生亮，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编辑部，主要研究方向为国际政治、执政党建设；周可嘉，秦皇岛市政协研究室四级主任科员，主要研究方向为行政管理、人民政协理论。

^① 习近平：《在中央政协工作会议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19年9月20日，www.gov.cn/xinwen/2019/09/20/content_5431750.htm，2021年12月1日。

战功能是人民政协的基本功能。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是中国革命的三大法宝，统一战线作为党的总路线、总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党凝心聚力、攻坚克难、夺取胜利的重要法宝。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其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如陕甘宁边区按“三三制”建立了各级政权组织。同时，这也是在多元、平等、公开的协商民主方面进行的尝试，在一定程度奠定了制度和机制基础。1949年9月末，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胜利召开，标志着爱国统一战线在组织上完全形成。中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组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普选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之前，代行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而在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以后，仍将长期存在，成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团结的形式和协商的机关。^①1954年12月25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总纲明确指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作为团结全国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国外华侨和其他爱国民主人士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仍然需要存在”，其统一战线性质显著。

二是人民政协是在统一战线的发展中酝酿、筹备、建立、发展、壮大的。统一战线为人民政协奠定了思想基础、凝聚了多方力量，同时人民政协又为统一战线搭建平台、拓展空间。中国革命的胜利，是“依靠了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并且广泛地团结了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②。中国共产党与各革命党派、团体和人士，自由平等协商，分别于1949年6月与9月召开“新政协”筹备会和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人民政协的成立，标志着中国人民不仅在思想上、政治上形成了坚强的团结，也使得中国各民族、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各界人士的统一战线有了重要的载体。^③人民政协是我们党的统一战线理论政策和工作实践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制度性产物，在成立之初就具有统一战线性质，其统战属性是与生俱来的，历经革命、建设、改革开放各个历史阶段以及进入新时代，人民政协在不同历史阶段的使命和任务有所不同，但始终以统一战线的原则和方式方法履行着职责。^④

三是人民政协是统一战线组织与人民民主形式的有机结合。在1954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后，人民政协的协商议事、团结联谊功能与作用更加突出与明确，在统战工作格局中对党和政府的工作发挥着重要的协商、参谋和推动作用。人民政协的统战功能体现并融合于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各项事业中，体现并融合于社会主义民主进程中，体现并融合于人民政协的主要职能、组织构成、工作原则和活动中，是政协工作之魂。^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统一战线战略和政策的结晶，各民主党派作为人民政协的重要界别，在人民政协职能履行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人民政协委员中的各族各界的代表人士，反映利益诉求、发表意见建议、积极履职尽责，是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重要环节，在形成社会共识、增进社会团结、维护社会稳定中密切联系群众、团结更多群众，凝聚共识、汇聚力量。总的来说，人民政协作为统一战线组织的作用是系统、广泛而全面的：从理论上讲，主要体现在团结各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反映民意、

① 人民日报社：《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人民日报》1949年10月1日，第1版。

②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1956年9月15日），载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二十一册），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1986年，第446页。

③ 解永强：《统一战线与人民政协》，《陕西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2年第2期，第3—8页。

④ 常荣军：《深刻把握人民政协统一战线的组织属性》，《中国政协》2018年第18期，22—26页。

⑤ 吴秀生：《重视发挥人民政协的统战功能》，《中国政协》2016年第1期，第12—13页。

合作共事、协调关系、交友联谊、学习教育等八个方面^①；从实践上看，是深化多党合作、推进协商民主、密切团结联谊、积极协调关系、广泛凝聚共识等。

二、统战是人民政协首要功能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在中国的革命、建设、改革的进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在民主联合战线、工农民主统一战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时期，“最大限度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汇聚力量、克敌制胜。但是，在此期间并没有形成统一战线各成员共同的专门协商机构。在解放战争时期，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不断发展与壮大，特别是在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后，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与社会贤达、广大群众热烈响应，为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建立民主联合政府而空前团结、士气振奋，并积聚力量、献计献策。人民政协第一次全体会议的召开，标志着人民政协这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组织正式形成。周恩来总理指出，“这样一个统一战线应当继续下去，而且需要在组织上形成起来，以推动它的发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就是它的最好的组织形式”。^②人民政协，以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产生，统战属性是人民政协最基本的属性，人民政协的第一功能就是统战职能。

（一）加强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人民政协组织机制独具优势

人民政协是中国共产党统合社会的有效组织形式，是执政党维系利益多元化格局及政治稳定的重要平台，其中的人民政协界别是执政党发扬参与式民主理念的基本单位。^③界别是人民政协的基本单位，是其协商民主的动力源，其构成彰显统一战线组织结构的政治特征，并非突出社会的纵向结构特征，而是能够从中看到社会结构的“横切面”。人民政协以党派团体为基础组成，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作为界别参加人民政协组织，且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的负责人多在人民政协组织体系中任职担责。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也是爱国统一战线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人民政协这一制度安排最本质的特征；中国共产党对统一战线特别是民主党派的领导主要是政治领导，人民政协是党对统一战线领导的重要渠道。（张恺新，2019）坚持党的领导是人民政协工作的根本原则，人民政协组织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族各界人士协商议政、共商国是的过程，是使他们了解和接受党的主张的过程，是实现党对其领导（特别是政治领导）的过程。人民政协毫不动摇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紧紧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凝聚共识、汇集力量、建言献策，找到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使党的主张成为广泛共识。

（二）人民政协的基本性质契合统一战线的根本任务

人民政协委员植根人民、来自群众，人民政协具有组织上的广泛代表性和政治上的巨大包容性。统一战线的根本任务是争取人心、凝聚力量，为实现党和国家的宏伟目标而团结奋斗。人民政协坚持民主协商、平等议事，鼓励各种意见的充分表达和相互沟通，特别是将重大问题、商议事项在决策之前和决策执行过程中进行协商，充分体现包容的政治性、民主的人民性，实现“协商于民、协商为民”的初心。人民政协处于凝心聚力第一线、决策咨询第一线、协商民主第一线、国家治理第一线^④，听“民声”中述“民困”、集“民智”，最终使得各领域、各阶层都能够在国家政治架构中表达愿望和意志，努力调动积极因素、去化消极因素，实现共同政治基础上的“求

① 吴秀生：《重视发挥人民政协的统战功能》，第12—13页。

② 孙信：《新时代统一战线视域下的人民政协》，《人民政协报》2018年1月31日，第11版。

③ 李后强、郭丹、陈兰馨：《政协界别变迁：中国共产党政治吸纳能力的一个研究视角》，《邓小平研究》2018年第1期，第47—59页。

④ 葛慧君：《展示新时代人民政协一线新气象》，《人民政协报》2018年10月25日，第3版。

同存异”。人民政协的凝聚共识、协调关系、解疑释惑、理顺情绪、化解矛盾、扶贫济困等工作与统一战线的根本任务高度一致。而且，协调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等是人民政协的一项基本任务。坚持“人民政协为人民”，借以联系广泛、智力密集、上通下达、位置超脱的优势，在坚持原则、正视差异、尊重多元中建言资政、凝聚共识、汇集力量，发挥其不可替代的功能。

（三）人民政协的两大主题契合统一战线的本质要求

大团结大联合是统一战线的本质要求，也是人民政协组织的重要特征。团结和民主是人民政协的两大主题，相辅相成。一方面，只有追求民主才能彰显人民政协的价值；另一方面，人民政协的所有活动只有最广泛推动和实现最大范围团结，才能使民主有根基。^①人民政协在成立之初，就喊出“团结、建设、进步”的响亮口号。^②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社会各界人士在团结中追求民主的历程，始终贯穿于人民政协的发展中。民主始终是主题，也是方向；团结始终是主题，也是使命。中国共产党同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丰富实践，是对团结和民主具有独创性的生动诠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做好人民政协工作，必须坚持大团结大联合。”人民政协在发展中不断地扩大团结面、增强包容性，同时拓展有序政治参与空间，就是为了适应不同时期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的需要、社会状况的变化和统一战线的发展。人民政协以制度、文化、人才等各方面的优势，提升广泛性、包容性和凝聚力，彰显多样性与社会性，在凝聚思想共识、发展民主政治、扩大团结联谊、搭建合作平台等工作中发挥统战作用。

（四）人民政协的三大职能契合于统战工作的内容

人民政协是各党派团体和各族各界人士发扬民主、参与国是、团结合作的重要平台，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是其三大职能。政治协商是实现协商民主的重要形式，旨在沟通理解、增进共识，通过“商量”“找到最大公约数”，及时、有效地化解人民内部的各种矛盾，推进社会政治的和谐稳定。民主监督是在包容、尊重、平等的基础上提出批评和建议，促使问题解决和工作改进，旨在增进团结、凝心聚力。参政议政是在调研视察等基础上研究问题、协商议事，汇聚各方智慧、汇集民众心声，提升人民政协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实效。统战工作涉及领域广，在了解情况、掌握政策、协调关系、安排人事、增进共识、加强团结中大团结大联合，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在大统战工作格局中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人民政协的工作与统战工作相匹配，都是团结广泛力量、协调各方利益、凝聚改革共识、构建发展共同体。

三、人民政协统战工作的优势与作用

（一）人民政协统战工作的优势

1. 涵盖面广，外延链长

在大统战格局中，人民政协代表性之强、团结面之宽、覆盖面之广，是其他政治组织和社会组织无法比拟的。（潘岳，2018）人民政协吸纳了各党派、各阶层、各民族、各宗教界、各领域的代表人士，各种利益诉求、意见建议能够得以充分表达。统一战线将各种社会政治力量有机联合，同时具有政治性和社会性，关注社会结构变化和阶层结构变迁，尤其是新兴社会群体。人民政协的巨大包容性、广泛代表性能够“囊括一切代表人物”，突出多样性和社会性。人民政协以界别为

^① 梁晓宇：《理解人民政协是爱国统一战线组织的几个维度》，《山西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9年第1期，第37—42页。

^② 冯春梅：《同心共筑中国梦 共创美好新时代》，《人民日报》2019年9月20日，第6版。

基础,代表、联系着不同的领域、阶层、行业、团体,而且根据社会政治参与的需要,主动设置相关界别,吸纳相应的社会人士,在各层次各领域不断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人民政协委员覆盖面大、代表性强、联系面广,人民政协团结面扩大、包容性增强,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统一战线内部结构变化,在增进共识、促进团结等方面更加有力度、有成效。

人民政协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实践探索,构建程序合理、环节完整的协商民主体系,把人民政协的制度优势转化为社会治理的强大效能。^①人民政协委员是联系群众的桥梁纽带,具有反映民意、沟通上下的作用。特别是各级政协的委员活动小组,以界别为基础,走入基层大众、深入界别群众,推动基层群众“有事多商量、遇事多商量、做事多商量”。创新性打造“政协委员工作室”,打通联络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拓宽政协委员联络基层、联系群众的新渠道,将政协的工作链条延长,更好地发挥党政与群众之间的“连心桥”作用,推动各界群众的一些具体问题通过协商有效解决,将统战工作的为民服务、化解矛盾等做好、做实。

2. 和而不同,求同存异

统一战线是“和而不同”与“求同存异”的矛盾统一体,“和而不同”精神与“求同存异”原则同生共进。^②“和而不同”贯穿于统一战线发展的全过程,是统一战线形成和发展的基础性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作用于统一战线的质征,也是指导统战工作的方法。人民政协是发挥中华民族“和合”文化的重要舞台,人民政协文化承接了“和合文化”的精髓,“和而不同”思想体现了人民政协工作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的辩证统一。^③“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人民政协的协商民主既有历史传统,又有时代特征,蕴含着兼容并蓄的优秀政治文化。

求同存异是人民政协理论中的又一个基点,就是要正确处理一致性和多样性的关系,最终凝聚共识。一致性是共同思想政治基础的一致,多样性是利益多元、思想多样的反映,必须在尊重多样性中寻求一致性。具体意见可以多样,但在原则上要有共识,思想观念可以多样,但要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上凝聚共识。在差异性中寻求共同性,在多样性中找到一致性,一是要包容各党派、各团体、各阶层人士在信仰、利益和观念等方面的不同见解;二是要在推进协商民主中鼓励民主人士发表真知灼见和不同意见,让其系统、理性、有序地表达和反映诉求,找到最大公约数。求同存异原则使人民政协协商民主的渠道充分拓展、内涵更为深刻和丰富,在“增进一致而不强求一律、尊重差异而不扩大分歧、包容多样而不弱化主导”^④中巩固已有共识,凝聚新的共识。

3. 坚持民主,重在协商

人民政协协商民主是全过程人民民主这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形式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贯穿于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全过程。发扬广泛民主,加强团结才更有力量。(江泽民,1999)团结和民主是人民政协的两大主题,团结是民主的前提,而具有共同的政治基础和相当程度的共识才会有民主的发展。团结和民主下的协商就是充分听取意见和建议的过程,并广泛达成决策和工作的最大共识。人民政协的民主协商旨在交流思想、凝聚共识,在民主决策中广泛商量、集思广益是人民内部各方面沟通、协调的体现。

① 吕忠梅:《把人民政协制度优势转化为社会治理效能》,《人民日报》2020年5月19日,第9版。

② 刘亮红:《论统一战线中的“和而不同”与“求同存异”》,《湖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第21—23页。

③ 梁晓宇:《人民政协与“和合”文化》,《贵州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0年第4期,第23—25页。

④ 《全国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开幕会 俞正声作报告》,2016年3月3日, https://www.chinanews.com.cn/gn/2016/03-03/7782591_3.shtml, 2022年1月5日。

统一战线重在团结, 协商民主重在民主; 民主是促进统一的条件和要求, 民主的对话、民主的决策是加强团结的最佳良方。^①人民政协协商民主扩大了人民群众有序的政治参与, “丰富了民主的形式、拓展了民主的渠道、加深了民主的内涵”, 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完善和发展。在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中, 统一战线各界人士的政治参与在逐渐扩大, 政治共识不断获得促进, 统一战线民主协商的功能和作用得到强化。人民政协的商民主在实践中发展, 将背景多元化、诉求多样化的主体“集合”而“协商”, 扩大了政治参与的主体, 弱化了其间的利益冲突、期望差异产生的消极作用和不利影响, 增进理解和团结, 进一步加大统一战线工作的深度和广度。

(二) 人民政协统战工作的作用

1. 努力画出最大最美同心圆

人民政协是统一战线的组织, 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重要机构, 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形式。人民政协通过民主协商的方式充分发挥民主党派及无党派人士的作用, 进一步彰显新型政党制度的优势, 最大限度地集聚人才、汇聚力量、凝聚共识, 倾力尽力服务大局, 画出最大最美同心圆, 共同致力于社会主义事业发展、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是固守“圆心”, 强调党对人民政协工作的领导。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包括各民主党派、各团体、各民族、各阶层、各界人士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选择, 是成立政协时的初心所在, 是人民政协事业发展进步的根本保证。要固守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一“圆心”, 坚持发扬民主和增进团结有效贯通, 建言资政与凝聚共识双向发力, 积极营造民主和谐的议政环境, 努力协调各方关系, 最大限度凝聚发展合力, 不断巩固和发展大团结大联合的局面, 彰显新时代人民政协的新担当新作为。二是追求“最大”, 扩大人民政协的包容性、团结面。“包容的多样性半径越长, 画出的同心圆就越大”。人民政协的包容性在政治中既要讲原则又要讲团结, 在中国共产党一元化领导的基础上, 以充分、有效的表达渠道促进各主体利益的实现、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人民政协以政治协商为基本原则、以民主和团结为基本价值、以亲和与协调为基本工作方式, 协调利益、平衡冲突, 建构良性政治秩序, 这是新时期对人民政协包容性政治提出的要求。^②三是呈现“和美”的民主形式, 寻求最大公约数。人民政协的履职遵循的是围绕中心、服务大局, 继续发挥大团结大联合优势, 让广泛协商落到实处, 并以解决实际问题为导向, 使党委和政府的决策和工作顺乎民意、合乎实际。“人心是最大的政治, 共识是奋进的动力”, 人民政协以团结聚人心, 以协商促共识, 团结每一分力量, 调动一切积极因素, 在推进协商民主中“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 找到全社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

2. 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

在人民政协功能的历史演进中, 第一阶段(1949—1953年), 人民政协的政治功能主要是制宪、吸纳和动员; 第二阶段(1954—1977年), 人民政协作为统一战线组织存在于国家政治生活中, 但其功能和作用尚未得到充分发挥; 第三阶段(1978年后), 民主功能得到激发和释放, 极大地拓展民主的广度和深度。^③人民政协功能的延伸和发挥、协商民主的广度和深度的拓展都缘于人民政协不断扩大的团结面和包容性, 与中国共产党为领导核心的多元一体社会结构相适配, 正向作用于人民事业的发展, 归根结底是“人民政协为人民”。人民政协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

^① 赵晓娥、白山稳:《浅谈统一战线视角下的协商民主》,《城市建设理论研究》2013年第14期,1—9页。

^② 余源培:《人民政协体现中国特色包容性政治》,《中国政协理论研究》2012年第2期,6—10页。

^③ 俞希舟:《界别民主与扩大社会各界有序政治参与》,《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2017年第5期,第98—105页。

能力现代化中作用重大,在功能上侧重于对国家大政方针和地方重要举措以及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问题,在决策之前和决策实施之中进行协商;在制度上以界别形式使协商参与主体囊括了人民群众和社会力量的各个方面,而且界别协商的优势较为突出。实践中,人民政协能够以界别组织资源为基础,把经济、文化(技术)等条块分割交织的资源整合协同起来,发挥出加倍的效能。

人民政协是沟通国家权力系统与社会系统的桥梁和纽带,人民政协协商民主的实质也就是国家权力系统与社会系统围绕着公共政策、公共利益在不同领域、不同层次开展的协商活动。^①人民政协广泛联系着各界群众,在不同群体的意见表达和认知交换中,利益诉求越充分、越完整,人民政协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作用、意义就越重大,同时使国家治理能力得到进一步整合和汇聚。人民政协委员作为各界别代表人士,在政治参与、权益诉求、建言献策中集中将社会力量与公共权力有机统一,使得人民政协对社会管理的整体广泛联合能力不断提升。促进发展是人民政协履行职能的第一要务。人民政协是凝心聚力、决策咨询、协商民主、国家治理的“一线”,人民政协工作要服从发展、服务发展、促进发展,人民政协委员在民主协商、参政议事中要建真言献良策,以真知灼见为担当,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展现人民政协新时代的大作为。

3. 共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人民政协作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安排,凸显了大团结大联合的统一战线本质,是马克思主义共同体理论的生动实践。^②《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重点明确了“中国人民在长期的革命、建设、改革进程中,结成了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有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人民团体、少数民族人士和各界爱国人士参加的,由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拥护祖国统一和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爱国者组成的,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在内的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人民政协作为中国人民爱国统一战线的组织,其广泛性、团结面在扩大,围绕中华民族的崛起发展,致力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坚持团结、民主的主题,担负凝心聚力的使命。

人民政协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中心任务,但其在每个历史时期都肩负着一项共同的政治任务,即凝聚人心,构建和巩固各社会阶层的政治共识。^③在新时代,人民政协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最大限度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充分发挥全体中华儿女的聪明才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民族伟大复兴之梦,需要各族儿女共同参与国家治理、社会发展,并形成更紧密、更团结、更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实现中国梦为人民政协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更加广阔的舞台,助力中国梦的实现、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时代赋予人民政协的光荣使命。^④为党凝心聚力是人民政协的重大政治责任,人民政协要充分发挥其协商民主空前的广泛性和包容性优势,以民族复兴和“中国梦”为价值公约数,担当大局重任、时代使命,与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奋斗,书写中华儿女同心共筑中国梦的伟大篇章。

四、充分发挥人民政协在新时代统战工作中的优势与作用

新时代统一战线的社会基础更加广泛、工作领域更加宽广、工作内容更加丰富,已经发展成

① 刘菊香:《从协商民主理论看人民政协界别设置的优化》,《理论导刊》2014年第9期,第10—13页。

② 潘岳:《人民政协在统一战线中的地位和作用》,《中国政协》2018年第19期,第26—27页。

③ 潘维:《人民政协的优势在于凝聚人心》,《人民日报》2018年12月5日,第20版。

④ 王克群、张磊:《助力中国梦是人民政协的光荣使命》,《山西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3年第2期,第42—45页。

为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爱国者、拥护祖国统一和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爱国者的联盟，工作对象拓展到民主党派成员，无党派人士，党外知识分子，少数民族人士，宗教界人士，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出国和归国留学人员，香港同胞、澳门同胞，台湾同胞及其在大陆的亲属，华侨、归侨及侨眷，其他需要联系和团结的人员等12个方面，呈现出空前的广泛性、巨大的包容性、鲜明的多样性和显著的社会性。^①在新时期大统战工作格局中，人民政协要进一步彰显优势、发挥作用，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一）加强党对政协工作的领导，增强政治引领

人民政协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安排，人民政协的政治属性决定了党的领导是人民政协最本质的特征，坚持党的领导是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政治保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要切实发挥党组织在政协工作中的领导核心作用，强化党组织在政协工作中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一是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二是必须树立“四个意识”，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三是要正确处理一致性和多样性的关系，不断巩固共同思想政治基础，同时要充分发扬民主、尊重包容差异，尽可能通过耐心细致的工作寻求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②

政协党组是党在政协组织中设立的领导机构，要发挥好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的领导作用。同时，要将党建工作与履职工作深度融合，实现“党的组织对党员委员的全覆盖、党的工作对政协委员的全覆盖”，并将党的工作延伸到基层群众中。在党建工作与履职工作中，要充分发挥政协联系各方、协调关系、汇聚力量、服务大局的优势，在弘扬传统中传承政治共识，在思想交流中深化政治共识，在团结合作中巩固政治共识，促进大团结大联合的统一战线各成员始终与党委政府同心同德、同心同向、同心同行。

（二）加强人民政协的制度建设，更好发挥凝心聚力作用

人民政协是我国统一战线最广泛的也是最重要的组织形式，其实现了统战工作的组织化、制度化。作为统一战线的组织平台，人民政协的制度建设要不断适应统战工作的发展，“最大限度为党和国家事业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要在拓宽参与平台、畅通联系渠道、完善工作机制中不断努力，通过工作创新突出包容各界、联系广泛的独特优势，广泛凝聚社会力量。

人民政协工作的作用在委员、活力在委员，在政协委员相关工作中，要规范组织推荐与群众参与的委员遴选机制，要尝试建立针对委员的监督约束与竞争引入机制，要完善委员考察调整与后备培养机制，等等。政协委员的产生要顾及甚至倾向于基层与一线，同时要注重吸纳新兴阶层和社会力量的代表人士。同时，应在调整中不断优化界别设置，更好地发挥界别的民主价值功能，充分保证人民政协的代表性和包容性适应新时代统战工作的需求。人民政协的组织机构优势与界别构成优势，是健全沟通联系机制的基础与保障。例如，通过工作联系、走访交流、专题活动等形式开展联谊交友、教育引导和利益照顾。进一步完善主席会议成员联系常委、常委联系委员、委员联系群众制度；切实发挥专委会联系委员和各界人士的桥梁和纽带作用，保持同政协委员的经常联系，把委员个体优势转化为政协工作整体优势；发挥委员小组联络作用，开展丰富多彩的

^① 尤权：《坚持大统战工作格局》，《人民日报》2019年11月26日，第6版。

^② 孙信：《新时代统一战线视域下的人民政协》，《人民政协报》2018年1月31日，第11版。

委员小组活动。^①

（三）着力推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发展，努力寻求最大公约数

推进人民政协协商民主建设，是加强党的领导、提升党的执政能力的重要方式，是充分彰显政协人民民主多元主体性、广泛代表性和巨大包容性的重要途径。通过人民政协的民主协商，更好地发挥凝心聚力作用，形成和凝聚共识，是当前政协工作的重要任务，要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在新的时期，经济社会深刻变革，体制束缚减弱，利益主体多元、利益诉求多元，利益实现途径多样、利益格局深刻调整，人的思想多样性和差异性同时增强，多元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最为重要的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经济所有制多样、社会阶层分化、思想价值取向多元、社会主要矛盾变化，都对人民政协协调关系、化解矛盾提出了新的目标和要求。着力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扩大不同社会阶层代表的政治参与空间，最终目的是充分协调各方利益，从而实现共同利益的最大化。

协商民主的实质在于寻求各方最大公约数，这是协调关系、化解矛盾，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形式和途径。^②在专题协商、对口协商、界别协商、提案办理协商、基层民主协商中，就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和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广纳群言、广集民智。在“商量”中坚持“热烈而不对立、真诚而不敷衍、尖锐而不极端”，在相互尊重中表达观点、交流思想、增进共识。协商议事，充分发扬民主、尊重包容差异，在“求同”与“存异”中找到最大公约数。坚持一致性与多样性的统一，“增进一致而不强求一律、尊重差异而不扩大分歧、包容多样而不弱化主导”，巩固已有共识，凝聚新的共识。不断加强协商主体之间的联系、沟通与协同，在增强包容性中提升引领力，推动形成和而不同、活而有序的生动局面。

（四）坚持大团结、大联合，合力画好同心圆

人民政协本身是统一战线组织，也就是党派性的联合组织。（周恩来，1954）大团结、大联合是人民政协的重要特征。人民政协在国家治理中实施合作式治理，集协商、监督、参与、合作为一体，就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动员更多可以动员的因素。把社会各党各派各族各界人士团结凝聚起来，在坚持一致性基础上尊重和包容多样性，尽可能体现民主性，保持和维护宽松和谐的民主政治环境和氛围，最大限度地凝聚和形成政治共识，寻求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实现人民政协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③

人民政协因团结而生，依团结而存，靠团结而发展。要充分发挥人民政协人才荟萃、智力密集的优势，联系广泛、善于协调的传统，用团结促进发展。以团结汇集力量，以联合扩大战线，围绕中心、服务大局。要提高合作共事能力，发扬求同存异、体谅包容的优良传统，贯彻民主协商、平等议事的工作原则，尊重和包容不同意见的存在和表达，以民主的作风团结人，不断增进思想共识、加强合作共事。^④“团结就是力量，民主可收众益。”（江泽民，2001）要通过民主实现

^① 梁晓宇：《理解人民政协是爱国统一战线组织的几个维度》，《山西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9年第1期，第37—42页。

^② 杨卫敏：《人民政协统战团结功能新论——简析习近平对新时代人民政协理论的贡献》，《上海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7年第6期，第8—16页。

^③ 重庆社会主义学院课题组：《人民政协作为统一战线组织的理论渊源》，《湖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9年第6期，第56—63页。

^④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6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14年9月21日，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4-09/21/c_1112564804.htm，2021年12月15日。

最广泛的团结，通过团结不断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人民政协协商民主的“中心环节”是“广泛凝聚共识”，最终实现最广泛的团结。在团结与联合中，要注重听取多方面的意见与建议，包括批评。人民政协的团结面不断扩大，包容性不断增强，必将更广泛凝聚共识，广聚天下英才，画出最大同心圆。

（五）秉持人民政协为人民理念，同心筑梦新时代

人民政协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人民民主的重要实现形式。作为国家治理体系重要组成部分，人民政协在巩固共同政治基础、扩大政治共识、激发民主政治活力方面具有诸多优势，要坚定在国家治理中的方向性，并增强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协同性。要积极推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发展和国家治理现代化，围绕国内社会主要矛盾转化和全面深化改革，谋良策、献诤言、出实招，围绕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公共决策及其执行情况开展协商式监督，突出人民本位。以全球视野和战略思维，提升统一战线的包容性和开放性，主动做好涉外的统战工作，加强海内外中华儿女大团结，将最大公约数的半径充分延伸到“拥护祖国统一和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爱国者”范围。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需要中华儿女团结一致、共同努力、不懈奋斗。人民政协工作者要全面认清国内外发展大势，科学把握我国发展重要战略机遇期的新变化、新特征，辩证地看待新发展阶段的新机遇新挑战（欧阳坚，2021）。新时代要求人民政协工作者牢记使命、负重前行，在党坚强领导下，在思想引领、群众组织、社会号召中凝聚最大正能量，搭建起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各界群众共同为民族复兴凝心聚力的大舞台，把亿万人民的梦想汇集一处，把各个方面的强大力量束成一股，团结一致，共襄伟业，为筑梦新时代贡献人民政协力量。

责任编辑：罗 雷

Ⅱ型大城市网络人士统战工作研究

——基于湖南常德的调查分析

罗米娜

(常德市社会主义学院, 湖南 常德 415000)

摘要: 网络人士统战工作是新时代统一战线的一项重要任务。在具体实践过程中, Ⅱ型大城市有着相对宽松的互联网生态经营环境, 其网络人士正呈现出与超大、特大城市截然不同的特点。文章选取湖南常德为样本, 在梳理本地区网络发展情况的基础上, 从年龄、学历、影响力、政治参与意识和社会责任感等五个维度分别调查Ⅱ型大城市网络人士的现状, 总结当前网络人士统战工作的成效及问题, 通过加强思想政治引导、创新工作方式方法、深化培养领军人物、完善“1+n”部门联动, 引导广大网络人士做网络正能量的积极传播者、网络文明的生动践行者和网络秩序的有力维护者。

关键词: Ⅱ型大城市; 网络人士; 统战工作; 调查分析

中图分类号: D6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2811(2022)02-0046-06

2019年, 中央统战部、中央网信办首次共同召开网络人士统战工作会议, 这次高规格的会议, 标志着网络人士统战工作正式成为新时代统一战线的一项重要任务。^①在具体实践过程中, 相对京沪穗深等超大城市, Ⅱ型大城市在全国范围内的占比更高, 如在住建部2020年底最新公布的《2019年城市建设统计年鉴》中, Ⅱ型大城市达到了60多个, 且一直在新增中, 其网络人士的统战工作不可谓不重要。相较于阿里、腾讯、字节跳动等巨头在超大、特大城市中的庞大布局, Ⅱ型大城市普遍具备了移动互联网的基础条件, 却没有互联网大佬的恶性竞争, 互联网生态经营环境相对友好宽松, 不需要通过补贴大战占领市场, 而是通过高效的互联网服务、独特的话语观点获得人心, 这使得Ⅱ型大城市的网络人士呈现出与超大、特大城市截然不同的特点。

依据国务院2014年印发的《关于调整城市规模划分标准的通知》, 城区常住人口100万以上300万以下的城市为Ⅱ型大城市。2021年, 湖南省常德市统计局公开的全市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显示, 该市常住人口中, 居住在城镇的人口为296.8万, 是典型的Ⅱ型大城市。本文以湖南省常德市委统战部的调研成果为样本, 结合中央关于网络人士统战工作的新精神和本地区的网络发展实际, 了解Ⅱ型大城市网络人士的现状, 分析其构成与特点, 客观真实地反映工作中存在的

作者简介: 罗米娜, 中共常德市委党校(市行政学院、市社会主义学院)讲师, 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中国化与统一战线理论。

^① 陈斯诗:《新媒体从业人员职业价值观的统战工作策略研究》,《四川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0年第3期,第29—35页。

问题,进而加以改进,引导广大网络人士参与进来,做网络正能量的积极传播者、网络文明的生动践行者和网络秩序的有力维护者。

一、中国互联网络的发展状况和常德网络人士的发展现状

第49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1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10.32亿,手机网民规模达10.29亿,网络直播用户规模达7.03亿,^①网络已经深刻影响到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工信部统计数据显示,2020年,手机上网流量达1568亿GB,比上年增长29.6%。^②抖音2020年度报告显示,其日活用户突破6亿,有超过2200万人在抖音合计收入超过417亿元,并预计这一数据在2021年突破800亿。^③中国作家协会2021年发布的《中国网络文学国际传播报告》显示,中国网络文学创作者有上千万人,每天的创作量超过1.5亿字,网络文学数字阅读产值300多亿元。^④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发布的《2020年度中国网络文学发展报告》显示,我国网络文学用户数量已达4.67亿,网文读者占全部网民数量的47.2%,且下沉用户日益增加。^⑤

以上种种数据,共同指向一个结论,那就是:中国的网络用户、网络社交、网络文化、网络经济等网络生态日趋繁荣,这种繁荣符合互联网发展的客观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网络生态的繁荣,使得越来越多人“以网为根、以网发力、以网应变、以网谋生”,从而引发各种价值观的碰撞与交锋,涌现各种亟须被重视的社会现象,在这个过程中,互联网生态里最活跃的一环——网络人士便应运而生。根据“统战新语”的总结,网络人士泛指那些以网络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为基础,在互联网平台上从事经营管理、生产传播、技术研发、投融资等活动,熟悉网络传播规律和网民内在需求,有强大的舆论传播能力、内容生产能力、社会动员能力的人,他们大部分是党外人士,主要分布在体制外,以其“意见领袖”般的动员力和号召力,影响着亿万网民对党和国家、对社会和工作、对世界和人生的看法,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

常德是湖南北部地区的一个II型大城市,主要产业是农业和制造业。2021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显示,该市常住人口为527.91万。近年来,该市互联网产业发展较快,根据市工信部门和网信部门提供的数据,现有2.4万家“上云”的中小企业,62家两化融合贯标认证企业,106家移动互联网企业,相关从业人员8642人,拥有1个工业互联网创新中心,1个浪潮常德云计算中心,4个移动互联网专业园区,11个智慧园区。为全面了解掌握常德网络人士的主要特点,本市统战部门随机选取近200位本地网络名人、新媒体代表和知名博主,通过问卷调查、走访座谈、查阅调取相关资料等方式,开展了广泛深入的调研。根据调研总结的相关资料,常德网络人士主要呈现以下特点:

①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49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统计报告》,2022年2月25日, <http://www.cnnic.net.cn/hlwfzj/hlwzxbg/hlwtjbg/202202/P020220407403488048001.pdf>, 2022年6月10日。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2020年通信业统计公报》,2021年1月22日 https://www.miit.gov.cn/jgsj/yxj/xxfb/art/2021/art_f2e9a4844b964586bfea3977c2e1baf2.html, 2022年4月30日。

③ 《2020抖音数据报告》,2021年1月5日, http://www.xinhuanet.com/tech/2021-01/05/c_1126948875.htm, 2022年1月5日。

④ 中国作家协会:《2021年中国网络文学国际传播报告》,2021年9月26日, <http://www.chinawriter.com.cn/n1/2021/0926/c403994-32237388.html>, 2022年5月15日。

⑤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2020年度中国网络文学发展报告》,2021年3月18日, http://literature.ccssn.cn/wlwhywx_2173/202103/t20210317_5319242.shtml, 2022年5月8日。

（一）年龄结构年轻化

近年来，城市之间的竞争逐渐以人才竞争为重点，作为中部省份的非省会城市，常德的地理位置并不突出，经济实力虽为全省第三，但放在全国来看，无论综合实力还是产业结构都不具备明显的优势，因此，其对人才的吸引主要是靠宜居的环境和宜业的政策。通过拎包入住人才公寓、发放高额补贴等多项覆盖企事业单位的人才政策，在全市形成引进人才、尊重人才、保护人才、善用人才的机制，再加上互联网行业本身知识更新快、工作强度大、竞争激烈、追求创新、追逐潮流的特点，常德的互联网从业人员在年龄结构上呈现年轻化态势：年龄在40岁以下的青年占比超过总数的53%，其中31~40岁的人群占40.35%，网络人士中有一半的从业时间不满3年。

（二）学历结构高等化

职业社交网站LinkedIn（领英）提供的数据显示，随着消费互联网向工业互联网转型的“下半场”到来，人工智能等相关技能成为互联网产业需求量最大的技能类型之一，2015年至2017年的增幅达190%，高技能、强专业，使得互联网从业人士学历越来越高。常德网络人士的学历结构整体合理，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占85.96%，具有本科以上学历的占总数的47.36%，与全国互联网行业从业人士的学历结构一致。

（三）影响力相对均衡

参与本次调研的受访者中，粉丝数超过1万的占61.4%，其中粉丝数超过10万的仅占15.79%，20万以上的占8.77%，30万以上的占5.26%，具有较强影响力的“大V”偏少。

（四）政治参与意识和社会责任感较强

100%的受访者都认为，在重大事件和时间节点上，新媒体等网络人士应该发挥正面引导、快速如实报道等积极作用；87.72%的受访者表示经常通过社交网络、门户新闻网站等方式关注政策法规、乡风民俗、文化知识、社会民生等问题，其中最受关注的是社会性议题；针对网上传播的有关负面消息，78.95%的受访者表示会进行多方核实、理性评价；61.4%的受访者经常关注政治、政府问题和国家利益问题；68.42%的受访者会经常通过网络、手机新媒体等渠道发表对时政、民生新闻的相关看法、意见。

（五）其他情况

调查中，82.5%的网络人士认为移动互联网的便捷赋予了人们更多的公共空间的话语权，进而涌现了大量网络人士；59.65%认为新媒体相较于传统媒体，更能让网民展现话语权。与此同时，59.65%的受访者没有担任政治职务或社会职务，近一半受访者对本行业失范心存担忧，40.35%认为行业缺乏有效监督，47.37%担心网络鱼龙混杂，网民话语权被滥用。

二、II型大城市网络人士统战工作的成效及问题

从社会学、传播学的角度来看，网络人士的统战工作，实质是争夺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工作。意大利共产党的创始人葛兰西较早从意识形态斗争的角度涉及话语及话语权的问题，他认为，“社会集团的领导作用表现在两种形式中——在统治的形式中和‘精神和道德领导’的形式中。”^①前一形式表现为上层建筑的国家机器，后一种形式则体现为话语权。^②法国哲学家福柯在《话语的秩序》中强调“话语意味着一个社会团体依据某些成规将其意义传播于社会之中，以此确立其社会

① 葛兰西：《狱中札记》，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316页。

② 胡正荣：《媒介公共服务：理论与实践》，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32页。

地位，并为其他团体所认识的过程”^①，认为话语与权利密不可分，话语不仅是施展权利的工具，还是掌握权利的关键。^②在网络世界里，每个人是相对自由的，人人享有发声的权利，但一个普通人发声，不一定有人回应，网络人士的突出优势就在于能够以互联网为媒介，代表其特定的社会阶层，通过表达和输出观点来发挥一呼百应的影响力。因此，对网络话语权的引领掌握是新时代网络人士统战工作的重中之重。

就调研结果来看，常德网络人士统战工作以新媒体从业人员和网络意见人士为主要对象，重点是做好从事内容生产和传播的党外人士的工作，工作成效是显著的：

（一）守住了网络阵地

常德网络人士普遍有着较强的公民意识和政治参与意识，能对市委市政府的重大决策作出科学理性的解读，对关键信息作出有前瞻性的判断，对引导民智作出正能量的阐释，适应且充分发挥了新媒体从业者“启发者”“诠释者”“引领者”“协谈者”的作用。

（二）扩大了网络互动

通过听取网络人士意见，与网信办联动，建立“主动认领、实时交办、限时办结、定期通报”的网民留言办理机制，仅2020年，就在红网《百姓呼声》《问政湖南》等栏目共回复网民留言6667条，回复率超98%，常德网信办因此荣获2020年度湖南省网民留言办理工作先进单位。

（三）弘扬了本地特色

通过组建常德网商协会、网络人士采写团、网络主播协会等组织，开展“同心美丽乡村行”活动，讲好“三高四新在常德”、乡村振兴、同心抗疫、百姓生活、统战典型等多方面的常德故事，宣传推介同心美丽乡村建设成果，帮助解决实际问题，推动“德品出湘”“德品出境”，特别是疫情防控期间，常德网络人士在市委统战部、市网信办等部门的引导下，创作了一批接地气、有特色、受欢迎的新媒体原创作品，科普疫情防控知识，及时澄清谣言和不实信息，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贡献了力量。

在不断取得工作成效的同时，当前的网络人士统战工作也存在一些问题：

（四）思想领会不到位，方向引领有“偏差”

对于加强网络人士统战工作，中央提了要求，作了部署，湖南省委统战部部长黄兰香也强调，对网络人士要以思想引导为主线，不断增进政治共识。可见，对网络人士话语权的的方向引领极其重要。但在落实的过程中，存在“上冷下热”，个别工作人员反应速度偏慢，未能及时领悟中央精神的现象：一是不能深入理解中央的决策部署进而快速跟进，缺乏调研和学习，既不了解互联网生态，又不熟悉工作对象，有的统战工作者甚至把网络大V完全等同于新阶层人士，没有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二是不能科学认识网络人士的身份价值和社会价值，不能有效区分网络人士和一般网民，把网络人士简单等同于“喷子”“键盘侠”，认为网络创作者名不副实，“登堂入室，不成体统”；三是不能正确对待其中的意见人士，认为他们就是“刺儿头”“挑事儿”，惹不起躲得起，生怕被这样的人盯上，甚至将网络意见人士视为重点监控对象，对其客观表达社会诉求的行为“一刀切”地拉黑、通报等，缺乏行之有效的良性互动。思想是工作的先行，如果不能解放思想，领悟精神，则遑论引领方向。

^① 王治河：《福柯》，长沙：湖南出版社，1999年，第195页。

^② 阙茜、刘军：《谁掌握了网络话语权？——浅析网络话语权的社會分层》，《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36期，第142—144页。

(五) 工作方法少创新, 空间创造有“时差”

网络人士活跃的网络空间首先是一个话语空间, 这个空间的虚拟性、匿名性、交互性、即时性等特征, 使得现实社会的话语秩序无法被简单直接复制到网络空间中,^① 而网络人士作为和潮流文化联系紧密的群体, 其独立性较强, 生活和工作方式多为“线上”“云端”, 创作时间常常昼夜颠倒, 比起会议室, 他们更喜欢社交网络、艺术机构、户外等交流场所; 比起开会座谈, 他们更喜欢论坛、沙龙、头脑风暴等交流形式;^② 比起“台上台下”的单项输出, 他们更喜欢“平起平坐”的多向探讨; 比起口头的宣讲, 他们更喜欢看得见做得实的参与。空间、时间的不同, 工作、生活的平行, 实践、思维的差异, 让统战工作者与网络人士处于两个完全不同的话语空间, 因而以传统工作方法去交流, 往往事倍功半。因此, 与网络人士的交流交往绝不能仅仅停留在座谈的阶段, 需要不断地创新工作方式方法。

(六) 引导培养不深入, 秩序维护有“温差”

网络人士大多善于结合网络热搜, 找到大众敏感点, 调动网民情绪, 达到目的诉求。然而, 这种影响力也是一把双刃剑, 一旦监控缺位、秩序缺失, 把握不好度, 就会产生反作用。^③ 近年来, 某些网络大V为博眼球造谣生事、诋毁英烈的事件屡见不鲜, 这反映出网络人士过度“自然生长”, 缺乏充分政策引导和激励培养的问题。同时, 基于互联网的虚拟性, 网络人士的覆盖面宽、流动性强、联系难度大等特性, 使得网络人士与统战工作者之间、网络人士彼此之间的熟悉度都不高。常德目前还没有如超大、特大城市一般健康活跃的线上线下互动平台, 因而有较强影响力和代表性的网络人士比较少, 还没有出现粉丝数量超百万、具有全国范围号召力和美誉度的标杆人物。

(七) 联动机制不健全, 回应诉求有“落差”

网络人士统战工作的实践过程涉及多个部门, 绝非统战部一家能独担。常德市虽已成立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领导小组, 却还未能完全建成市委统一领导, 网信、宣传、文化、经信、工商等部门分工协作、各尽其责、协同配合的联动机制, 制度配套不完善, 责任划分不清晰, 相关部门之间的协同度较低, 联系不密切、通气不及时、业务不合作, 未能充分发挥各部门各级党组织的主体作用, 发挥整体联动的合力。

三、加强Ⅱ型大城市网络人士统战工作的建议

基于对调研结果的分析, 做好Ⅱ型大城市的网络人士统战工作, 核心是加强思想政治引导, 引领网络人士的话语方向; 关键是创新工作方式方法, 打造网络人士的话语空间; 重点是深化培养领军人物, 维护网络人士的话语秩序; 目的是完善“1+n”部门联动, 回应网络人士的话语诉求。

(一) 加强思想政治引导, 引领网络人士的话语方向

网络人士大多见多识广、思想独立, 对他们的思想政治引导尤其讲究虚工实做, 寓硬性的思想教育于软性的日常活动中: 一要有灵活性, 打好“听说看写”的“组合拳”, 帮助网络人士以现场参观、实地考察、入户走访、网络互动等各种形式, 听民意、说心声、看民情、写实话, 润

^① 张卓:《众声聒噪:网络空间话语失范与秩序建构》,《人民论坛》2019年第31期,第78—79页。

^② 王娜娜:《新时代网络人士统战工作模式探索》,《广东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8年第1期,第93—97页。

^③ 郭芸:《新媒体时代网络意见人士统战工作策略研究》,《广东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1年第1期,第83—87页。

物无声地使他们通过亲身体会、亲自观感得到独立思考后的结论，真切感受到党的发展历程，进而理解党的政策，增强政治认同；二要有及时性，网络人士对信息的感知与传播速度极快，当负面消息出现时，决不能掩耳盗铃，只有定期分析网络舆情，了解网络舆情，及时就他们关心的问题答疑解惑，消除误解，才能激发他们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有效引领网络人士的话语方向始终跟党走；三要有区别性，对于网络人士中的意见人士，要经常交流谈心，满足其合理诉求，化解其错误认识，求大同存小异，才能增强情感认同，促进正向转化。

（二）创新工作方式方法，打造网络人士的话语空间

网络人士与统战工作者的空间差异，需要通过创新工作方式方法来弥合：在发现识别上，统战部门一定要根据网信办、文化部门提供的线索，主动拜访，不能只寄希望于组织推荐和本人自荐。拜访的形式不一定是登门，可以先从虚拟社交做起。在空间创造上，要积极支持互联网经济发展，深度打造创业孵化、电商合作、“网红”直播等网络人士实践创新基地，将其作为网络人士工作的工作载体，深度对接乡村振兴等国家战略，服务“四同创建”等统战品牌，发挥网络人士的优势。在交往方式上，要充分发挥社区基层党组织、“两新”组织的作用，在线下开展沙龙、论坛等内容实、形式新、效果好的主题活动，在线上建立建言直通车，征求网络人士的意见，了解其需求，关心其发展，并将这种关心了解长期化、常态化。

（三）深化培养领军人物，维护网络人士的话语秩序

话语权是利益的表达，只有尊重网络人士话语权的利益属性，才能有效维护网络人士的话语秩序。尊重的前提是了解，精准了解网络人士的利益诉求，除了调查研究，更常态、更有效率的来源是领军人物的意见。因此，必须培养具有代表性的领军人物，以“一根头发”抓好“一把头发”的话语秩序：^①一要拓宽政治参与渠道。为领军人物搭建参政议政、政情通报、社情考察、民情调研的平台，丰富其政治生活，鼓励、支持、组织他们参与政治事务、社会事务，帮助他们在实践中不断提升参政议政能力。二要以领军人物引导行业自律。通过领军人物建立网络人士联谊组织，完善其组织架构和运行机制，开展行业竞赛、评价评选，形成活动品牌的示范引领，倡导业务规范、风清气正的互联网行业风气，提高行业专业度和美誉度。三要注重正向激励。把新媒体等新闻资讯平台从业人员纳入网络舆情分析师队伍，加强业务培训，对于表现优秀、贡献突出的网络人士，以奖金、证书等方式给予表彰，对先进事迹、典型人物要加强宣传推介力度，以此激发网络人士内生动力，引导他们自发维护话语秩序。

（四）完善“1+n”部门联动，回应网络人士的话语诉求

网络人士统战工作涉及多个部门，且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因此，必须建立党委统一领导、统战部牵头协调、相关部门各负其责的“1+n”部门联动制度，通过统战部、网信办、宣传部等部门的联席会议，把议事协商例行起来；通过与经信、文旅、工商等部门及社区联系，把上下交流运转起来；通过成立网络人士统战工作调研小组，建立相关数据库，动态掌握情况，定期联系走访；通过明确各成员单位的职责，不交叉、不漏项，避免出现“九龙治水”的局面，把及时发现问题、共同研究问题、认真解决问题作为重点，努力实现效能最大化。

责任编辑：念兴昌

^① 黄兰香：《发挥一根头发带动一把头发的作用》，《湖南日报》2019年6月6日，第2版。

论民主党派机关中青年公务员的成长

李续亮

(农工党云南省委理论研究室, 云南 昆明 650032)

摘要: 民主党派机关工作既具一般机关的普遍性特点, 又有民主党派自身特点, 服务民主党派履职是其核心职能。当前, 民主党派机关工作呈现出运行日趋规范、工作作风有待改进、官僚作风代际传递有所显现、履职实效仍待加强等特点。民主党派机关青年公务员的普遍特点是: 受教育程度普遍较高、功利主义代替理想主义、社会责任感相对淡薄、缺乏行动与担当的勇气。基于上述现状及特点, 笔者认为民主党派机关青年成长的新路径在于: 一要营造适合青年成长的机关工作氛围, 二要搭建促进青年成长的工作平台, 三要促成年轻人自身的醒悟与转变。此外, 青年只有具备对未知世界的求知欲、在纷繁复杂的世界中勇敢地去行动、在工作中加强与他人的合作与交流、拥有“美好未来从我做起”的情怀等四方面要素, 方能成为理想主义者。

关键词: 青年公务员; 民主党派; 理想主义; 成长

中图分类号: D66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2811(2022)02-0052-08

王蒙于1956年发表的小说《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 以一个年轻人的视角, 批评组织工作中存在的官僚主义等作风问题, 这在当时赞歌雷动的小说界犹如一股清风, 虽稍显稚嫩却颇能打动人心。小说中的年轻人林震, 以理想主义的率真勇敢, 直面现实, 战胜困难, 义无反顾地投身于工作中。这种理想主义的核心, 简言之便是通过尽职尽责的工作, 创造一个更为美好的未来社会。像林震这样理想化的青年, 现实中必将经历更多磨难与挣扎, 其人生轨迹亦不难想见。然而, 文学的力量在于它可以超越现实与历史, 成为读者的一种心像、一种提醒, 让人咀嚼回味, 温柔地触动乃至微妙地改变人心。在此重提该小说, 并非要谈论文学之功能, 而是因为文学源于现实生活, 该作品引起了笔者对如下问题的关切和探究: 在《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问世60余年后, 现在进入公务员队伍的年轻人状况如何? 他们的工作状态、职业诉求以及成长之路(相较过去)又显现出什么样的“风光”?

笔者对党派机关工作若干方面现状进行了有针对性的考察, 并就其中某些普遍现象提出意见和建议。强调普遍现象, 必然会在某种程度上遮蔽其中的多元现实及其独特个体, 但为了聚集重点、突出共性问题, 只能做出相应取舍。但必须注意, 在普遍性之下, 特别在实际工作中, 尊重每一个个体应是基本准则。笔者希望引起方家对相关问题的关注, 共同为机关青年公务员群体的成长开出更为“对症的药方”。

作者简介: 李续亮, 农工党云南省委理论研究室主任, 主要研究方向为参政党建设。

一、民主党派机关工作特点

民主党派是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同中国共产党通力合作的亲密友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重要参与者和实践者，其基本职能是参政议政、民主监督，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协商。党派机关是民主党派一级组织的常驻办事机构，机关的具体事务性职能承接党派基本职能而来，但机关职能又不能简单地等同于党派职能。笔者调研发现，即使一些有资历的党派机关干部也未必能清晰、准确地认知和把握党派机关相关工作特点。因此，对于新入职的年轻人而言，了解民主党派机关的特点很有必要。

（一）具有一般机关的普遍性特点

按照国家机构现行设置方案，民主党派中央、省市、地市级组织皆设有独立机关，与同级党政机关享有同等政治待遇和经济待遇，一并纳入统一的机构管理和公务员管理系列。民主党派机关与党政机关的这个共性，源自机关的普遍性，决定了党派机关与党政机关有着大致相似的内部日常事务。党派机关与同级别党政机关相比，规模较小，人员较少，但也“五脏俱全”，同样具有机关组织人事、财务管理、公文档案管理、固定资产管理、宣传教育、会务活动等职能。党派机关内设部门及岗位设置，很大一部分就由此而来，比如办公室、组织人事、宣传教育等内设部门，又如会计、出纳、文秘、档案等工作岗位，都是依照机关事务特点而设立。这些内设部门和岗位，日常工作多为重复性事务，对工作人员的要求首先是认真严谨、积极主动，其创新性要求可以说是第二位的。

（二）具有民主党派自身特点

党派机关与党政机关又有区别，这是由党派性质和职能决定的。民主党派作为参政党，没有党政部门具有的政治和国家事务管理的领导和最终决策功能，只有相应的组织和参与功能。与党政机关不同，依据民主党派职能，其机关主要设有参政议政、社会服务、理论研究等内设部门。党政机关内设部门一般依据管理职能而有明确的工作职责，再由其职责设立相应的工作岗位。比如民政部门社会救助岗位，其工作重心围绕最低生活保障、医疗救助、临时救助、五保户救助等展开，工作范围、职责及其目标考核都相对明晰。而党派机关内设部门相应的岗位职责外延非常宽泛，以参政议政岗位为例，几乎所有社会事务都与之相关，职能边界模糊，重心随时而变。这些特点在工作中表现为党派机关工作刚性不强，许多工作难以用硬性指标来要求，数量指标常常难以客观地衡量工作成效。由于工作考核手段缺乏，易导致党派机关工作松散拖沓、不够严谨。

（三）服务民主党派履职是党派机关核心职能

将党派机关内设部门与民主党派三项基本职能相比较，具有一一对应关系的唯有参政议政部门，民主监督和政治协商尚无对应机构。这也直观地表明，党派职能与党派机关职能不可等同。党派三项基本职能指向不同，但主要都是通过提建议、作批评的方式来发挥作用。当前情况下，参政议政部门的工作实际含涉了党派三项基本职能。参政议政在长期工作实践中已相对规范化，工作主动性、自主性较强，相关议题每年都会列入重点任务之中按计划实施；而民主监督和参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协商功能尚未充分发挥，工作中多有被动之处。作为参政党，监督什么、协商什么一般难以由民主党派完全自主决定，其内容、时间都有不确定性，难以在事前做好充分准备。要做好这两项工作，主要依靠党派的人才、智力储备，最可靠的方式是以参政议政为基础，通过年复一年的调研积累，对党委政府工作比较熟悉，对社会问题及其解决路径有所了解和考虑，才能在临时布置的协商议题、监督对象面前做到心中有数。

二、民主党派机关工作现状

(一) 运行日趋规范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共中央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要求“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此后相继发布了《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等系列重要文件,为民主党派发挥作用搭建了更为广阔的政治舞台,在人、财、物等运行保障方面给予了民主党派更大的支持。在长期工作实践中,民主党派工作规范化、程序化程度日益提高,党派各级机关不断加强自身建设,不断提高自身水平,认真履职、积极作为,为民主党派紧紧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发挥着切实有效的基础性作用,各方面工作都取得了较好成绩。

(二) 工作作风有待改进

必须承认,党派机关工作中依然存在着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当前各民主党派在组织发展、参政议政等方面日渐趋同,这一方面说明各党派都在想方设法拓展工作,另一方面说明各党派缺乏长远发展目标及其独特定位。趋同化的各党派机关,大都缺乏行之有效的职业长远目标激励机制和绩效考核奖惩机制,部分干部职工在长期重复性事务中工作积极性和主动性逐渐减弱,缺乏主动创新的动力,变得懈怠乃至迷惘,工作活力不足、敷衍了事,机关作风散漫、纪律松弛,缺乏主动学习、相互探讨、团结合作的工作和学习氛围。

(三) 官僚作风代际传递有所显现

2013年以来,党中央持续纠治“四风”,而机关官僚作风正是官僚主义的产物,是权力傲慢的伴生物。从历史上看,民主党派不行使行政权力,官僚作风相对淡薄,机关领导与下属间相对平等。但机构运行得越久,越会沿袭形成一套程式化工作模式,民主党派机关也不例外。随着自上而下的行政化管理模式日趋固化,民主党派官僚作风在代际传递中有所显露,有些地方甚至日趋严重,这对党派作用发挥以及年轻人的成长形成了阻碍。

(四) 履职实效有待加强

民主党派及其机关在职能发挥方面,一定程度上存在重数量轻质量、重表面轻结果、重行为轻实效的倾向。参政议政缺乏真正沉下心来的深入调查研究,调研课题不少,提案数量连年增多,但其中也有不少浅尝辄止、拾人牙慧、充数作秀的篇什。注重在高规格的民主协商会议上作发言,但对发言效果和协商意见会后的落实情况,却缺乏应有的重视和跟踪关注。一些社会服务活动,启动仪式很隆重,实际内容却流于形式,且多是蜻蜓点水,难以形成持之以恒的社会影响。

三、民主党派机关青年公务员的普遍特点

如果说青年是祖国的未来,那么也可以说青年是一个单位集体的未来。此种观点饱含着人们对青年人的殷切期望。只是,青年并不会顺理成章地为集体、为国家开出美好未来。要使期望化为现实,首先要认清青年的现状,再以此为基础营造青年成长的良好氛围,支持并引导他们增长才干、发挥潜能,由此才能培养出一代有为青年,使他们有能力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若不了解年轻人的现状,一味地为青年欢呼,则有可能助长年轻人沾染上目空一切的自大习气。据笔者观察,目前党派年轻人如下特点较为突出。

(一) 受教育程度普遍较高

当前,年轻人进入民主党派机关工作的主要途径是公务员考试。公务员考试因为相对公平公正,近年来异常火爆,民主党派机关亦不例外。2016年报考“民盟中央办公厅接待处主任科员及

以下”一职的人数达 9837 人，一度成为热点新闻。这虽然和该岗位报考门槛较低及其他偶然因素有关，但也说明，只要是公务员岗位，无论是何单位，竞争大多异常激烈。通过激烈竞争进入党派机关工作的青年，普遍具有学历较高、学习能力较强、综合能力较好、易接受新鲜事物等特点，在未来工作中可塑性较强，提升空间较大。在物质丰富、享乐在部分人中盛行的当下，能抵制种种诱惑，静下心来学习并通过考试的年轻人，大多具有自律性较强、为自己的未来舍得付出等优点。党派机关若能发挥好青年人的这些优点，让他们较快地熟悉本职工作，将对机关工作平稳延续、不断创新起到良好效果。

（二）功利主义代替理想主义

不可否认，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之风气。成长于此一时代的青年，或多或少会受到当下各种风气的影响。对于各种风气的习染，由于大家都身处其中，往往习焉不察，只有形成冲突才会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现在进入党派机关的年轻人，多数生于 20 世纪 90 年代前后，成长于新千年之后。这二十多年中，中国社会物质财富极大丰富、现代资讯极为发达、市场经济条件下消费主义一度盛行。但在物质文明迅速发展的同时，受应试教育现象突出的普通教育狭隘化、高等教育产业化、文化产品娱乐化及社会拜金主义等综合因素影响，与之相伴的精神文明发展相对滞后，导致中国社会理想主义受到冲击，民众极易堕入功利主义陷阱。这表现在大的方面，就是过去政府过于强调 GDP 高增长；在小的方面，就是个人执迷于物质获取。在此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年轻人，一旦进入民主党派机关，身上的功利主义因子便会表现出来，比如面对工作习惯先作权衡，只为利己之事，于利公之事则敷衍塞责、推诿逃避。如此对比，姑且不论王蒙《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中的那种理想主义是否可行，在当下某些年轻公务员身上，恐怕已很难找出一星半点的理想主义了。我们绝不能仅仅将此视为务实，若无正确的理想信念指引，务实要么走向唯利是图的执迷，要么走向唯唯诺诺的卑怯。这于年轻人自己、于单位，乃至国家，都不是一种好的现象。

（三）社会责任感相对淡薄

功利主义导致一部分青年成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而究其深层原因，其实隐藏着当下年轻人的迷惘与不安。从学生时代起，来自家庭、学校、社会的普遍观念及诸多现实事例都在告诉他们：学生的唯一要务是学习，学习是为了高分，高分是为了上好学校，上好学校是为了找好工作，找好工作是为了占据社会上的好位置，然后过上好日子——这便是“教育”为大多数青年设计的人生道路。在激烈的竞争下，与这条道路无关的任何思考与行为，都有可能被视为多余甚至是危险的。这种观念之下，学生压力单一而沉重，学习主动性和抗挫折能力较差，思维固化，缺乏独立思考、分析现实的能力，难以形成健康积极的人生观、价值观和正确的思想道德观念。很多人因此成为消费社会的俘虏，缺乏对社会正确和较为全面的认知，缺乏社会责任感、使命感，难以肩负起促进社会发展的时代使命。民主党派要履行好作批评、提建议的参政党职能，除了要求党派中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代表性人士认真履行职责外，也必然要求党派机关工作人员关注社会发展现状，由此才能更好地发现问题、研究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如果年轻人社会责任感淡漠，一门心思计算工作回报与自己的享乐人生，如何能胜任党派机关工作？

（四）缺乏行动与担当的勇气

当前接受高等教育后进入机关工作的年轻人，面临着从学校步入社会的二次启蒙。他们中的很多人书本知识学习了不少，但诸多知识是模式化、僵死化和碎片化的，很难与复杂变化的现实社会相契合，也很难在实践中发挥指导作用。其在青年身上的直观表现，便是眼高手低、脱离实际，容易因浅表的社会现象而热血沸腾或义愤填膺，难以看到现象之下潜藏的内在机制和深层逻辑联系。青年一旦投身其中，难以立稳脚跟，也难以把握住问题的症结，做事情习惯往一个方向

考虑而看不到更多的可能性,容易在一段时间后产生自身渺小无力的挫败感。受挫的结果,会使青年对以往学校教育中形成的相对抽象和简化的价值观和方法论产生困惑,比如书本上是非分明的世界,现实中却是非难辨;又如书本上看似简单的工作,实际可能比想象中更繁杂琐碎,不少事务困难而艰苦又不得不做。一些青年受到挫折,容易逐渐往毫无底线的投机主义者的方向发展;或者认为“一切都是假的,做什么都没用”,逐渐成为“看穿一切”的虚无主义者。青年的这两种“发展路径”,看似方向截然不同,实则都导致与工作方向的偏离,表现在工作中,便是工作没有动力,不知道该做什么,拈轻怕重、缺乏团队精神,领导交代的才做,要承担责任的便推脱,面对问题丧失说真话的勇气。时间一长,一些本来正直勇敢的年轻人,逐渐变作懦弱自卑与势利狭隘并存的人,令人痛心疾首。

四、探寻民主党派机关年轻人成长的新路径

机关工作向好发展与年轻人的成长是一个相辅相成的过程,也是一个需要时间来塑造的相对缓慢的过程。那种以为机关作风可以因某项措施而绝然改观,或年轻人是一天就长成的看法,不过是一厢情愿的天真。这是个需要从细微处入手并持续推进的过程,其间观念的逐步转变,与相关措施的不断完善,都显得异乎重要。

(一) 营造适合年轻人成长的机关工作氛围

氛围者,看不见摸不着,仿若无可凭藉,但其于人的重要性又如同空气之于鸟,水之于鱼。小至家庭,大至国家乃至全球,都有某种可感可触的氛围流贯其间,成为影响、塑造我们生命情绪与体验的重要部分。机关是社会大环境之下的一个小环境,其氛围既受大环境影响,又能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小环境,可以营造自己独特的氛围。机关工作氛围的形成与变化,涉及机关的传统、职能现状与可期许的目标,涉及机关的主要领导,也涉及每一个人,是一个综合因素相互碰撞磨合的结果。

1. 培育机关良好工作氛围的基础,在于构建公正、人格平等的同事关系

机关公务员之间主要是行政关系,这和企业的雇佣关系不太一样。机关工作相当程度上仍未完全打破“铁饭碗”的传统制度机制,行政关系能影响一个人的升迁及职业前景,但管理人的手段相对有限,效用也常常并不理想。比如企业辞退员工相对容易,但机关单位要辞退一名公务员却有严格的法律程序,乃至对于消极怠工者惩治手段相对欠缺。为此,在上下级行政关系间同时构建一种公正、人格平等的同事关系,就显得很有必要。在工作中,领导与下属是领导与被领导关系;但作为同事,下属与领导都具有平等的人格和尊严。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公务员具有“服从和执行上级依法作出的决定和命令”的义务,也具有“对机关工作和领导人员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机关领导及全体员工运用好各自权利与义务的主要手段,便是实行民主集中制。比如在涉及职务晋升、工资调整、年终奖励、学习培训等情况时,实行民主集中制能确保基本的公平公正,促使青年公务员长期保持团结干事、积极向上的工作动力,从而营造和谐有序的工作氛围。

2. 领导在机关氛围营造中起着关键少数的重要作用

如前所述,行政体制容易滋生官僚作风,而官僚作风与平等公正可谓是一对天敌。一个机关,如果主要领导官僚作风严重,搞一言堂,那么机关平等公正的氛围一定很难形成。为此,党派机关领导主持工作大局时,应多听取下属意见,注意工作及人事的延续性,尤其应注重从施令者向引路人的转变,不做“一切都自己说了算”的强硬领导,而是要在履职中做一个智慧宽厚的引路人,掌控好方向,发挥所有人特别是年轻人的聪明才干。只有领导主动转变,多从机关层面、工

作发展来考虑问题，少一些任人唯亲的小圈子思维，机关才能形成相互竞争、相互促进的工作氛围。

3. 在学习型机关建设中应注重发挥年轻人的作用

当前民主党派都很注重学习型机关建设，始终将积极开展各类会议文件、讲话精神的传达学习作为首要政治任务。为培养机关同仁热爱学习、勤于思考的良好习惯，特别是从锻炼年轻人的角度出发，机关学习在形式上可作适当改变，学习内容也可有所拓展。例如在党派机关定期开展的学习会上，适当压缩领导传达会议文件（这方面内容可多推动自学）的时间，增加年轻人主持的环节。如由一位年轻人根据自己的社会关注点，报领导同意后预先提出一个学习主题，届时由其作主题发言，然后展开讨论。此种形式运用得当，对个人能力提升将大有裨益，且能加强机关学习氛围和凝聚力，促进研究成果的产出。一旦养成习惯，机关同仁就能体会到学习的快乐，感受到思考的迷人魅力。长此以往，无须强制要求，年轻人就会主动研究问题，从而形成自觉工作的良好氛围。

（二）搭建促进年轻人成长的工作平台

年轻人向来是优点与不足并存，且其精神状态仍在激烈的变化之中，因此机关同仁要关心、爱护、支持他们。任何人都有不足，这并不可怕，关键是机关领导要为年轻人成长与发展创造机会，通过工作实践来提升他们的办事能力、协调能力、组织能力等综合素质，磨炼他们的心性意志，使他们在工作中逐渐成长为能担当、肯用心、实干型的合格公务员。比如年轻人通过公务员岗位考试进入党派机关后，在其一年试用期内，可让其先在机关内部岗位间进行轮岗，让其对机关工作先有整体了解，再根据其特点、专长，与机关工作需求相结合来安排其工作岗位。为做好年轻人理论与实践的有效衔接，工作中应重视对年轻人的传帮带工作，多让年轻人参加各类专项学习培训，使其尽快进入工作角色。

鉴于参政议政是核心职能，党派机关可借鉴智库经验来加强年轻人的培养。据笔者了解，比起某些政府职能部门，党派工作相对来说压力较小，年轻人进入党派机关工作后容易无所适从而变得散漫。要看到，党派机关常态化工作虽然不算多，但明确的主体界别和主要职能又决定了党派工作有着相对固定的模式与连续性。比如农工党以医药卫生、生态环境、人口资源为主体界别，其主要工作便是围绕主体界别所在领域提意见、作批评，从而履行好参政议政、协商监督等参政党职能。这就要求党派机关工作人员，能围绕主体界别的某方面工作提出具有前瞻性、针对性的建议。因此，机关在对年轻人实行岗位管理、要求他们做好机关事务的基础上，应充分考虑党派界别和职能，借鉴智库培养专门人才的模式，对年轻人工作研究方向有一个量身定制的考虑，使其特别关注某个工作领域并逐渐往深度研究方向发展。为此，党派机关在确定年轻人的工作岗位之后，亦应当确定一个与工作密切相关的专业领域引导其深入学习。在以后的工作中，遇到该领域的调研、协商等工作任务，先让其多参与，待其水平有所提升后便由其来完成相关工作任务。比如确定某个年轻人在前辈同事引导下，专门负责医药卫生领域的研究，平时要求他广泛深入地学习该领域的相关政策及工作动态，到需要给医卫工作提建议时，就由其先草拟相关建议稿。这样做，可以使机关工作有延续性，保证所提建议能有相当的专业水准，避免领导安排工作的随意性、无序性，还能使年轻人在成为合格的党派机关公务员的基础上，逐渐成长为在某一领域有所专长的专家型人才，实现推进党派工作与促进年轻人成长的双赢局面。

（三）要促成年轻人自身的醒悟与转变

只要每个人都还怀揣着哪怕非常微小的一点希望，就表明理想主义并不是那么弱不禁风，也不可能被轻易抛弃或击垮。有时候，理想主义可能只是隐而不显而已，如同荒寒野地，一旦春风

吹拂便青草如碧。无论年轻人是不是精致的功利主义者，在他们身上，理想主义者的种子依然存在，关键是社会乃至年轻人自己如何唤醒这些种子。当下在公务员中理想信念缺失的现象仍较为突出。但要看到，从公务员所承担的重大社会责任来说，这一群体是否具有理想主义，对于国家社会其实至关重要。作为年轻人，也无须每天将理想主义挂在嘴上，因为真正的理想主义必须体现在行动中。况且，虽然“理想主义”这四个字是确实一致的，但每个人的理想主义却有千差万别。在争议面前，下一个简单武断的结论是容易的，但这样的结论如果不能触动人心，将于事无补。

多年考试教育的习染，使得年轻人普遍注重结果而忽视过程。若以此心态来对待工作，以为考上公务员便万事大吉，他将会在日复一日的工作中，体会到光鲜亮丽的公务员身份背后的平庸。无论何种职业，欲将其做好，都必然有着无法逃避的枯燥与必须为之付出的辛劳。不少年轻人认为工作不过是谋生手段，而一旦用心从事某项工作便会发现，它其实是寄托生命的一种方式，因为你大部分时间都得干这个，且不论你喜欢还是厌恶。正是在工作的河流里，生命得以随之涌动，而所谓的结果——比如貌似决定生命轨迹的某次考试、升迁、奖励或荣誉——只是生命涌动的自然（并非必然）结果。如果体会不到过程的喜悦与充实，一门心思去追逐那些“PK掉他人”“先据要路津”的所谓成功，这样的生命或许是紧张而枯燥的，也是难以长期坚持下去的。因此，如何对工作与人生的关系有切身感悟和正确认知，以“为人生负责”的态度投入工作，努力在其中实现自己的一部分价值（并非全部），应是每位年轻公务员都必须认真考虑的问题。这个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常见的训诫与教诲也未必有用，非得每个人经过自己一番逼拶才能真正触动自身。

抛开此前对工作单位的成见与预期，实事求是地认识岗位工作的特点及其内容，是青年公务员必须要有的态度。社会成见习惯于将公务员单位划分为三六九等，党政实权部门受到追捧，边缘部门受到轻视。年轻人很容易受到这些成见的干扰，进入实权部门便志得意满，进入边缘部门便自卑怯懦。在单位内部对待不同岗位的态度亦是如此。这种态度乃是作茧自缚，其于年轻人的成长多有妨害。在一些社会偏见看来，民主党派是相对少为人知的冷门，但年轻人进入其中，大可不必为此而自卑。姑且不论民主党派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中的重要性，就是如实了解民主党派的主要职能与具体工作，也能发现党派工作有着与其他党政部门不一样的特点及其长处。仅以参政议政职能来看，民主党派可以就社会面临的方方面面的问题发表意见、提出建议，这为各党派发挥职能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再如民主党派领导多为兼职，许多高层的政治协商、民主监督的基础工作，都需要依托党派机关来具体完成，虽然高层会议上是领导发言，但年轻公务员的调研成果能够得到展现，甚至合理化建议能得到采纳，这又岂不是对年轻人工作的肯定以及其对社会作出的一份贡献。这些都表明，依据社会管理职能设置的每个单位及其每项工作，都有其发挥作用的社会空间，只要认真履职，任何平凡岗位都能创造出不凡的业绩。

（四）对理想主义的回应

从青年公务员成长的角度，笔者不避空疏，认为成为理想主义者应具备如下几点必备要素，聊作60余年后对《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的回应。

首先要保持对未知世界的求知欲。必须承认，我们对世界与自身的理解远未臻至完善。而在我们有限的生命中，始终应以开放的心灵去面对我们所经历和遇到的一切事物。在工作中遇到的许多问题，都必须经过切实的思考，才能得出独立的判断。社会生活与个人生命的完善，皆需要这样真实的思考与判断。没必要自我设限，以为可以用某种一成不变的观念去应对始终处在变迁中的社会。在社会变迁中保持一种理论的谦逊，尽可能地去理解人和事，方能从中探寻一种更为符合实际的行事之道。

其次是要在纷繁复杂的世界中勇敢地去行动。人生永远是未完成的，也因此充满希望。而完成人生的路径，便是行动。青年公务员作为承担某项社会事务的执行者、推动者、参与者，身上肩负着一份事关公共事务的社会责任。这份公共责任的担当，仍然必须通过行动去完成。其间必定会遇到许多困难、困惑乃至无力承担等种种压力，这就需要勇敢地面对，顶住种种压力，努力使公共事务朝理性的轨道持续推进。

再次是要在工作中加强与他人的合作与交流。承认人类事务的复杂、个体能力的有限、人与人的相异与相依，是加强合作与交流的前提。当下的年轻公务员，大多数是独生子女，合作共事能力欠缺是一大短板。在现实中，任何一项具体工作都会涉及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观点相互碰撞。青年公务员必须认识到，通过交流与合作在多元现实中寻求行动之道，既是必不可少的手段，也是目的。因为人生的修行，必须在与他者的交往中方能完成。也只有在与他者的交往中，我们的心性才能有所显现。

最后，应该拥有一种“美好未来从我做起”的情怀。人类社会任何细微的进步都是艰难的，需要身处其中的每个人的努力，年轻人刚走上工作岗位时所能起到的作用是有限的，但这不应该成为年轻人退却的理由。我们可以通过自己的一言一行，影响到身边的人，影响到一项事务的运行方式。当这种影响逐渐积累，公务环境逐渐改善，社会的进步便已在其中。我们有责任不让“从我做起”沦为一句空话，亦只有从我做起，才能为理想的未来播撒美好的种子。且无论是身处何处，年轻人或许都应该抱持这样的信念：一种社会形态的美好，必须在生活于其间的个体身上得到体现，亦即在人身上呈现出来的美好方为真实的美好。

责任编辑：罗 雷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台胞国家认同的重构路径探析

——基于对“两岸族”台胞的深度访谈

邱鸿博

(中共福建省委平潭综合实验区工作委员会党校, 福建 福州 350400)

摘要:“两岸族”台胞是两岸融合发展的主要群体。通过深度访谈发现,当前“两岸族”台胞的国家认同存在“双重身份认同”突出、“中国疆域认同”提升和制度认同存在偏见等特征。岛内政治文化、社会环境等多方面因素对“两岸族”台胞的国家认同深刻影响,同时,近年来大陆对台政策体系也逐渐对“两岸族”台胞的国家认同产生了积极影响,但传导效应不明显。建议以“两岸族”台胞为纽带,通过深化细化两岸经济社会融合发展措施,加强对台宣传话语体系建设,突出以“家国情怀”为重点的历史文化建设等多路径重构台胞国家认同。

关键词:台湾;“两岸族”台胞;中国认同

中图分类号: D61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2811(2022)02-0060-12

近年来,台湾地区岛内台胞国家认同出现异化危机。根据台湾政治大学长期抽样调查数据显示,台湾民众的“台湾人”认同感自1992年起持续上升,2021年为62.3%;而中国人认同和两种身份认同均有者仅为31.7%,比例持续下行。^①从早期台商、台干、台属群体,到现在大量的求学、创业、求职、婚配人群,在台湾岛内,这些人被称之为“两岸族”。^②“两岸族”是两岸融合发展的主要群体,根据全国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目前常住及经常往来两岸的台胞共有15万7886人。^③“两岸族”也是与大陆交流最直接最亲密的台胞群体,他们既长期受岛内“台独”文化教育的影响,又受大陆惠台及两岸融合发展政策体系影响,他们的国家认同状况如何,形成机制怎样,有哪些重构可能,值得深入研究。

基金项目:福建省委党校(行政学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基地2021年度课题“新发展阶段‘两岸族’台胞社会认同及其影响因素研究”(2021FTSH1141);福建省社会主义学院系统2021年度课题“新时代背景下海峡两岸社会融合发展研究”(2021FJSY005)。

作者简介:邱鸿博,中共福建省委平潭综合实验区工作委员会党校教研室教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两岸关系、城市社会学。

^① 台湾政治大学选举研究中心:重要政治态度分布趋势图(1992—2021.12),台湾政治大学选举研究中心网站:<https://esc.nccu.edu.tw/PageDoc/Detail?fid=7804&id=6960>,2022年3月10日。

^② 朱云汉:《新半山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台湾《中国时报》2002年6月24日,第2版。

^③ 国家统计局: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第八号),2021年6月28日,http://www.stats.gov.cn/tjsj/tjgb/rkpcgb/qgrkpcgb/202106/t20210628_1818827.html,2022年3月10日。

一、概念界定与文献综述

（一）相关概念界定

认同被普遍认为是一种心理学概念，它是个体向他者或群体进行身份识别和价值肯定，最终形成自我归属的过程。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认为国家是一种“想象的共同体”。^① 国家认同就是在他国存在的语境下，国民所构建出来的归属于自己国家的身份感。个人对所在国家的民族文化特性和政治主张特性（包括其合法性和合理性）的承认和接受，进而产生的归属感，形成国家认同。^② 为了将国家认同这个“想象的共同体”概念变得具体化，学者们把国家认同作为一种综合多种要素概念。国家要建构良好的政治制度这一“硬件”，还需要努力增进民众对历史文化的共同认知，塑造着民众属于同一命运共同体的牢固想象。^③

台胞的国家认同一直是两岸学者研究的重要主题。在台胞国家认同的内涵研究上，学者们对台胞身份认同并无异议，显而易见的是台湾并没有自己被公认的独特民族、文化和领土国家主权，所以，台胞国家认同的内涵与居住在大陆的中国公民（以下简称大陆居民）的国家认同内涵应该说大部分相同。台湾的特殊性在于，目前有一个脱离于中国中央政权的地区性“政权”，且该“政权”台湾当前实行地区普选制度，因此，政治认同作为国家认同的一个方面来看，与大陆居民存在较大差别。本文为了与大陆居民的国家认同内涵区别开来，将台胞国家认同的政治认同方面设定为制度认同，主要包括对“九二共识”和“一国两制”的认同。

因此，笔者认为，台胞的国家认同的内涵包括三个方面：一是身份认同，即认为自己是“台湾人”还是中国人，同时鉴于台湾政治特殊性，也将比照台湾研究惯例，增加“双重认同”作为身份认同类别之一；二是历史文化认同，也就是对中华民族发展历史和中华文化的认同感；三是制度认同，即对“九二共识”和“一国两制”的认同，其中最重要的是对“统一”或者“独立”的态度。

（二）文献回顾

在台胞国家认同现状的研究方面。第一个特点是“台湾认同”崛起。特别是经过上世纪90年代政治转型和多年来的政党轮替，岛内台胞的国家认同感日益下降，国家认同出现异化危机。“中国人认同”持续下降后保持低比率稳定，而“台湾主体意识”已逐渐扎根台湾民众心中。^④ 第二个特点是双重身份认同现象。“只是‘台湾人’”的认同者在国家认同上认为台湾具有“主体性”，但在文化上具备中华文化认同；而双重认同者倾向于“维持现状”，没有明显的国家认同意向，对“中国”采取文化上的归属意义，对“台湾”则采取出生地与居住地的地理归属意义。^⑤

在台胞国家认同影响因素方面。第一类影响因素是世代差异。由于台湾历史和迁徙人口的复杂性，不同世代的国家认同呈现不同的特点。孔小惠等通过对台湾三个时期叙事认同及“我他”关系的分析发现，不同叙事模式的建构会影响台湾民众“国家认同”的趋向。^⑥ 然而，李家新等人

① [美]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吴叡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9页。

② 郑富兴、高潇怡：《经济全球化与国家认同感的培养》，《教育研究与实验》2005年第3期，第32页。

③ 吴玉军：《论国家认同的基本内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5年第1期，第48—53页。

④ 林震：《论台湾民主化进程中的国家认同问题》，《台湾研究集刊》2001年第2期，第67页—77页。

⑤ 林孟如：《民主化与本土化后国家认同之研究——以2012年第十三届“总统大选”首投选民为例》，硕士学位论文，台湾嘉义：中正大学，2013年，第65页。

⑥ 孔小惠、戴高云：《台湾民众“国家认同”变迁及其成因分析——基于叙事认同理论的视角》，《台海研究》2020年第4期，第41—52页。

通过实证研究认为政治倾向可能是影响台湾民众“中国认同”的关键因素，“代际差异”并不是影响国家认同的关键因素。^①同时，台胞国家认同还受台独当局“去中国化”“台湾主体教育”等负面因素影响^②。第三类是社会文化心理因素，如族群矛盾、社会心理等。第四类是大陆因素，如学者提出，相较于在大陆的经历，对大陆的印象更能影响台湾民众的“中国认同”。^③

在重建台胞国家认同的途径上，孙云通过对经贸交流如何影响政治认同的实证分析，强调了经济融合的重要性^④。同时，随着近年来大陆两岸融合政策方针的实施，更多的学者把眼光放在台胞与“大陆社会整合”的现实中进行考察，他们认为随着大陆对台胞落实各项社会公共服务政策以后，台胞的社会归属感更强，从而潜移默化中影响他们的国家认同。^⑤也有人从与台湾本地文化更相近的“闽南文化”出发，认为文化交流在推动台胞国家认同上具有重要作用。^⑥根据社会交换理论，认为在通过整合交换经济、文化和政治三类资源基础上凝聚价值共识对台胞国家认同重构具有重要意义。^⑦

综上所述，学者们从民族、文化、历史源头、政治制度等多方面分析了台湾同胞国家认同的现状及其成因，并通过分析两岸经济社会文化交流如何影响台胞国家认同等探讨了台胞国家认同提升的路径等。可以说，对台胞国家认同的研究成果已经较为丰富，但是也存在一些可以继续丰富的研究点。例如，对岛内台湾同胞国家认同的研究往往容易陷入台湾学者的“历史伤痕无法修复”论调，甚至迷失在“新自由主义”中，损害了自身的话语权。所谓“伤痕”历史对台胞国家认同的影响，这些因素影响多大且如何影响，值得进一步探讨。再比如，有些学者认为2008年以来，虽然两岸交流与合作的深度与广度空前提升，台胞的国家认同却并没有得到提升，那么，“两岸交流”和各项惠台政策是否对台胞国家认同有影响呢？这值得进一步探讨。此前的研究往往以全体台胞或者岛内台胞为主，对于个体的关注，特别是对外部机制如何影响个体的国家认同的关注并不多。

所以，本文要探讨的重点问题，一是当前“两岸族”台胞国家认同问题的特征有哪些，二是其个体的国家认同形成的外在机制是什么，三是当前大陆对台政策是如何影响“两岸族”台胞国家认同的，四是如何重构台胞特别是“两岸族”台胞的国家认同。

二、研究方法和样本选择

（一）研究方法

受疫情和当前台海局势的影响，对台胞大量发放问卷采用实证研究方法的难度较大，同时，

① 李家新、陈美儿、蔡一村：《台湾民众“中国认同”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台湾地区“中国大陆印象调查”的分析》，《闽台关系研究》2020年第4期，第1—16页。

② 参见陈孔立：《台湾“去中国化”的文化动向》，《台湾研究集刊》2001年第3期，第1—11页；李家新：《台湾教育政策变迁及其对民众“国家认同”的影响》，《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17年第1期，第134—152页。

③ 李家新、陈美儿、蔡一村：《台湾民众“中国认同”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台湾地区“中国大陆印象调查”的分析》，《闽台关系研究》2020年第4期，第1—16页。

④ 孙云、王秀萍：《新功能主义的“外溢效应”在两岸关系中之检视》，《台湾研究》2015年第1期，第9—14页。

⑤ 严志兰：《台湾民众认同问题的历史与现实——以大陆台商社会认同的实证研究为例》，《东南学术》2014年第1期，第197—209页。

⑥ 参见：林晓峰、曾莹：《闽南文化在推进两岸“心灵契合”中的作用及路径》，《闽台文化研究》2018年第2期，第5—12页；霍伟东、陆嘉健、傅承哲：《交流何以促进认同？台湾民众“登陆”的身份认同效应及机制检验》，《台湾研究集刊》2019年第6期，第18—34页。

⑦ 王英：《两岸政治认同形成机制研究》，北京：九州出版社，2020年，第184—194页。

本文的重点并不在于测算台胞国家认同的比例，也不在于对台胞个体因素如职业、性别、学历等对国家认同的影响，而在于对台胞国家认同的形成过程和影响因素的立体性考察。因此本文主要采用深度访谈方法进行。为保证访谈的顺利实施，设计了如下访谈提纲：（1）就国民身份而言，您认为自己是“台湾人”还是中国人，或者都属于？（2）您的父辈是从小生活在台湾吗？他是哪里人？您觉得他是否对你的国家公民身份产生影响？（3）您的身份认同是否受学校教科书、时政新闻、同龄人影响？（4）您在台湾的朋友有没有不认同中国人身份的，您认为他们都有什么特点？（5）您在大陆会认为自己是中国人吗？您觉得做中国人会给你带来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影响？（6）当前台湾的文化您觉得是中华传统文化吗？日本文化、西方文化在年轻人当中的影响多大？（6）在大陆，您经常浏览哪些媒体和哪些内容？（7）您觉得中华民族的一员和中国人是同一个概念吗？（8）您对“九二共识”和“一国两制”方案的具体内容了解吗？您觉得部分台湾民众不愿意接受“九二共识”和“一国两制”方案的主要原因是什么？（9）能不能具体列举一些“台独”分子的诉求和言论？（10）您大陆的朋友和台湾的朋友对您的国家观念有影响吗？

（二）样本选择

在访谈对象上，本文根据对本地区台湾工作部门和台商协会提供的台胞分布情况，同时结合可能影响台胞国家认同的因素出发，尽量筛选不同年龄、不同职业、性别、父辈祖籍等主要特征的台胞样本。访谈对象以中青年为主，其中30岁以下的3人，30—45岁的4人，45—50岁的1人，50岁以上的1人。访谈对象共计9人，以A1-A9进行编码。

表1 受访者信息表

受访者编号	年龄	性别	职业	父辈祖籍
A1	26岁	男	台资企业职员	福建
A2	28岁	男	民宿经营者	福建
A3	26岁	女	台资幼儿园教师	安徽
A4	36岁	女	台资企业中层管理	江苏
A5	36岁	男	台商个体经营	福建
A6	45岁	男	台资小微企业负责人	山东
A7	52岁	男	台资农业园经营者	辽宁
A8	32岁	女	台资企业管理者	台湾
A9	31岁	男	台资企业工程师	福建

三、“两岸族”台胞国家认同的特征与趋势

本文并不在于对“两岸族”台胞国家认同的样本统计作描述性分析，重点在于，一是对比台湾岛内普通台胞的国家认同情况，发现“共通性”问题。二是分析其成为“两岸族”后的国家认同变化，找到他们国家认同发展的新趋势。在对深度访谈资料进行编码分析后发现，当前“两岸族”台胞的国家认同呈现以下特征和趋势。

（一）双重身份认同更突出

岛内台胞的国家认同主要表现为“台湾人”与中国人的对立冲突，即乡土认同和国家认同之间的错位和混杂。对比台湾政治大学2021年最新抽样调查结果（见表3），其显示民众岛内台胞强烈的“台湾人”认同突出。而本次受访的“两岸族”台胞则更愿意认可自己既是中国人也是“台湾人”的双重身份认同，很多受访者并不愿意在身份认同中进行二选一。可以说，整体来说，

“两岸族”台胞持双重身份认同占主流。而这个双重认同中也有两种含义。部分受访者认为从地域上来讲，自己是“台湾人”，而从国民身份上是中国人，当然，这里说的中国人并不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而是广义的中华民族。还有受访者认为自己更倾向于认同大中国下的具有特别地位的台湾地区人身份，更愿意接受类似于“英联邦”的联邦国民身份结构。

表2 受访者身份认同回答

编号	问题：从国民的角度看，您觉得您是中国人还是“台湾人”？
A1	我觉得我是在中国的“台湾人”，我还是比较认同华人概念，但是从政治角度上讲，我更认为我是“台湾人”。
A2	比较认可台湾华人这个观点，对，就是都认同。
A3	我觉得在其他国家比如日本，比较认同我是中国人，在大陆我认为我是“台湾人”。
A4	我比较倾向是中国人，这也是我来大陆做教育事业的一个想法。
A5	我应该算是在大陆的“台湾人”，但是在台湾，我不能这么说。
A6	我觉得是两个不同政治“国家”，像英国一样，我是“台湾人”，但是也属于中国。
A7	我已经来大陆12年了，和当地人关系也很好。我是中国人，我告诉孩子们他们都是中国人。
A8	我认为自己是“台湾人”比较多。
A9	我是外派到大陆的，倾向于自己是“台湾人”，但我不支持台湾过激的举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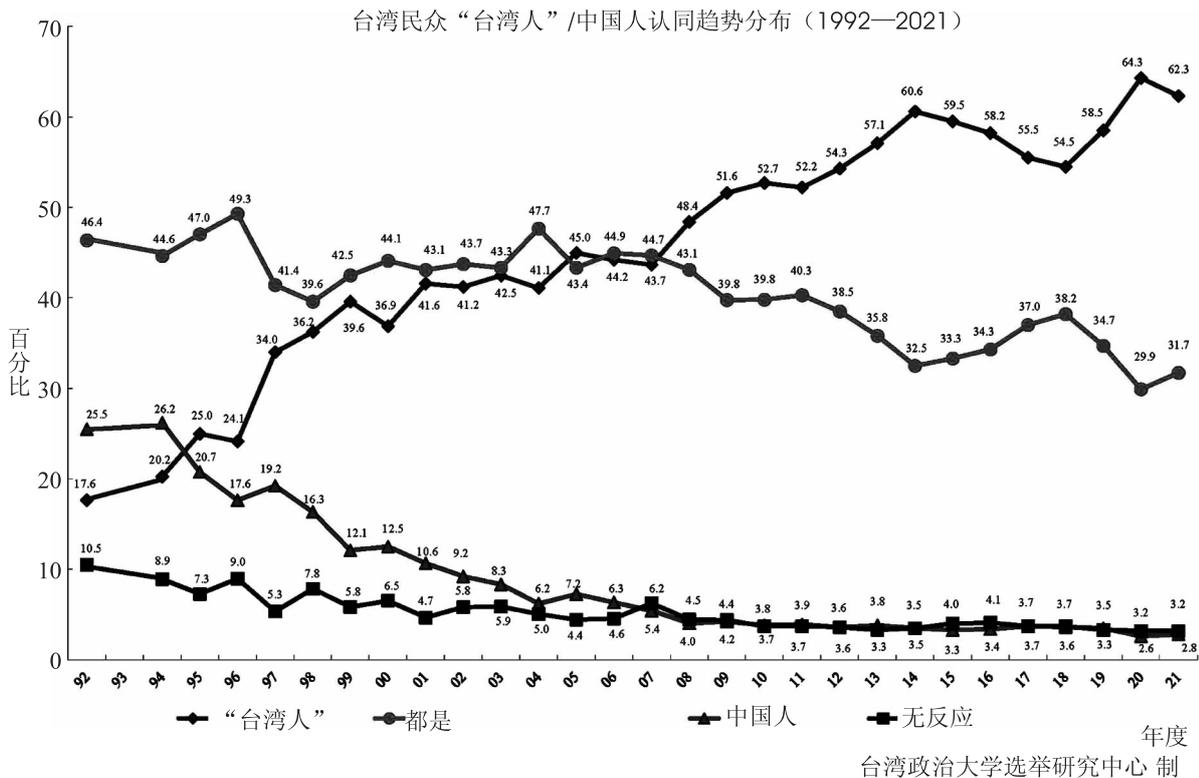


图1 台湾民众“台湾人”/中国人认同分布（1992—2021）

台湾政治大学选举研究中心：台湾民众“台湾人”/中国人认同分布（1992~2021），2022年3月12日。

此外，对本身已经工作生活在大陆的台胞来说，他们中很多人已经把大陆当成第二故乡，特

别是已经在大陆定居长期生活的台胞，会把自己当成当地人，这个相对于表3抽样调查结果，中国人认同是更高的。不容忽视的是，也有一部分台胞即使来到大陆工作生活，内心仍坚持“台湾主体”立场。一部分“两岸族”台胞把大陆当成西进创业探险地，认为自己是务实的“台湾人”在大陆市场从事经济活动而已，带有浓厚的“台湾人”政治倾向。还有一些台胞由于在大陆发展受到较大挫折，他们的“台湾人”意识也很强。原本“台湾人”是一种地域认同，就像大陆个人对自己“省份”的家乡认同一样，与“中国人”的国民身份认同并不相斥，然而，经过民进党等台独势力的恶意操控，变成了政治色彩浓厚的对立观念。

（二）国家疆域意义上的“中国认同”有所提升

在对于“九二共识”的认识上，受访者大致有四个观点：第一种认为台湾是中国的领土，大陆是中国的主要代表。根据对访谈者的调查，选择来到大陆的台胞对国家的认同感明显高于其他岛内台胞，其中，中老年“两岸族”台胞表现尤为明显。受访者表示，相对于来大陆前，由于受身边大陆朋友、大陆惠台政策、大陆的新闻和电视媒体节目的影响，他们对中国的国家认同有了一定的提升，觉得中国强大会自豪感。“台湾就是中国的一部分，我们从小接受的教育就是这样，我们这个年纪的人当然支持国家统一。当然，我们也有部分人会支持民进党，但是这是政治选票选民进党，不代表我们不认同国家的领土主权。我来大陆走过很多城市，我觉得大陆现在非常强大，不会被其他国家欺负，把一个国家建设成现在这样，很了不起。”（受访者A6）。第二种，认为台湾和大陆同属一个中国，但试图以“联邦”形式看待大陆和台湾之间的关系。而这种观点在受访者中占比较大。“其实我觉得大陆和台胞每天吵来吵去，强调领土问题，其实一个可行的方案是效仿英国联邦，他们下面的都认女王为国家元首，台湾这么多年了，与大陆在政治上区别很大，我觉得能不能以这种方式界定国土概念。”第三种，认为台湾是战败的“中华民国”，与大陆属于不同的国家。第四种，认为台湾从历史上看，长期脱离大陆中央政权之外，也应该效仿新加坡自由独立建国，台湾地区现在控制的区域就是“国土”范围，这是明显的“台独”立场。当然，也有一些台胞表示，他们的国家认同并没有很大变化，主要一是他们不太关注大陆的新闻，二是他们的台湾朋友的观点对他们影响较大。

（三）中华文化认同仍占主体，但“台湾文化认同”影响渐深

大部分的受访者依然认为中华传统文化在台湾仍然是主流，不管是文字、语言、风俗还是社会交往等等，中华传统文化还是占主流地位。“你看，我们的各种过节风俗和闽南人明显都一样，我们的文字还是繁体字，我们受中华传统文化的影响还是很深的，这是骨子里的东西，就算阿扁上台以后的年轻人，他搞台独搞这个那个，他家里风俗习惯、为人处世都是中华传统那一套（受访者A7）”，“来大陆和去日本，区别就很大，能明显感觉到，台湾和大陆无论是语言、环境、风俗都是相似的（受访者A3）”。值得注意的是，受访者提到，在台独分子中，有些人认为自己确实是大中华传统文化圈的一分子，但是和“中国大陆”当代文化是有很大区别的。换言之，他们认同中华文化却将中华文化与“中国”文化区别开来。“我从小在台湾长大，在美国念的大学，整体感觉文化上和大陆同事还是有区别的。”受访者谈到，一些台胞已经接受台独分子构建的“中华传统文化”与“闽南文化”相交融的新的“台湾文化”，他们更愿意认为自己认同的是“台湾文化”。此外，对于台湾近年来存在的“亲欧美”“亲日本”等外来文化，受访者认为其并不是主流，他们只在小部分群体中流行，更多的是一种“新闻时尚”，而不是主流文化分支，他们更认同的是日本和欧美现代文明，而不是文化传承。

（四）制度认同偏见明显

对于“一国两制”方案，访谈中，有很多人知道“一国两制”方案，但是有的台胞认为，台

湾与香港情况不一样，香港在回归之前受殖民统治，是英国政府管辖。而台湾从李登辉开始实行“总统”全民选举以来，目前已经进行了数次大选，台湾的“政权”已经基本形成，所以对“一国两制”方案普遍存在担忧。而对“一国两制”方案支持的受访者主要是觉得中国各方面的发展和优异表现已经证明了大陆政治体制没有问题，他们觉得如果制定各方认同且优秀的“一国两制”方案，他们可能会接受这种方案。

在统独立场方面，从表4可以看到，根据2021年调查结果，岛内民众主张维持现状的有52.4%，而“两岸族”台胞受访者中大部分认为应该长期维持现状。“从我在大陆生活的感受，我觉得迟早会统一，基本上大陆所有人都认为台湾是中国的领土，而且能感受到这些年大陆在为实现统一所做的准备。但是现在条件还不成熟，比如说近年来香港问题出来以后，很多岛内的朋友认为统一后也会出现这些问题，要看香港发展的形势。还有大陆和台湾在各种制度上确实还存在很大的不同，比如说选举、法律、医疗、教育等等，统一后会不会改变，这也是很多人担忧的地方。”（受访者：A2）受访者中，持“独立”倾向的受访者表示，“中华民国已经失去大陆主体地位了，台湾已经是一个跟大陆不一样的‘主权独立’的‘国家’，而且目前台湾发展的也很不错，我觉得台湾就做一个亚洲的中立小国，不知道统一有什么好处。”

台湾民众统独立场趋势分布（1994—20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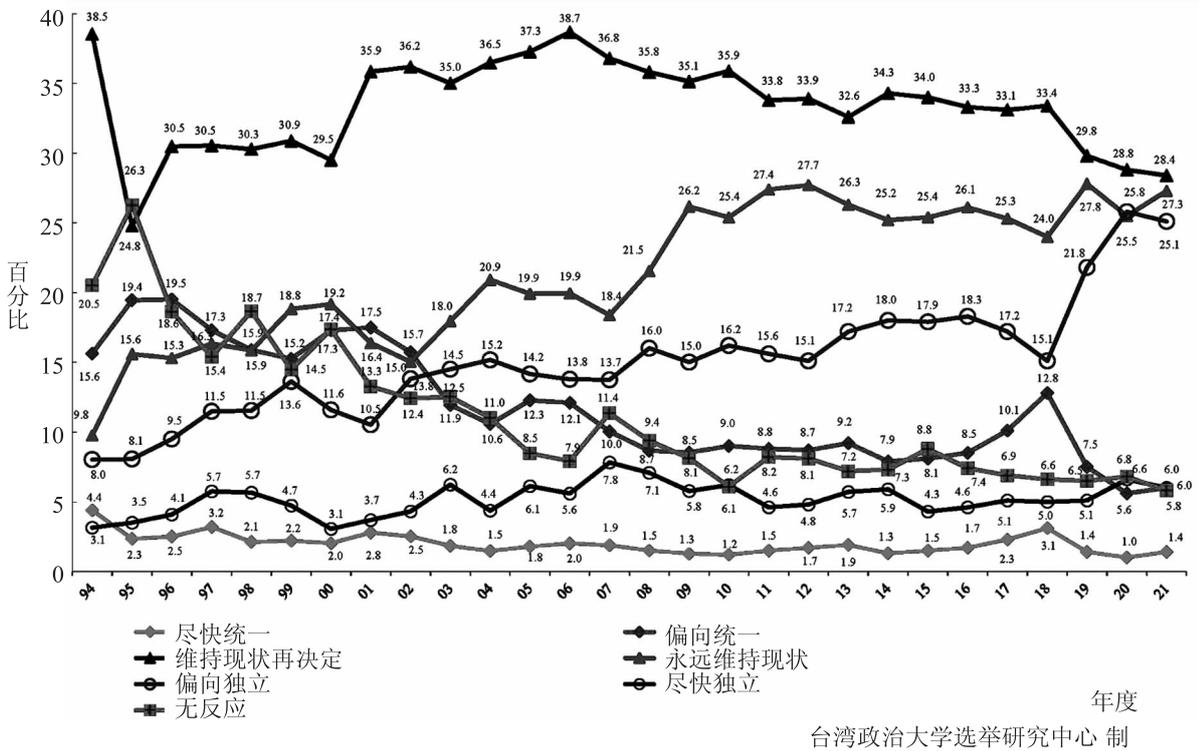


图2 台湾民众统独立场抽样调查结果（1994—2021）

台湾政治大学选举研究中心：台湾民众统独立场抽样调查结果（1994—2021），2022年3月12日。

四、影响“两岸族”台胞国家认同的外在机制分析

当前，部分台湾民众的国家认同处于“台湾认同”与“中国认同”的双重认同困境中，个体的国家认同既受经济、学历、年龄、性别等内在因素的影响，同时也受家族、社会关系、历史、媒介等外在因素的影响。本文的重点在于外在因素如何影响个体的国家认同。

（一）大陆对台政策体系的积极影响

“两岸族”台胞一年中在大陆工作时间较长，对他们影响最直接最明显的就是大陆对台政策体系，而这个体系目前大部分是“惠台政策”，惠台政策从经济、社会等各个方面对“两岸族”台胞产生了较大影响。地方政府惠台政策的“助力”程度高对台商的国家认同有明显正向影响。“其实最近两年，我们也看到大陆的网友讲不要给台湾送钱，反正送了也是赚钱给‘台独’。那我自己并不是台商，我只是想说说我做生意的台湾朋友他们的看法。我父亲的朋友他是来投资的（台商），觉得来大陆投资本身也是市场行为，大陆市场通路多，人多，确实是优势，但是他觉得来投资对当地经济有很大的帮助，还给很多人工作。如果是做亏钱只是赚大陆一点政策补贴，这种生意他们是不做的。他们赚到钱的也确实对大陆会有更多好感，也希望两岸不要打仗。但是你说对台商来讲，这完全是大陆惠台送钱，他们也是不认可的。还有一类，你像我自己一个人白手起家在做台湾餐饮，我就觉得大陆人充满朝气，消费火爆，去年还申请了公租房，我觉得大陆很有希望。如果早点统一，大陆飞台北就方便了。”（受访者 A5）经济利益的联结关系确实能增进台商对大陆的好感，从采访中来看，大陆惠台政策受益越大、联系越紧密的群体显然对中国的认同明显高很多，而那些只是觉得两岸是“交换资源”关系的台商群体，对于大陆的依赖和归属感相对低一些。

反之，由政策因素导致的经济利益的减少，对“两岸族”台胞的国家认同有明显负面影响。“我2014年来大陆经营小商品、水果贸易和台湾个人游，自从大陆禁止台湾凤梨进入大陆市场以后，我的销售额整整下降了60%，因为凤梨是我们占比非常大的一个类别。个人游业务也停摆了。然后又遇到疫情，文旅零售受很大影响。今年准备回台湾，没办法，这次回来处理轿车、店面资产……现在心情真的很差……你说的国家认同，说实话，我感觉现在不是很认可，以后再看吧。大陆台湾的关系恶化，我们这些小商人是无辜的。”（受访者 A8）可见，由于相关政策调整，导致部分台商经济利益受损，将直接影响他们对国家的认同。这一方面说明了部分台商对国家认同有实用主义倾向，另一方面也反映我们在相关政策制定方面还有优化空间，在帮助台商应对政策变动方面还缺少比较有力的措施。

（二）历史创伤记忆的淡却

创伤记忆会刺伤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影响国民对我们是谁、来自何处、去往哪里等根本性问题的探寻，是国家认同建构中既不能回避又需要谨慎对待的问题。^①

1. 殖民历史伤痕的淡化。有学者认为，正是由于台湾经历的荷兰殖民、郑氏统治、清政府收复台湾后又割让、国民党威权统治等历史，对台胞造成了难以修复的历史性伤害，台湾的这种历史悲情和台湾情结，滋生了台湾民众急于早日“出头天”的心情和要求。^②日本侵略者通过“皇民教育”削弱了台胞的中华民族意识，对台湾几代人的国家认同产生了负面性影响。一些台湾学者认为这些历史是“台独”意识产生的根源。事实上，受访者在谈到殖民地历史时，表示：“我比较了解这些历史，但我不认为这些历史对我的国家观念产生了影响，对我来说，这些历史太遥远了”。毋庸置疑，日本侵略者和清政府的软弱无能削弱了台胞的国家认同，但同时，对照近现代史，我们可以看到，同时期朝鲜半岛也被日本占据了36年之久，也同样推行了“皇民教育”，然

^① 吴玉军、顾豪迈：《国家认同建构中的历史记忆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8年第3期，第69—76页。

^② 何启林：《台湾同胞的国家认同问题思考》，《广西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5年第1期，第25—29页。

而,当前韩民族意识和国家认同的程度都较高。^①一方面,我们不能否认历史记忆对台胞国家认同的负面影响,但从上述历史对比角度来看,夸大台湾被日本占据时期“皇民教育”的作用,很容易陷入部分“台独”分子所谓历史伤痕论和日本有功论的圈套。

2. 国民党统治历史的影响。台湾学界公认1947年2月28日,台湾爆发的二二八事件对台湾产生了深远影响。客观地看,这次事件与大陆当时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一样都是中国人民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一部分,从国家角度看,这次事件也是中国的国家内部矛盾,其本质上并不是“台独起义”。从中国近现代史来看,在中国大陆,国民党也都实行了长期的白色恐怖,而抗战期间,全国大部分人民都积极抗战,保卫国家,因此,不能说实行白色恐怖必然导致台胞对国家认同的丧失。所以,对国民党在接管台湾后的反动统治,并不是台胞丧失国家认同的主要原因,更不是“台独”分子谋求“台独”的理由。

事实上根据台湾近现代史,清政府在台湾设立行省后、中华民国接管台湾初始时,台胞的国家认同感和民族意识还是比较强的。^②正如受访者谈到,其父辈们都认为在国民党统治台湾期间,蒋介石在台湾推行国语普及和中华传统文化,同时大量外省人被移居台湾,当时在台湾,一个中国和中国国家认同是大部分人的共识。随着联合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代表是中国在联合国组织的唯一合法代表,把蒋介石的代表从联合国驱逐出去之后,部分台湾人对国家的认识开始发生变化,但台胞的国家认同依然处于较高比例,例如认同自己既是“台湾人”又是中国人的台胞比例在1992年时为71.9%,占绝对优势比例,而只认为自己是“台湾人”的比例只有17.6%。

因此,该如何理解近年来部分台胞国家认同的快速下降和“台独”意识逐渐增强?首先,“日据皇民教育同化论”和“外来政权伤害论”等所描述的原因,并不是造成台胞国家认同感逐渐缺失的主要原因,当前的台湾主体人群,大部分人其实并没有受到这些历史大事件影响,他们主要是台湾解禁后成长起来的群体。随着青年人口的增加以及教育程度的提高,社会上“族群”与“省籍”对立的意识早已淡化,年轻人对于陈年的历史事件,例如“国共内战”、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戒严、美丽岛事件等渐渐无感。因此利用这些事件所形成的统独意识形态,逐渐不再受到人民的关注。

(三) 族群矛盾从“本土地域意识”上升到“台湾主体意识”

“台独”意识的崛起,根源在于台湾意识的发展,而这些的根源就来源于台湾存在并人为制造的“族群矛盾”。二十世纪70年代以前,真正意义上有较大区别的族群其实是台湾少数民族和汉族,汉族人口占比90%以上,族群矛盾虽然有但是很小。现在台湾人常称台湾有“四大族群”,即“原住民、福佬人(闽南人)、客家人和外省人”,然而,这“四个族群”又按照来台时间1949年为界限分为两类,1949年前已经在台湾的“原住民”、福佬人(闽南人)和客家人被统称为“本省人”,1949年以后去台的被称为“外省人”。在访谈的过程中,我们能很明显地感觉到“本省人”给外省籍台胞带来的心理压力。

“像我爷爷这辈是外省来的,我爸说以前小时候念书,虽然外省人和其他人也会有矛盾,但是大家相处也还算可以,外省人工作、收入都还蛮不错的,社会地位也高。但是我读书的时候就一样了,我们外省人比例比较小,记得阿扁执政那几年,有一些福佬人就经常说我们是外来的,来抢夺台湾资源,让我们滚回大陆。我们从小在台湾长大,本身对大陆祖籍确实没有很深的印象感情,有些时候也尽量不提自己的外省祖籍。我们要说爱台湾,如果你不这么做,其他人就会骂

① 曹娅:《国家认同影响因素比较分析》,硕士学位论文,厦门:厦门大学,2014年,第23页。

② 刘丽:《台湾社会的“中国国家认同”》,硕士学位论文,上海:上海交通大学,2013年,第16页。

你吃台湾的东西还卖台湾，现在整个台湾社会氛围是这样了。其实，类似台湾的外省人与本省人的问题，我觉得不只是台湾存在，在大陆一样的存在，你看有些上海人会骂外地人，但是他们只是本地人和外地人的区别。你在台湾不一样，你在上海被排外，你还可以回老家，但是都是中国。在台湾，你能去哪呢？所以现在很多台湾年轻人把这个地域矛盾上升到了台湾与中国像不同国家的矛盾一样。像我们这种两岸跑的年轻人，现在都不敢在台湾年轻人说太多大陆好，他们听到这些就说那你别回台湾了。”

“本省人”和“外省人”本是一个地域矛盾问题，然而，由于台湾普选后，“本省人”人口占80%以上，必然带来巨大的选票优势，“本省人”政治、文化、经济利益都得到相应提升，本省人意识逐渐从“本土地域意识”上升到“台湾主体意识”，如果不认同“台湾主体”和“台湾优先”，作为一个“社会人”，都将面临巨大的社会心理压力。无论是理性选择还是感性选择，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人认同”者就可能放弃自己的初始认同，转向“台湾人认同”，进而免受这种社会心理压力。

（四）“新台湾”文化教育体系的政治操控

事实上，近年来以“台独”分子为核心的民进党对历史、文化、语言的再造和操控是台胞国家认同感逐渐缺失的重要原因。

一方面，中国传统文化的剥离是台胞国家认同感降低的重要原因。然而，随着“台独”分子李登辉及陈水扁上台以后，极力推行“去中国化”的教育政策，依照“同心圆”理论修改中小学课纲，将“台湾史”从“中国史”中割离出来，推行注音体系，培育“台湾认同”，试图消除“中国认同”。就像受访者说的，“我读国中（高中）那时候，台湾的历史教科书分为台湾史、中国史和世界史，台湾史是高一的科目，其中大部分都是谈二战以后的台湾历史，反正很多骂蒋的。国史中，相对于你之前和我聊的清朝对台湾的历史，还是有所不同的，你们说清朝设置台湾省，促进台湾发展，这边历史会讲清朝除了赶走郑成功后代，基本上没怎么管理台湾。你说的中华民族辉煌的历史，这边国史中印象中提到的不多。所以，你说我们怎么会对一个“腐败落后”的清王朝有好感呢？”（受访者 A2）显然，“台独”执政党通过构建以“台湾主体”的历史来提升“台湾认同”的主体意识，而通过隐藏甚至抹黑中央政府的国家史，来降低台胞的国家认同。

另一方面，“新台湾文化”的构建是台湾同胞国家认同感降低的重要原因。台湾整体的文化包括中华文化、本省外省文化及台湾少数民族文化，又融进了部分日本文化和西方文化。“你说看下孩子的课表，我孙子现在在读小学，我看了下他的书本，和我们以前比，就是倾向于鼓励小学生学闽南语，他们说老师都叫‘台语’。现在民进党都是打着保护少数民族语言的口号，推广他们福佬那一套文化。我们中小学的时候，老蒋都是推国语、中国文化，所以我们比香港人更懂中国文化。”“台独”执政党通过历史教科书、语言等途径，不断加深受教育主体的“台湾文化意识”。这种操控的主要对象主要覆盖青少年群体，从小学“语言学习”基础学习到中学“历史文化”加深学习，再到大学“新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的建构，“台独”执政党控制了整个教育圈的话语权，由此培育年轻人形成顽固的“台湾主体意识”。

五、对台胞国家认同重构路径的思考和建议

（一）着重发挥“两岸族”台胞的桥梁和纽带作用

据统计，2015年至2019年，台湾地区居民来大陆累计达2937万人次，平均每天在大陆旅游、工作、学习、生活的台湾地区居民接近35万人，现有近万名台生来大陆读书。“两岸族”是两岸融合发展的主要群体，也是引领台湾同胞民族认同的新生力量，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新动力所

在。“两岸族”台胞是在台湾与大陆之间往来密切的台胞群体，这部分台胞与大陆交流频繁，彼此了解，相对来说对大陆的好感度更高，连民进党执政时期的台湾海基会也不得不承认，到过和没到过祖国大陆，是否有家人在大陆，对大陆的认同与好感是不一样的。更重要的是他们既有台湾社会关系网，又有大陆熟人朋友，是两岸间天然的交流纽带。当前，在台湾当局对两岸交流交往存在高度警惕并设置诸多限制的现实情况下，大陆地区的企业和民众来往于台湾地区十分不便，而台湾地区的企业和民众来往于大陆却较为方便。两岸经济共同体日益形成，台湾对大陆依存度高居不下，以同等待遇为理念的台胞公共服务体系正在建立，可以说“两岸族”台胞国家认同重构的现实条件已经基本形成。因此，要把“两岸族”台胞作为培育国家认同的重要群体。

（二）继续深化细化两岸经济社会融合发展体系

“经济激励系统是指经济发展绩效关系国家公共生活与民众基础生活幸福程度，由此调动民众对国家认同的程度。”^①当前对台工作的重点是继续强化两岸经济融合，推动两岸在经济合作制度化、产业转型升级、企业互利共生，两岸要应通尽通，提升经贸合作畅通、基础设施联通、能源资源互通、行业标准共通，使之进一步融入大陆经济，打造两岸共同市场，并与大陆共同参与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最终形成中华民族经济共同体。

吉登斯说：“个体行动者对对象世界连续性和社会活动构造抱有信任感。这种信任感的基础，在于这些行动者与他们的日常生活过程里进行活动的社会情境之间，存在着某些可以明确指出的关联。”^②而促进两岸社会融合，主要是要让台湾同胞与大陆居民共同居住、共用生活、共同享受各类公共生活服务，从而强化台胞与大陆同胞的“社会共同体意识”。两岸经济融合是基础，两岸社会融合是更高层次的要求与表现，当前，二者发展已进入一个相互促进、互为表里的重要阶段。促进两岸经济社会融合发展不是简单的经济融合与社会融合相加，而是以经济融合带动社会融合，以社会融合促进经济融合，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要更紧密结合。

（三）加强对台宣传理论和话语权体系建设

一要加强话语权掌控。近年来，“台独”分子为自己的“台独主张”和“台独文化”构建了所谓的理论逻辑体系，利用网络水军等群体，操控舆论，在台湾拥有了一定的市场，为“台独意识”的蔓延提供了理论武器。相反，一些坚持“中华文化”，坚持一个中国的台湾同胞在驳斥“台独”言论上经常吃亏，关键原因就是没有掌控舆论话语权和理论武器。因此，要对“台独”势力的歪理邪说进行拨乱反正，针对两岸同胞关注关心的热门话题，不能自说自话，要在海外平台建设好、用好相关舆论阵地，逐步掌控对台胞的宣传话语权。要组建相关专家团队，跳出台湾学者对台历史的研究视角，防止陷入“台湾特殊论”和“台湾悲剧论”等“台独”论调陷阱，重新梳理台湾发展历史，构建严密的“反台独”理论体系，为反“台独”提供理论武器。

二要加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理论阐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一国两制”的提出，本来就是为照顾台湾现实情况，维护台湾同胞利益福祉。“一国两制”在台湾的具体实现形式会充分考虑台湾现实情况，会充分吸收两岸各界意见和建议，会充分照顾到台湾同胞利益和感情。^③要加快对习近平总书记“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理念的进一步解释，从历

① 金太军、姚虎：《国家认同：全球化视野下的结构性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6期，第4—23页。

② [英] 安东尼·吉登斯：《社会的构成——结构化理论大纲》，李康、李猛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第183页。

③ 习近平：《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而共同奋斗——在〈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台声》2019年第1期，第6—9页。

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上讲清楚“一国两制”台港澳不同方案的相同和区别。加深台胞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了解。一些台胞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往往站在西方政治立场和西方逻辑上理解，对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缺少了解。要通过展览、实地考察，引导台胞加强对中国共产党百年成果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重大成就的了解。

（四）突出以“家国情怀”为重点的历史文化建设

一是地方文化与中华民族文化的重建。历史表明，处于分裂状态的国家走向统一首先需要民族的认同，而民族的认同则离不开文化的认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两岸同胞的最大公约数。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植根在两岸同胞内心深处，是两岸同胞的‘根’和‘魂’。”^①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共同的精神财富，也是两岸同胞血脉相连的精神纽带。因此，两岸同胞要大力加强文化交流，发挥各自优势，不仅要共同弘扬中华文化优秀传统文化，更要积极阐发中华文化的时代内涵，建设好共同精神家园，从而促进心灵契合。要加强对国家疆域观的认识。进一步梳理“地域”与“国家疆域”的联系与区别，进一步弄清“闽南文化”与“中华民族文化”的联系与区别。历史上形成的福建、粤东与台湾在共同的地缘、血缘、文缘、商缘和法缘基础上的共同文化——闽南文化，是两岸文化共同体的重要内容。闽南文化在建构两岸文化共同体，促进“心灵契合”方面有特殊的地位和优势，应充分发挥闽南文化在推进两岸文化融合中的重要作用。

二是重构台胞教育历史观。近年来，岛内“台独”势力置数千年来中华民族共同开发台湾的历史以及台湾与祖国大陆之间的地缘、血缘、文化关系于不顾，大肆篡改历史观与文化观，并利用修改教科书等手段企图将“台湾文化”与“中华文化”对立起来。历史观强调每位中国公民应了解中华民族历史，尊重历史发展规律，继而承担起历史使命。考虑到海峡两岸人民的现实情况，要选择那些能够在两岸民众中引起广泛影响的文化交流项目，特别是要突出那些带有全局性影响的、两岸都在传承与延续的历史文化事件，通过重构两岸共同的历史记忆，引导两岸人民认识两岸本同根同缘，在中华民族这个统一的大家庭之中没有什么化解不了的难题。

责任编辑：杨松禄

^① 陈键兴：《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洪秀柱》，《台声》2016年第21期，第12—13页。

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创建理路与实践的云南探索

张志远

(中共西双版纳州委党校统战理论教研室, 云南 西双版纳 666100)

摘要: 云南是全国世居少数民族最多、特有民族最多、跨境民族最多、民族自治地方最多的边疆省份,也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缩影,做好民族工作事关全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大局。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两次考察云南均对云南提出建设我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的指示要求,不仅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的民族情、边疆情和云南情,而且也对云南“十四五”时期目标和2035远景目标的民族工作发展指明了方向。笔者认为,云南创建我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谆谆嘱托和准确把握“高举民族大团结的旗帜”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新时代民族工作的灵魂与主线,通过对民族大团结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形成及二者内在逻辑的梳理,探讨云南创建我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的有效路径,为云南实现民族工作“十四五”时期目标和2035年远景目标提供智力支撑。

关键词: 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 理论逻辑; 实践探索; 云南

中图分类号: D63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2811(2022)02-0072-07

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程中,党的几代领导人都十分重视民族工作并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开创了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各民族不仅实现了“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加快了民族地区和各族群众融入现代化进程,告别困扰千年绝对贫困,建成小康社会,而且开启了各民族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作出了一系列关于民族工作重要论述,如“民族团结是各族人民的生命线”“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等。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5月中央第二次新疆工作座谈会鲜明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高举各民族大团结旗帜,牢固树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重大论断,在2014年9月召开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进一步明确强调“中华民族和各民族是大家庭和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坚持打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思想基础”等重要论述。2015年9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见基层民族团结优秀代表时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各民族大家的梦,也是我们各民族自己的梦。中国共产党就是团结和带领各族人民向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向着人民更加美好的生活。民族团结就是各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乡村振兴战略与中缅边境地区乡村治理研究”(18XMZ057);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统一战线高端智库重大课题“新时代边疆治理视阈下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研究”(ZK20170426)。

作者简介: 张志远, 中共西双版纳州委党校、西双版纳州社会主义学院统战理论教研室教授, 云南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西双版纳)主任、研究员, 法学(社会学)博士, 研究方向主要为党的民族理论与政策, 民族社会学。

族人民的生命线。”2017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九大正式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写入党章，2018年3月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首次写入宪法。2019年9月召开的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的大会开创性提出“四个共同”的中华民族历史观。2020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特别强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大意义。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三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再次强调，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不断巩固各民族大团结。2021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指出，“必须高举中华民族大团结旗帜，促进各民族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做好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要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纲’，所有工作要向他聚焦”。^①可见，“高举各民族大团结旗帜，牢固树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已经成为习近平总书记民族工作重要论述的灵魂与主线。这些重要论述，不仅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时代内涵，而且为新时代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

一、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灵魂与主线的学理阐释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两次考察云南均对云南提出建设我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的指示要求，把云南建成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是习近平总书记交给云南的重大政治任务。云南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创建应牢牢把握新时代民族工作的灵魂与主线，立足省情特征特点和云南民族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在“十四五”时期奋力打造我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云南样本”。

长期以来，各民族在共同利益、共同命运、共同目标、共同需求、共同参与的基础上，共同开拓了辽阔的疆域、共同书写了悠久的历史、共同创造了灿烂的文化、共同培育了伟大的精神^②。当前，我国正处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大调整、大发展、大变革是其显著特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成为推进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中国各民族在不断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进程中，在历史、心理、社会、制度、政治、文化等层面取得一致性或共识性的集体身份认同^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核心是认同，即对伟大祖国的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和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仅是党的民族理论与政策创新发展的集中体现，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内在要求，而且也是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论自觉和根本前提，是中华民族成员和中国公民民族身份的集中概括。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来源是中国传统的天下观、西方民族主义思想和马克思民族理论。其一，中国传统的天下观。《诗经·小雅·北山》指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孟子曰：“天下定于一。”（《孟子·梁惠王章句上》）西汉董仲舒吸收“兵、法、道”等流派思想将儒学思想正统化，主张“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提出大一统思想并付诸于制度大一统、学术大一统、宗教大一统。民族是西方外来词，“民族，nation”清末传入国内，梁启超首次提出

^① 《习近平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强调 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 推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人民日报》2021年8月29日，第1版。

^② 余梓东：《充分认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多维共同性》，《中国民族报》2020年12月29日，第5版。

^③ 哈正利、杨胜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基本内涵探析》，《中国民族报》2017年2月24日，第5版。

“中华民族”，指中国土地上各民族的总称。孙中山、蒋介石沿用“中华民族”，其涵盖的对象及范围存在差异。费孝通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过程，它的主流是由许许多多分散孤立存在的民族单位，经过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同时也有分裂和消亡，形成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①其二，西方民族主义思想。康德在其伦理学理论中明确将个人的“自治”置于核心地位，认为个人权力是不受人约束的、永恒的^②。凯特里民族理论主要为：民族依一定的特征划分的，民族自决是政府合法性的依据^③。滕尼斯认为：“共同体（gemeinschaft）是持久的和真正的共同生活，社会只不过是暂时的和表面的共同生活。”^④其三，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和奠定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认为，每一个民族都为人类的文明作出了自己的贡献。民族只有大小、先进和落后之分，没有优劣高低之别。可以说，民族平等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核心，也为民族团结提供了重要前提。列宁和斯大林继而建立了完整的理论体系。中国共产党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讲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一体包含多元，多元组成一体，一体离不开多元，多元也离不开一体，一体是主线和方向，多元是要素和动力，两者辩证统一。”^⑤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各民族基于经济共同体、政治共同体、文化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形成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离不开我，我离不开你”的心理情感认同。

党的十八大以来，“高举各民族大团结旗帜，牢固树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成为新时代民族工作的灵魂与主线。民族团结不仅关系到各族群众幸福安康的根本利益，而且关系到国家的长治久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巩固国家统一、维护领土完整的思想基础，是促进我国56个民族实现民族大团结的必要条件，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边疆地区民族团结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两者之间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关系。习近平总书记还指出：“做好民族工作，最关键的是搞好民族团结，最管用的是争取人心。”^⑥通过“争取人心”“交心”“比心”和“换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民族团结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基本前提，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民族团结的精神之魂。边疆地区各民族只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各民族大团结、大联合，才能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二、高举各民族大团结旗帜是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创建的灵魂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强中华民族大团结，长远和根本的是增强文化认同，建设各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⑦高举民族大团结的伟大旗帜成为新时代民族工作灵魂与主线的核心。加强民族团结进步阵地建设，加快通用语言文字教育，建立各民族“互嵌”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开展富有特色的群众性交流活动，实现中华民族大团结，巩固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新型民族关系应

① 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页。

② Philip spencer NT vnsd, Howard Wollman, Nationalism -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2002, p. 6.

③ [英] 埃里·凯特里：《民族主义》，张明明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第1页。

④ [德] 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纯粹社会学的基本概念》，林远荣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45页。

⑤ 《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暨国务院第六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在北京举行》，《人民日报》2014年9月30日，第1版。

⑥ 《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暨国务院第六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在北京举行》。

⑦ 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学习辅导读本》，北京：民族出版社，2015年，第27页。

夯实筑牢中华民族大团结的理论基础、物质基础、制度基础和社会基础。

（一）筑牢新时代民族团结的思想基础是引领方向

在2014年的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民族团结是各族人民的生命线……各民族要相互了解、相互尊重、相互包容、相互欣赏、相互学习、相互帮助，像石榴籽那样紧紧抱在一起。”^① 这些论述为推进新时代民族大团结指明了方向。同时，习近平总书记对推进新时代民族大团结提出了要求。他先后在2017年党的十九大和2019年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强调，坚持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的“八个坚持”^②：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维护祖国统一、坚持各民族一律平等、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坚持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坚持打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思想基础、坚持依法治国。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族团结是各族人民的生命线”的论述和“八个坚持”夯实了新时代民族团结工作的思想基础。

（二）筑牢新时代民族团结的物质基础是前提

着力推进各民族共建共治共享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来自于人民，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必须始终与人民心心相印、与人民同甘共苦、与人民团结奋斗。每个共产党员都要弄明白，党除了人民利益之外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党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③ 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的成果由人民共享，发展的成果也将由人民来检验，着力解决各族群众的烦心事、操心事、揪心事，铸牢中华民族大团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利益共同体。

着力破解民族地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长期以来，边疆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处于后发展阶段。我们党先后实施了一系列扶持政策，民族地区基础设施、产业发展等大幅提升。然而，发展不平等、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民族之间发展差距仍然存在。因此亟待补足民族地区发展短板，实现区域之间、民族之间、民族内部的协调发展、一体化发展。

（三）筑牢新时代民族团结的制度基础是重要保障

不断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之一，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的重要内容。我国从制度来看，国家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自治区、自治州（县）也出台相应的自治条例，建成省级、地市级、县级、乡级地方自治机构。民族自治地方不仅享有一般政府政策权利，而且享有自治法赋予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权利。云南省先后通过《云南省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条例》及《〈条例〉实施细则》，为云南创建国家级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提供了制度保障。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全面依法治国就要以宪法等法律法规来处理民族内部和民族之间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民族地区要落实全面依法治国方略就要处理好促进民族经济发展与健全法治建设、保持民族个性与培养公民意识、弘扬民族法律文化与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宗教信仰自由与维护法律权威以及保障民族区域自治权与国家法制统一等五大关系^④。因此，应当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毫不动摇，正确全面贯彻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为实现民族大团结提供制度

^① 《习近平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强调 坚持依法治疆团结稳疆长期建疆 团结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新疆》，《人民日报》2014年5月30日，第1版。

^② 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学习辅导读本》，第27页。

^③ 习近平：《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求是》2019年第13期，第4—13页。

^④ 薛成有：《民族地区落实依法治国要处理好五大关系》，《青海民族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0年第2期，第56—59页。

保障。

(四) 筑牢新时代民族团结的社会基础是关键

创造各民族共居共学共事共乐的社会环境。共居共学共事共乐、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社会基础：一是各民族共居。新中国成立以来，各民族通过交往交流交融，呈现大杂居、小聚居，交错杂居的分布格局，涌现出诸如西双版纳州勐腊县瑶族乡回都村、大理洱源郑家庄“多民族一家亲”等典型范例。二是各民族共学。各少数民族在发展过程中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如天文历法、史诗、文学作品、音乐等，各民族之间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共同进步。三是各民族共事。不论是在内地，还是在边疆，不论是城市，还是农村，各民族共同生产生活，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四是各民族共乐。每逢节庆，各民族都相互邀请共享美食盛宴、参与文体活动，共话“各民族都是一家人”的情谊。大力宣传优秀民族干部先进事迹。深入发掘和提炼诸如召存信（傣族）、龚曲此里（藏族）、高德荣（独龙族）等各民族优秀干部和先进典型的思想内涵及时代价值，大力宣传好他们的先进事迹，对于筑牢民族团结的社会基础至关重要。

云南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创建要以新时代民族大团结、大联合为灵魂，不仅要筑牢思想基础、物质基础、制度基础、社会基础，思想基础是引领，物质基础是前提，制度基础是保障，社会基础是关键，四者形成有机整体，而且还要加强民族团结进步阵地建设，加快通用语言文字教育，建立各民族“互嵌”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开展富有特色的群众性交流活动，实现中华民族大团结。

三、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创建的主线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党的民族理论创新发展的集中体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内在要求，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论自觉和根本前提，也是中华民族成员和中国公民民族身份的集中概括。笔者认为，创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的核心要义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结合“民族”省情新特征，加大民族地区政策支持，加强民族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民族地区社会民生，少数民族优秀文化保护工程，建设现代化边境小康村建设，应当通过经济共同体、政治共同体、文化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四体合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一) 经济共同体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物质基础

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是新世纪民族工作主题。发展是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边疆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发展也是解决边疆民族地区问题的一把钥匙。2020年11月，云南宣布11个直过民族和人口较少民族历史性告别绝对贫困，实现整族脱贫。但各民族因历史、文化和现实等条件的差异，各民族之间、民族内部仍然存在发展差距。今后，推进民族地区和民族直过区高质量发展仍可延用“一个民族聚居区一个行动计划、一个集团帮扶”等攻坚模式，为其高质量发展提供不竭动力。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擘画了我国“十四五”时期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蓝图和2035年远景目标，不仅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而且也对民族自治地区高质量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云南应主动融入国家发展战略，增强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能力，构建国内大循环和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推进各类开发开放试验区等平台建设，加强与周边国家民间交往交流，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做好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机衔接，努力实现从“产业扶贫”到“产业振兴”，从“人才扶贫”到“人才振兴”，从“文化扶贫”到“文化振兴”，从“生态扶贫”到“生态振兴”，从“党建扶贫”到“组织振兴”。

（二）政治共同体是中华民族成员和中国公民国族身份的集中概括

我国各民族与全国同步实现现代化过程也是构筑政治共同体的过程。民族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是一个民族国家的各个地区、各个族体趋向整合和同一而形成国族统一性（national unity）的过程，是一个把异质的过去发展为同质的现在和未来的过程^①。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指出：“必须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推动各民族坚定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高度认同，不断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② 长期以来，各民族通过交往交流交融，形成一个结构相连、利益相关、情感相通的共同体社会形态。建立各民族相互嵌入式的社区环境，鼓励各民族相互通婚，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居住格局，建立多民族互嵌式社区，各民族实现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各族人民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日益增强。正如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政协副主席刀琼平（布朗族）曾指出：“世界上有哪一个政党、哪一个社会制度，能牵着落后民族跨越几种社会形态，与先进民族一道携手并进，共同分享现代文明成果？唯有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做到了。我为我的布朗族和各兄弟少数民族感到庆幸和祝福。”这不仅是党的光辉照边疆，边疆人民心向党的真实写照，而且也是各族群众感党恩、一心跟党走的豪迈情怀的生动体现。这“五个认同”体现了我们党对民族问题发展规律的认识的深化，为做深做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指明了方向，也必将成为凝聚全国各族人民力量、战胜未来前进道路上各种艰难险阻和风险挑战的思想保证。同时，还要讲好民族团结进步故事，铸牢政治共同体。民族工作要紧紧围绕“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主线和“民族团结是各族人民的生命线”，把各民族政治上共同当家做主、经济上相互依存共同发展、文化上相互学习、情感上亲近认同等列入党员干部学习培训和宣传思想工作重点。如可以深入总结提炼“宾弄赛嗨”民族团结互帮互助模式^③的经验和内涵，讲好新时代云南民族团结故事，让“三个离不开”“五个认同”等思想成为云南各族群众的共同体理念和思想特质。

（三）文化共同体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自觉和根本前提

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指出：“必须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使各民族人心归聚、精神相依，形成人心凝聚、团结奋进的强大精神纽带。”^④ 民族文化是在特定生产生活发展中形成的特定的价值观的总称，主要表现为各民族的道德情感、社会心理、风俗习惯、行为方式等，反映了各民族的处世原则、人生理想以及对社会的认知模式等。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准备和前提条件。应当大力弘扬各民族的珍贵文化遗产，如崇尚自然、勤劳俭朴、信守承诺、重情重理等；经常性开展各民族大团结歌曲及舞蹈展演，共唱民族团结歌，共跳民族团结舞，实现社会主义民族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等“多民族和谐相处”“民族一家亲”的有益经验并推而广之。在传承各民族优秀文化中增强文化认同，建设各民族共有的精神

① 宁骚：《民族与国家：民族政策与民族关系的国际比较》，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243页。

② 《习近平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强调 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 推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

③ “宾弄赛嗨”民族团结互帮互助模式，发源地为普洱市孟连傣族拉祜族佤族自治县景信乡。“宾弄赛嗨”是傣语音译，“宾弄”意为亲戚，“赛嗨”意为朋友，意指傣族群众在日常生产生活中与其他民族交往而结成的没有血缘但像亲戚一样的朋友关系，将原来的“人帮人，户帮户，民族帮民族”模式升华成“县际互帮、东西互助、城乡互联、干群互系、村组互包”的新型“宾弄赛嗨”模式，后被改编成展现民族团结促脱贫攻坚歌舞剧，引起良好的社会反响。

④ 《习近平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强调 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 推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光明日报》2021年8月29日，第1版。

家园,推动各族群众在文化上互相欣赏、互相学习,增强亲近感和认同感。坚持少数民族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两手抓,实现各民族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四) 命运共同体是各族群众凝心聚力战胜风险挑战的保证

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指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要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①当前,国际形势处于大变革大发展大调整时期,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但国与国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面临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和治理赤字等问题。为了更好地发展,国家与国家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人与人之间已形成风雨同舟、生死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各民族命运共同体就是“各民族深刻认识到,中华民族是一个命运共同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各民族只有把自己的命运与中华民族的整体命运紧紧连接在一起,才有前途,才有希望”^②。进入新世纪以来,在民族地区发生一系列治安事件,给各族人民生产生活、生命财产和民族心理造成不利影响。在面对突如其来的2003年非典疫情、禽流感疫情、2008年汶川地震、2010年舟曲地震、非洲猪瘟疫情、新冠肺炎疫情和国际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全球化等国内外复杂多变的形势,还有宗教极端势力、民族分裂势力和暴恐势力,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紧紧连在一起。各民族在命运共同体下需要进一步加强交往交流交融,通过对话协商、共建共享、合作共赢、交流互鉴,共同铸牢边疆地区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意识。

四、结语

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指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维护各民族根本利益的必然要求,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是巩固平等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必然要求,是开创党的民族工作新局面的必然要求。”^③云南民族团结示范区创建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紧扣“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为总目标,打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思想基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经济共同体是物质基础,政治共同体提供组织保障,文化共同体提供精神动力,命运共同体是核心要义,四者形成有机整体。云南要建成我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要通过四个“共同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处理好“高举民族大团结的旗帜”“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二者之间关系,找准心理契合点、情感共鸣点、利益结合点等,突出人文化、大众化和实体化,实现各民族大团结、大联合,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不竭动力。

责任编辑:杨松禄

^① 《习近平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强调 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 推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光明日报》2021年8月29日,第1版。

^② 《习近平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强调 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 推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光明日报》2021年8月29日,第1版。

^③ 《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暨国务院第六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在北京举行》,《人民日报》2014年9月30日,第1版。

长征时期中共对云南民族工作的探索与实践

赵玉春, 赵善庆

(大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云南 大理 671000)

摘要: 长征时期, 中国共产党面临着严峻的革命斗争形势, 先后两次经过少数民族聚居的云南地区。为解决好民族问题, 中国共产党运用了多种多样的方式和方法开展民族工作, 赢得了少数民族群众的认可与拥护, 特别是在少数民族风俗习惯、上层统战工作、建立革命政权等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 为红军顺利经过云南地区提供了重要的保障。因此, 总结长征时期中国共产党在云南地区开展民族工作的实践经验及影响, 对新时代民族平等、团结进步建设, 构建和谐的民族关系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关键词: 长征; 民族政策; 民族工作

中图分类号: D63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2811(2022)02-0079-06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中国工农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失利, 为了保存有生力量, 被迫进行战略转移。1934年10月, 面对严峻的革命形势, 红军决定撤离中央革命根据地, 开始艰辛的长征之行。在整个长征过程中, 中央红军两次经过云南地区。第一次是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战略思想的指引下, 中央红军于1935年2月4日进入云南, 历时3个月, 先后经过威信、镇雄、巧家、宣威、沾益、曲靖、会泽、东川、武定等18个城市; 第二次是在贺龙的领导下, 红二六军团于1936年3月6日进入云南, 经过楚雄、牟定、大姚、盐丰、鹤庆、祥云、丽江等27个区县, 行军2个多月, 于5月12日跨越过大雪山, 离开云南地区。^①

经过云南期间, 红军不仅要面对国民党军队的沿途围追堵截, 还要根据云南地区的特殊环境与实际情况, 处理好与各民族群众的关系。红军一路上开展宣传工作, 解放劳苦群众, 并取得了云南各族群众的大力支持与拥戴, 使人民群众更加全面地理解和认同党的民族政策, 同时也使党的民族工作得到了有力推进, 使党的革命思想在云南少数民族地区和人民群众心中落地生根, 进一步扩大了革命影响。云南地区的各族群众把红军当作为劳苦群众打天下做好事的人民军队, 与红军并肩作战, 竭尽全力地向红军募捐, 积极主动地争当向导和船工、做翻译、递情报等, 为红军输送新生力量, 协助红军完成战略任务, 为红军长征的胜利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进一步促使云南少数民族革命运动向前发展。

基金项目: 云南省重点马克思主义学院建设项目, 大理大学校地合作项目“历史时期大理各民族交流交往交融的历史事实研究”。

作者简介: 赵玉春, 大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在读硕士, 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 赵善庆, 大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博士, 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社会经济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① 丁小珊、龚秀勇:《论长征时期红军在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的思想政治工作》,《毛泽东思想研究》2014年第4期,第115页。

一、中国共产党早期对云南民族工作进行的初步探索

云南是一个特殊的多民族地区，少数民族众多，具有独特的地域环境和文化习俗，各民族之间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不尽相同，这是红军在进入云南之后所面临的情况。此外，在红军进入云南前夕，云南当局对辖区内少数民族群众进行了误导性的宣传。云南当局以政令的形式在全省各县建立“民众防共会”与“剿赤宣传队”，对广大的人民群众进行反共宣传，以汉、彝、回、瑶、苗5种民族语言文字编写了反共宣传资料，诱导云南地区的少数民族在主观上认为中国共产党是站在人民群众的对立面的，这在一定时期内对党在少数民族群众心中的形象造成了负面影响。另外，从云南各民族之间的关系来看，历代的统治者所奉行的大民族主义以及同化政策，使得少数民族之间有着严重的民族隔阂，这极大地影响了各民族之间的关系，使得各民族之间不能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革命斗争的进程。因此，面临种种困难和挑战，当时党和红军必须结合少数民族实际情况制定民族政策，开展民族工作，为红军长征的胜利提供坚强的保障，进一步推动云南少数民族地区革命运动的蓬勃发展。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对民族事业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例如，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指导下，成立了中共云南地方党组织，积极组织并号召各少数民族群众参加武装斗争，为云南革命事业的发展播下革命的火种，在党中央开展民族工作，解决民族问题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1928年，中共云南地方临委依据少数民族地区的实际情况，制定了关于开展少数民族工作的纲领性文件《少数民族问题大纲》，并指出：“云南党部应该注意少数民族斗争的纲领，少数民族在农运中是一支有力的部队。”^①同时，强调应该尊重少数民族群众的权利，在坚持各民族平等的基础上，拉近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以提高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地位。在红军长征途径云南时期，红军以实际行动向广大人民群众宣传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思想与宗旨，并开展动员和组织工作，促使许多人民群众积极踊跃地参与革命斗争，壮大了红军队伍，不仅推动了少数民族地区革命运动的发展，也为中国共产党的民族理论与政策在云南的实施提供了先决条件。

二、红军长征过云南时期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的制定与实施

（一）积极宣传和实践党的民族政策

长征途中，党和红军不仅积极主动了解民族地区的基本状况，同时也在人民群众中开展宣传和教育工作。红军始终坚持执行“宣传队”的任务，不管在哪个地方停留，都会抓住机会接近群众，与劳苦群众打成一片，积极主动地在少数民族地区宣传和实施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使党的民族政策在实践中不断得到完善和发展。

在长征初期，结合少数民族地区的特殊性，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就将解决好民族问题作为民族工作顺利推进的前提条件。当时，红军总政治部发布了《关于争取少数民族的指示》，在指示中强调：“野战军今后的机动和战斗，都密切关联着争取少数民族的问题，这个问题之解决，对于实现我们的战略任务，有决定的意义，因之各军团政治部，必须立即把这个问题提到最重要的地位。”^②由于云南少数民族众多，红军与当地的少数民族在某些方面存在着语言障碍，给红军通过少数民族地区增加了难度，这就需要红军不断地创新宣传形式和手段，最大限度地解决所遇到的民族问题。在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红军每经过一个村寨，都会在当地用红土石灰书写大量的标语、散发布告和传单，甚至是通过座谈会的方式，将党的民族政策与主张在少数民族群众之中进行宣传。

^① 中共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在云南的少数民族工作》，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94年，第128页。

^② 中共中央统战部：《民族问题文献汇编》，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339页。

红军所运用的群众工作方法，既符合当时行军作战的实际，又得到了各民群众的认可。在行军途中，红军在沿途各地书写标语和散发传单，如“红军是工农自己的军队”“只有苏维埃才能救中国”“打倒卖国的南京政府”“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① 这些标语使用口号，既是红军启发教育群众、战胜敌人的重要手段，又消除了少数民族群众心中对红军的疑虑和戒心，使其充分认识和了解红军和中国共产党，积极主动地加入到红军队伍中来，充实和延续革命力量。正如毛泽东曾经所说：“长征是宣传队，是宣传书，是播种机。”^② 红军的队伍走到哪里，宣传工作就做到哪里，他们以多种形式向人民群众广泛传播中国共产党的宗旨和抗日救国的思想主张。如进入宾川后，红军在经过的村寨用石灰、红土在墙壁上书写醒目标语，张贴布告，散发各种颜色的传单，向广大人民群众演唱歌曲，鼓励人民群众发展生产，将革命的真理传播给广大劳苦群众，启发教育宾川人民，播下了革命火种，^③ 使宾川人民群众深刻地体会到只有中国工农红军才是亲民、爱民、为人民着想的人民军队。红军在开展宣传工作的过程中，用实际行动积极推进党的政策，向云南各族人民宣传革命精神，使党的政策、革命主张深入人心。

（二）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自由

尊重各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语言文字和宗教信仰，是红军长征中团结和争取少数民族的理解和支持、共同进行革命斗争的重要措施。^④ 当时，党中央强调，在经过少数民族较多的地方时，绝对不能干涉宗教与政治事务，要以民主的形式对民族宗教加以统一管理，严格遵守党规党纪。因此，在这一时期，党和红军始终把各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自由的尊重与保护作为顺利开展民族工作的重要保障。

一路上，红军严格遵守群众纪律，与少数民族群众和睦相处，建立了友好融洽的军民关系，在民族工作中十分重视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和生活习俗，使民族政策的运用符合当地宗教政策的贯彻与实施，有力地促进了民族之间的感情。红军经过中甸时期，结合实际情况，实施了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红军总指挥贺龙在给松赞林寺八大老僧的信件中说“红军允许人民宗教信仰自由，对喇嘛寺所有僧侣财产绝不加以侵犯，并负责保护”，并将一面写着“兴盛番族”的红布幛赠送给大寺。老僧们为此表示拥护红军，尽力协助筹办供养，并把大寺的红糖、粮食、盐等卖给红军，协助红军顺利通过藏区。^⑤ 红军的所作所为既保护了少数民族群众的根本利益，又赢得了藏区喇嘛的信任与爱戴。在行军途中，红军始终坚持将社会调查作为深入了解人民群众的基础工作，每到一处，都会先派人调查好当地的社会情况和传统民俗，并要求所有战士对其进行尊重和保护，真心实意地为少数民族谋利益。红军进入回族聚居的寻甸和官渡区时，作了“不进回民家”“不用回民锅灶”“不进清真寺”的规定。在寻甸，朱德总司令命令部队不得将猪肉带进清真寺的回民家。^⑥ 党和红军充分尊重回民的礼仪、饮食等风俗习惯，用实际行动表明自己的民族政策，切切实实地感动了当地群众，给回族同胞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进一步加深了少数民族群众与红军之间的感情。

（三）开展对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

在长征中，党中央始终将统战工作作为武装革命斗争的重要战略之一。为了凝聚和团结上层人士，与少数民族群众建立可靠联系，积蓄革命力量，中国共产党积极培养和吸收少数民族干部

① 中共大理州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大理地方史》，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7年，第76页。

②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1年，第150页。

③ 中共宾川县党委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宾川县历史（第1卷）》，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67页。

④ 周朋飞：《长征时期党的民族政策的现实启示》，《世纪桥》2017年第11期，第21页。

⑤ 中共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云南地方史》，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97—198页。

⑥ 中共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工农红军过云南史》，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87页。

加入红军队伍中,争取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的大力支持与帮助,进一步做好统战工作。

在红军途径少数民族地区时,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对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1936年4月25日,红军经过石鼓江时,党中央就开始制定统一战线方针,争取与少数民族上层人士进行合作。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在本民族内具有较高的声威,熟悉本民族的现实状况,与人民群众之间的感情基础深厚,能够更好地把握民族地区的发展。因此,增强开展民族工作的针对性,团结一切可靠力量,孤立和打击敌对势力,有助于红军行军作战的过程中积累良好的群众基础。在争取上层民族宗教人士方面,红军始终以“优待少数民族,在民族地区不打土豪劣绅,保护和帮助为红军安插藏民和采办给养的少数民族上层人物”^①等作为开展好群众工作的基本原则。红军进入云南期间,云南地区的统治力量主要是以龙云为主的地方实力派。当时,红军面临着严峻的局面,必须开展对龙云的争取工作,于是通过不同渠道写信给龙云,说明红军绕道云南为的是北上抗日,让其不必多虑,晓知以抗日救国大义。^②这些争取工作使龙云的思想发生了转变,他借机对红军提供帮助,将云南地区的军用地图、粮食和红军所急需的药物送到红军的手中,减少了红军在云南民族地区的阻力。实践证明,团结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的工作,是红军长征途中的重要工作之一。在此期间,中国共产党积累了围绕中心任务,团结一切力量的统战工作经验,以保证党的民族政策在少数民族地区的贯彻与执行。在长征时期党和红军开展统战工作的实践中,党的统战政策有了根本性转变,统一战线的对象由过去单一的少数民族劳苦群众转变为少数民族上层人士,中国共产党用实际行动与土司、民族上层人士建立了革命友谊,进一步激发了各民族群众的抗日热情,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四) 支持和帮助少数民族建立革命武装,反对民族压迫

少数民族在历史上长期受到大汉族主义的压迫,而国民政府实行的也是民族同化的歧视政策。^③长征时期,党和红军以实现民族平等为主要目标,将支持和帮助少数民族建立武装政权,增强革命斗争力量,作为长征途中的重要战略任务之一。

红军在途径云南地区之后,积极动员和发动各族人民反抗反动统治的剥削和压迫。在党和红军的影响下,各少数民族纷纷建立自己的革命组织,以顽强的革命斗志对武装斗争进行了初步的尝试。1934年12月,中央红军在黔东南的黎平县帮助少数民族建立了第一支武装部队——苗族侗族武装自卫队(游击队),受其影响,红军所经过的云南的曲靖、楚雄、大理等地的少数民族,也在红军的帮助下均建立了自己的武装。^④在作战中,红军将自己缴获的武器、衣物和粮食等物资送给少数民族群众,为他们建立自卫组织提供后备力量。1936年9月,川滇黔边区游击队云南支队建立。云南支队进行了长达12年的武装斗争,牵制和削弱了川滇黔反动势力。^⑤在此之余,也有许多少数民族青年积极加入革命队伍,自觉接受党的领导,并帮助红军作战,掩护红军进行战略转移。红军长征经过大理州祥云、宾川、鹤庆期间,在红军精神的感召下,大理州祥云县有近千人自愿参加红军,这是红军长征过大理扩红人数最多的一次,其中宾川县270人、鹤庆县27人,有力地壮大了红军队伍。^⑥因此,在大理地区的扩红行动大大增强了红军的革命队伍力量,使严重减员的红军得到了人力补充,为革命事业的进步与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1935年6月,武定县爆发了以彝族为主要力量的反土司战争,虽然遭到国民党政府和反动土司残酷的镇压,但彝族人

① 张家德:《论红军长征在云南的民族政策与兄弟民族对长征的伟大贡献》,《云南教育学院学报》1991年第2期,第20页。

② 中共大理州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大理地方史》,第84页。

③ 莫曲波、颜永强:《论红军长征时期党的民族工作》,《兰台世界》2013年第13期,第19页。

④ 王洪、杨世英:《红军长征过云南的民族政策探析》,《曲靖师范学院学报》2015年第2期,第128页。

⑤ 中共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工农红军过云南史》,第207页。

⑥ 中共大理州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大理地方史》,第83页。

民仍坚持斗争达5年之久，使国民党反动势力的残暴统治受到了威胁，建立起了坚定的革命力量。^①因此，在长征过程中，大部分的少数民族都组建了革命队伍，并坚决与国民党反动派以及一切反动组织进行斗争，以武装战争的方式赢得了民族解放。革命武装队伍的创建，不仅增强了少数民族革命中的骨干力量，同时也提高了少数民族群众的革命思想觉悟。帮助少数民族建立革命政权，是中国共产党实施民族平等、团结政策的必然结果，它使少数民族群众找到了一条符合实际的解放道路，为革命斗争的胜利开辟了新局面。

三、红军长征过云南时期中共民族工作的成效与影响

红军长征经过云南时期，与少数民族群众取得了广泛的联系，对民族平等、民族团结等主张进行了宣传，进一步丰富了党的民族理论与政策，既为革命事业的发展和党的建设奠定了基础，同时也为各民族地区开展民族工作，取得革命的胜利提供了十分宝贵的经验，具有重要的实践和理论意义。

（一）丰富了党的民族理论政策

在长征初期，中国共产党就将政治工作的重心放在少数民族问题上，但由于当时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革命思想主要是在汉族地区进行宣传，与少数民族群众的沟通和接触较少，因而虽然实施了一些政策，但是依然缺乏民族工作实践经验。但是，途径云南期间，面对少数民族聚居的特殊环境，红军接触了大量少数民族群众，党和红军根据少数民族特点制定了切实有效的方针政策，使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工作在实践中不断地得到完善和发展。

在经过彝族和苗族少数民族聚居地时，为了顺利通过这些区域，红军组织和动员沿途少数民族群众参加革命，并接连发布了一系列指示和布告。红军进入云南不久，就以朱德总司令的名义发布了《中国工农红军布告》，明确提出：“中国工农红军，解放弱小民族，一切夷汉平民，都是兄弟骨肉”，“凡我夷人群众，切莫怀疑畏缩，赶快团结起来，共把军阀驱逐。设立夷人政府，夷族管理夷族，真正平等自由，再不受人欺辱”。^②红军以不同的形式使广大人民群众了解党和红军反对民族压迫，主张民族平等、民族团结的方针政策，不仅保护了少数民族群众的根本利益不受侵害，使人民群众紧紧地围绕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同时也丰富和发展了党的民族政策。因此，这一时期党和红军在云南地区对民族政策的实践和探索，既为今后云南党组织制定民族政策起到了良好的示范作用，同时也为后来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开展民族工作提供了借鉴。

（二）为红军顺利通过云南地区奠定坚实的群众基础

长征经过云南时期，党中央强调民族工作是红军政治工作的关键部分，并要求红军充分执行党的政策，严密遵守党和红军的纪律，积极开展民族工作。红军通过党的思想教育和改革宣传工作，用实际行动感化了少数民族群众，并与他们建立了深厚的情意。云南地区的各民族群众热爱并保护红军，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来挽救红军的生命，为长征时期红军顺利通过云南地区做出了重要贡献。

1936年4月，红二方面军到达丽江后，进行了积极宣传，争取群众支援，实现渡江的行动。^③当时，情况十分紧急，多名船工经过不断努力，冒着生命危险帮助红军顺利地渡过了金沙江。随后，红军进入中甸县城。由于敌人的错误引导，一些藏族同胞带着粮食和衣服，赶着牛羊纷纷躲了起来。面对这种情况，红军向藏族人民群众解释其意图，并尊重藏族人民群众的宗教信仰，保护佛教僧侣的生命和财产，他们最终被红军的行为所感动，逐渐消除了对红军的疑虑和不信任。

^① 中共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在云南的少数民族工作》，第134页。

^② 中共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云南地方史》，第210页。

^③ 朱波：《云南各族人民对红军长征的贡献》，《西南林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2017年第5期，第53页。

被反动势力吓跑的藏族人民群众也纷纷赶回了家，他们意识到了党和红军才是工农劳苦群众的救星。随后，藏族同胞积极协助红军完成军事战略任务，与红军齐头并进，为红军长征取得阶段性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三）推动了云南少数民族地区革命运动的蓬勃发展

在长征时期，党和红军以解放广大劳苦人民为基础，广泛开展群众工作，与少数民族群众始终保持血肉联系，并结合实际情况，解决和处理好沿途中所遇到的民族问题。红军在行军途中用实际行动号召人民群众加入红军队伍，使少数民族地区的革命力量迅速壮大起来。红军武装反抗国民党的行动，为云南人民揭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真理，^①对云南人民开展革命斗争产生了重大影响。

在红军长征过云南地区之后，云南地区的革命军队迅速兴起，并在省内的一些地区进行了武装革命斗争。1936年4月，党组织在红二、红六军团停留过的楚雄领导武装暴动，建立了楚双峨眉游击大队，坚持武装斗争，打击地方反动势力。^②1938年冬，纳西族、白族、傈僳族人民在金沙江两岸发动了“黄军”起义，起义队伍一度多达1000余人。斗争持续了一个多月，震动了滇西北，^③在滇西北地区革命事业的发展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在云南党组织的领导和号召下，云南各族群众相继建立革命队伍，并继承了红军的优良传统，以保护人民群众的利益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在云南地区不断进行游击战争，用生命为云南人民的革命斗争事业贡献力量。因此，通过建立少数民族武装，不仅积累了云南地区的革命斗争力量，同时也使云南地区成为了创建少数民族革命根据地的重要区域之一，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民族统一战线组织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根基。

四、结语

红军长征过云南期间，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从实际出发，制定符合少数民族特点的民族政策，做好民族工作，在实践中解决民族问题。云南地区是红军长征中的关键节点，红军通过实际行动在各民族聚居区树立了良好的形象，同时由于云南各族群众的支持与帮助，红军成功摆脱了被敌军围追堵截的被动局面，顺利通过云南地区，完成了战略转移任务。在长征中，红军通过各种方式和渠道，宣传了党的民族政策和方针、开展民族工作，提升云南各族人民在政治和思想上的觉悟，为云南地区各民族的自由和解放指明了方向。红军长征时期中国共产党在云南地区对民族工作的探索与实践，充分证明了党的民族政策既是我军克敌制胜的法宝，也是革命取得胜利的重要原因。与此同时，红军在云南播下的革命火种，增强了各民族群众的爱国情怀，打开了云南革命事业的新局面，为之后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更好地开展民族工作提供了理论和实践基础。红军当年的革命遗迹，成为云南十分珍贵的历史遗产和精神财富，对当今云南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和民族团结进步建设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责任编辑：李亚强

① 中共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云南地方史》，第209页。

② 李步前：《红军长征在云南期间的革命实践》，《党的文献》2020年第5期，第92页。

③ 刘明辉，黄川：《红军长征时期党的民族政策在云南地区的实践》，《广东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6年第4期，第24页。

秦汉时期西南民族融入中华民族研究

马宜果

(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 云南 昆明 650091)

摘要: 秦汉时期西南民族融入中华民族的进程, 是由以汉族形成的凝聚核心为外部动因、以西南民族对统一多民族中国的认同为内部动因以及经过秦汉时期历时性的长时段建构统一多民族国家的进程, 从地区、政治、文化等方面与各民族一同融入中华民族的发展构成, 研究秦汉时期西南民族融入中华民族的路径、内生动力等问题对认识和把握中华民族的发展历史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秦汉时期; 西南民族; 融入中华民族

中图分类号: K2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2811 (2022) 02-0085-06

中华民族的发展历史与多民族中国的发展历史紧密相连。西南地区从秦汉时期开始成为大一统国家的有机组成部分, 西南地区的各民族也在这个时期开始融入中华民族。秦汉时期西南民族融入中华民族的进程, 是由以汉族形成的凝聚核心为外部动因、以西南民族对统一多民族中国的认同为内部动因以及经过秦汉时期历时性的长时段建构统一多民族国家的进程, 从地区、政治、文化等方面与各民族一同融入中华民族的发展构成, 研究秦汉时期西南民族融入中华民族的路径、内生动力等问题对认识和把握中华民族的发展历史具有重要意义。

一、秦汉历代王朝对西南的治理与西南民族融入中华民族

秦统一全国后, 在全国范围内推行郡县制, 分全国为 36 郡, 在少数民族地区设道, 于西南地区设置巴郡和蜀郡。西南地区是最早进入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版图的地区之一。公元前 214 年, 在统一六国后, 秦始皇略定南方百越, 设置南海郡、桂林郡、象郡“以适遣戍”^①, 岭南地区正式纳入到秦王朝的统治。秦朝不仅向南扩张, 还对西部地区进行延伸, 根据《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秦时常颉略通五尺道, 诸此国颇置吏焉。”^②《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中:“邛、笮、冉駹者近蜀, 道亦易通, 秦时尝通为郡县, 至汉兴而罢。”^③秦朝在今滇东北及川西南部进行经略并曾设郡县进行管辖, 秦昭王时蜀郡太守李冰曾在犍道积薪烧崖以开成都县两江, 疏通岷江并入长江的通道。“及汉兴, 皆弃此国而开蜀故檄。巴蜀民或窃出商贾, 取其笮马、犍僮、髦牛, 以此巴蜀

基金项目: 云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基金项目资助“秦汉时期西南民族融入中华民族研究”(2022Y067)。

作者简介: 马宜果, 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中国少数民族史。

① 《史记·秦始皇本纪》, 北京: 中华书局标点本, 1959 年, 第 253 页。

② 《史记·西南夷列传》, 北京: 中华书局标点本, 1959 年, 第 2993 页。

③ 《史记·司马相如列传》, 北京: 中华书局标点本, 1959 年, 第 3046 页。

殷富。”^① 秦国曾沿民间小道修筑“五尺道”，经过秦国百年的建设发展，促进了巴蜀地区经济的发展，并且通过商贸的繁荣发展也带来了华夏文化在巴蜀地区的传播，由此巴蜀地区的富饶也给汉朝灭秦提供物质支撑。秦末，萧何主张入蜀：“收用巴蜀，还定三秦，天下可图也。”^② 刘邦听取萧何意见，进入巴蜀地区，之后巴蜀成为了刘邦平定中原的大后方，并为其征战中原提供了物质帮助。

西汉建立以后，对西南民族的治理从深度和广度上都有了发展。自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至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西汉先后设置了犍为郡、牂牁郡、越巂郡、益州郡，将大部分西南地区纳入统治范围。但由于西南地区的民族生计方式不同，有从事农业、游牧还有渔猎的民族，社会发展极不平衡，所以，虽然汉王朝在西南地区设置郡县，但是想要将中原地区的模式照搬到西南地区非常困难。为加强对西南地区的控制，汉王朝在郡县制的体系下并行羁縻制度，“盖闻天子之于夷狄也，其义羁縻勿绝而已”。^③ 即保持西南地区各民族原有的社会组织，在依托汉朝派遣的汉族官吏管理的基础上，分封各部落首领为王侯，通过调度本地区上层贵族，达到对西南地区的统治目的。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到东汉明帝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两百年间里，汉王朝在西南地区设置了犍为郡、牂牁郡、越巂郡、沈黎郡、汶山郡、武都郡，同时东汉王朝借助哀牢王率众内属的时机，在西汉经营的基础上设立永昌郡，并派遣了许多的汉族官吏进行管理，对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统治，将西南地区纳入到王朝体系中。《后汉书·百官志》载：“四夷国王，率众王，归义侯，邑君、邑长，皆有丞，比郡、县。”^④ 从汉王朝对西南地区的分封层级来看，这些少数民族的部落首领正式地从体制上纳入到封建国家的政权体系中，部落首领经济上需要纳贡，政治上需要听从汉王朝的调遣，但同时这些少数民族仍然保有原来的社会组织和自己的管理体系。虽然需要向汉王朝纳赋，从都尉郑纯“与哀牢夷人约，邑豪岁输布贯头衣二领，盐一斛，以为常赋”^⑤ 来看，西南地区相较于中原地区赋税较轻。

汉武帝最初开拓西南的原因是为了利用夜郎攻打南越，但当时“西南夷数反，发兵兴击，耗费无功”^⑥ 并且正值“朔方以据河逐胡”，公孙弘与巴蜀百姓极力反对，汉武帝便放弃对西南夷地区的开拓活动。元狩年间，张骞出使大夏归来，建议“诚通蜀，身毒国道便近，有利无害”，于是遣王然宇等人“出西夷西，指求身毒国”，开始第二次通西南夷。然后被滇王留下并帮助寻找通往身毒国的道路，最终被昆明王所阻。此行虽未达身毒国（即今天的印度），但与滇王建立联系，“盛言滇大国，足事亲附”，为西南夷的最终属蜀郡创造了条件。汉武帝在元鼎元封之际对西南夷全面发动战争的契机是，南越谋反时汉朝本欲发南夷兵攻打南越，而南夷人却趁机杀使者即犍为郡太守。于是，汉朝发兵击破南夷，后又破南越。南夷夜郎侯本倚仗南越，在此形势下只有入朝受封夜郎王。而滇国直到元封二年王然宇破南越入滇时才属蜀郡，置益州郡。至此，汉武帝才完成了在西南地区设郡置吏的统一大业，自此西南地区纳入到汉王朝的版图中，并且由官方承认西南地区的身份地位“赐滇王王印，复长其民”，“西南夷君长以百数，独夜郎、滇受王印”。元封六年（公元前105年）三月，益州、昆明反，汉武帝派遣拔胡将军郭昌还击昆明，《史记·大宛列传》载：“是时汉既灭越，而蜀、西南夷皆震，请吏入朝，于是置益州、越巂、牂牁、沈黎、汶山

① 《史记·西南夷列传》，第2993页。

② 《汉书·萧何曹参传》，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62年，第2006—2007页。

③ 《史记·司马相如列传》，第3049页。

④ 《后汉书·百官志》，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65年，第3633页。

⑤ 《后汉书·南蛮西夷列传》，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65年，第2851页。

⑥ 《史记·西南夷列传》，第2993—2997页。

郡，欲地接以前通大夏。”^①从建元到元封经历三十多年，发动经略西南夷，设置郡县，纳入汉朝版图。

两汉对西南的移民屯田政策促使西南民族融入到王朝统治之下。汉王朝想要进一步经营西南地区，首要措施是修筑道路。“汉通西南夷道，作者数万人，千里负担馈粮，……数岁道不通，蛮夷因以数攻，吏发兵诛之。”^②但终因“数岁道不通”，开发南夷道后，又对西夷道进行开发，“邛、笮、冉、駹者近蜀，道亦易通，秦时尝通为郡县，至汉兴而罢。今诚复通，为置郡县，愈越南夷。”^③于是，通零关道，招徕西夷，豪民进入西南地区开垦必然大量汉民随之进入，汉族移民进入西南地区，直接开发了西南地区，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生产工具。牛耕、先进的水稻栽培技术和灌溉技术也相继传入。值得注意的是，汉武帝反复开拓西南的深层原因根植于自秦统一六国以来，在各族文化长期以来互相融入的基础上，以中原农耕型的周秦文化为基本模式向全国进行推广，农业生产是秦汉政权的根基，因此在秦汉王朝开拓领土之前首要考虑因素就是当地的农业条件是否可以生产足够养活当地居民的粮食，这成为了秦汉及以后历代王朝开拓经营的标准。^④

虽然羁縻政策使得西南地区各民族处于相对封闭的状态，但是汉民族与西南民族共同开发建设西南地区这是不争的事实。王莽时期，益州郡太守文齐在任犍为南部都尉时“造起陂池，开通灌溉，垦田二千余顷”，增加粮食产量，“降集群夷，甚得其和”^⑤。文齐为益州太守时，在益州郡历经天凤至地皇年间的战事之后，依托汉初以来的屯守政策，召集这部分汉人进行农业生产开发，这部分汉人中包括了派遣至西南地区的官吏、原先的屯户、一些散兵和遣而未归的士卒，将他们结合到一起，重新建立统治基础。为了开发生产，大量制造先进的生产工具，并且“降集群夷”，让当地的部族加入到生产活动中，太守文齐与当地民族共同建设西南地区，也为其后抵抗公孙述提供后备力量。与文齐同时期的牂牁郡郡吏谢暹也团结当地夷帅及汉族大姓共同抵御公孙述的割据，与东汉保持臣属关系。《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载：“公孙述时，大姓龙、傅、尹、董氏，与郡功曹谢暹保境为汉。”^⑥大姓在政治、经济、文化上享有朝廷承认的权力，在西汉末年时已形成大姓势力，谢暹在任期间团结地方大姓势力并且对公孙述的侵扰进行抵御。这些与内地类似的政治、经济文化措施在西南地区施行，使得汉文化在西南夷地区传播，处在交通沿线的民族逐步接受汉族先进的生产工具及生产方式，与此同时西南民族的思想观念也受到影响，尤其是少数民族的上层开始了汉化进程。

东汉桓帝时，牂牁郡任尹珍“自以生于荒裔，不知礼仪，乃从汝南许慎、应奉受经书图纬，学成，还乡里教授，于是南域始有学焉”。西南地区文化事业由此开启，到汉章帝时汉文化的传播更深入到滇中的大部分地区，王追为蜀郡太守期间“始兴起学校，渐迁其俗”，在南中地区建立学校，以其诚信的作风，治理教化的并行信服当地夷人，“蛮夷犷悍，不知礼义，喜即从服，少拂意称兵相向，迄无定岁，非儒教不克驯之。而自汉置郡以来，为政者沿习夷俗，故滇人犹未知书。今王追实开其始”。滇人尹珍从汝南许慎学成归还乡里，并“劝谕蛮夷，昌兴诗礼”，对此明人诸葛元声按语：“滇人之从儒教，自叶榆张叔学于司马相如，归授乡人……今尹道真学于许、应二公，传授乡里。况有太守如王追者劝学兴礼……以故文治彬彬，家弦歌，户诵读，人人衣冠礼让，

① 《史记·大宛列传》，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59年，第3170页。

② 《史记·平淮书》，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82年，第1421页。

③ 《史记·司马相如列传》，第3046—3047页。

④ 葛剑雄：《论秦汉统一的地理基础——兼论魏特夫〈东方专制主义〉》，《中国史研究》1994年第2期。

⑤ 《后汉书·南蛮西夷列传》，第2846页。

⑥ 《后汉书·南蛮西夷列传》，第2845页。

喜谈先王。”^①以少数民族的代表和汉王朝的官吏两者对汉文化的传播施教,使得西南地区的文化得到进步,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文明也逐渐与中原汉文化融合。可以看出,汉王朝对于融入到其封建国家统治体系的西南民族社会并未强制要求其与内地施行同样的社会制度,也没有要求立刻接受其文明,而从承认王朝的主权开始,在民族社会中建立象征中央王朝的统治权,并且中央王朝承认地方上层统治的权利,来实行间接统治。这样的观念促使周边民族集团主动融入到中华民族之中,在中央王朝占主导地位的时期里,这样的方式既可以维护王朝统治的稳固,还可以使周边民族集团的利益受到保护,保障了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稳定性。在这些正面政治措施的影响下,众多边民对地方官员民族政策执行表示认同,对有利于民族团结、民族发展的汉族官员尊敬认同,“化行夷貊,君长感慕,皆献土珍,颂德美”^②,并主动表现出归属的愿望,永平年间(公元58—75年),“白狼、槃木、唐菽等百余国,户三十余万,口六百万以上,举种奉贡,称为臣仆”^③。

总体来说,秦汉王朝在西南地区开拓与设置郡县等客观举措加强了西南地区与内地各民族之间的联系,同时拓展了封建王朝统治的版图,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先决条件。对西南民族来说,纳入到封建王朝统治当中有利于本地区的开发,同时在内地的经济文化影响之下,边疆民族可以较快地走上封建化的道路。从以上的分析来看,西南各民族融入统一多民族国家是一个循序渐进的历史过程,西南地区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统治者采取了因俗而治的方略,因此在西南民族融入到秦汉王朝统治的过程中,许多西南民族发展出与自身生态、经济背景相适应的社会政治制度。秦汉时期出现国家统一、经济文化快速发展的局面正是来源于内地与边疆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在各民族内部独立发展的同时,在大部分时间里,他们生活在统一多民族国家里,对中央王朝具有强烈的向心力。^④

二、秦汉时期西南民族融入中华民族的内生动力

《史记》《汉书》《后汉书》既记载了作为华夏典范的两汉王朝的历史,而且它们的史学撰述方法本身也成为后世修史的典范。正是这种对异族渊源的叙述手法,不仅在华夏知识世界建立起复杂的夷狄谱系树,而且最终影响了非华夏族群对自身历史的认知,以及他们借以凝聚族群的认同方向。^⑤《汉书·百官公卿表》记载:“列侯所食县曰国,皇太后、皇后、公主所食曰邑,有蛮夷曰道。”^⑥边疆郡县称为道,以道作为周边民族的行政区单位。当边疆民族集团内属王朝以后,其集团的首领从王朝得到官位,获得官方认同,成为王朝臣民的一分子,那么该集团首领所辖民众向王朝纳赋,其原本的政治领土成为王朝版图的一部分。“至成帝河平中(公元前27年),夜郎王兴与钩町王禹、漏卧侯俞更举兵相攻……太中大夫匡使和解蛮夷王侯,王侯受诏,已复相攻,轻易汉使,不惮国威,其效可见。”^⑦在此之前,汉武帝时期“夜郎侯始倚南越,南越已灭,会还诛反者,夜郎遂入朝”^⑧,并且受封夜郎王,也就表明西南少数民族进入到郡县制度的统治后,少

① [明] 诸葛元声撰,刘亚朝校点:《滇史》,芒市:德宏民族出版社,1994年,第47—60页。

② 《后汉书·南蛮西夷列传》,第2851页。

③ 《后汉书·南蛮西夷列传》,第2854—2855页。

④ 王文光等:《中国西南民族通史》,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6页。

⑤ 胡鸿:《能夏则大与渐慕华风——政治体视角下的华夏与华夏化》,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279页。

⑥ 《汉书·百官公卿表第七上》,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62年,第742页。

⑦ 《汉书·西南夷两粤朝鲜传》,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62年,第3843—3844页。

⑧ 《史记·西南夷列传》,第2966页。

数民族集团首领受封为王的同时，该地区具有了双重身份。主动归附内属意味着认同，汉王朝采用的是一种通过西南地区少数民族集团首领间接统治的方式，给予了当地的上层统治阶层相当大的权力，但王朝始终持有对郡县管辖的实权，形成了政治制度上的双轨制。

建武二十三年（公元47年），哀牢王贤粟攻打鹿蓼，但遇“震雷疾雨，南风飘起，水为逆流，翻涌二百余里，箬船沉没，哀牢之众，溺死数千人。……中国其有圣帝乎？天祐助之，何其明也！”^①于是建武二十七年（公元51年），“贤粟率种人户二千七百七十，口万七千六百五十九，诣越嵩太守郑鸿降，请内属。光武封贤粟等为君长。自是岁来朝贡”，哀牢王内属汉王朝后，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哀牢王柳貌遣子率种人内属”并置哀牢、博南，割益州郡西部都尉统领六县，合为永昌郡。至永元六年（公元94年），永昌郡外孰忍乙王莫延感慕汉义，“遣使译献犀牛、大象”，永元九年（公元97年），“永昌郡外蛮及掸国王雍由调遣重译奉国珍宝，和帝赐金印紫绶，小君长皆加印绶、钱帛”。永昌郡的设立，将今天云南省西南部在公元69年纳入了东汉王朝的版图，永昌郡内的民族与境外的民族大多属同一民族，其境内外民族的联系交往也促进了东汉王朝与境外民族的交往。元初三年（公元116年），越嵩郡外夷大羊等同样“慕义内属”，正值郡县“赋敛烦数”。元初四年，永昌、益州及蜀郡的夷人皆起反叛，攻坏二十余县，杀长吏，侵掠百姓，益州刺史张乔率杨竦大战封离并取得胜利，并且将侵犯蛮夷的九十名长吏上奏处置，此后张翕之子张湍继为太守，“夷人欢喜，奉迎道路”。永平年间，益州刺史梁国朱辅，在任期间宣教汉朝德化，在西南地区颇有盛名。汶山郡以西的地区未曾与汉王朝交流，但该地区的民族，如白狼、槃木、唐菟等百余国“举种奉贡，称为臣仆”，朱辅向汉王朝上奏这些部落向汉朝进歌三首，表达对汉朝的慕化归义，“蛮夷所处……慕义向化……不远万里，去俗归德，心归慈母”，“吏译传风，大汉安乐，……传告种人，长愿臣仆”。建武初年，白马氏隗嚣族人隗茂叛乱杀武都太守，氏人大豪齐钟留与郡丞孔奋共同击杀隗茂，之后时有为寇之人，郡县内都协同作战。可见在西南夷地区，不同的民族群体之间不可避免地发生了接触，为了获取土地或资源，他们彼此之间既战争又联合、通婚，民族融合自然发生，西南各民族之间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亲缘关系。

西南民族对汉王朝的认同不仅仅体现在对汉王朝正统性的拥护，还体现在对汉文化以及其汉朝臣民身份的认同。诸葛元声《滇史》记载：“平帝元始元年，春，正月，滇王献白雉于朝。时王莽窃柄，潜移汉祚……然滇久置郡邑，立汉官，又何重译哉？如此举动通朝附和，恬不知耻，反为远夷所笑。未几莽篡汉而益州蛮夷终不肯服从，宜矣！”^②时值王莽篡政，意图利用滇王诈称越裳氏献雉，以“白雉之瑞”来证明自己的功德高尚比肩周公，但“滇久置郡邑，立汉官”又何来“重译”之说，反而成为了“远夷”所不齿的闹剧。汉承秦制以来，原本受秦所封或者纳入到统治势力范围内的西南地区都已独立，汉朝建立之初与各国关系不紧密，还属于“外臣”的范围，直到派遣使节从西夷西出寻找通往身毒国的道路，经过滇国后返回朝廷复命才使得汉朝统治者注意到滇国，也才有了之后开拓经营西南地区的史事。汉王朝对待“外臣”之国的做法是，在承认其统治者的王位并保护它不受外来侵略的同时，要求它“称臣”“奉贡职”“遣使入朝”，汉王朝所规定与外臣之间的关系，虽带有君臣关系的性质，但并非是单向的服从与被服从的关系，而是一种双向的，同时规定了双方相互具有义务的关系。^③如在《史记·南越列传》记载，“愿长为藩

① 《后汉书·南蛮西夷列传》，第2848—2857页。

② [明]诸葛元声撰，刘亚朝校点：《滇史》，第47—60页。

③ [日]王柯：《从“天下”国家到民族国家：历史中国的认知与实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76页。

臣，奉贡职”“称臣，使人朝请”“今闽越兴兵侵臣，臣不敢兴兵，唯天子诏之”。^①与西南地区不同，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汉朝发兵击灭劳浸、靡莫，到滇国时“滇王始首善……举国降，请置吏入朝。于是以为益州郡，赐滇王印，复长其民”^②。王莽建国四年（公元12年），西南夷杀牂牁大尹，“更易汉制曰‘汉氏诸侯或称王，四夷亦如此，违古典，缪于一统。其定诸侯王之号皆称公，及四夷僭王号有皆更为侯’”，使得句町王王邯怨恨，形成了“三边蛮夷愁扰尽反”的局面，至天凤元年（公元14年），滇王再次击杀益州尹程隆，王莽派遣平蛮将军冯茂攻打益州，滇王率诸蛮大败冯茂，三年后，王莽发兵攻打夜郎蛮但未攻克，激发了西南地区的周边兄弟民族的不满情绪，于建武三年（公元27年），西南地区的豪杰以诛王莽为名号奋起反抗。王莽时期，西南民族成为了与“华”对立的“夷”，从政治、经济、文化上对西南民族进行压迫并且不承认西南民族与中原民族的共存性，激发了边疆少数民族的反抗情绪，而西南民族的上层统治者对于自身以及中央王朝的身份互认业已形成，西南地区与中原地区早已形成了共同的文化心理素质，自汉族形成之后，其凝聚力向周围各族辐射，促使各族人民与汉民族从政治、经济、文化上相互融入，并且形成了一个稳定统一的中华民族实体。

中国最初的民族思想，是以生活、生产方式为基础形成的文明方式。从《史记·西南夷列传》对于西南地区人群的记述来看，其实质是内地对于周边民族的认识和概括，称这些民族集团为“蛮”“夷”是从其生产生活方式进行划分，本身不存在歧视含义。并且，中国所具有的多民族性质和中华民族本身的多民族来源共同组成了多民族共存的中华民族实体，众多的部族和民族集团通过“华夏化”形成了一个文明共同体。秦朝采取了众多巩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措施，如大规模地移民实边，行郡县制度，统一文字等方面，重新整合成了有共同地域、共同语言文字、共同经济生活、共同心理素质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而在这四个要素下，各民族间的物质活动、物质交往并在实际交流交往交融过程中形成了物质到精神的转换，产生共同意识，西南民族融入到中华民族并共同生活，都成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产者之一。西南民族与中华民族相互融合，成为中华民族多元民族来源当中的一元，具有共同的利益安危，强烈的体认感情意识，西南民族与组成中华民族的各民族一致，对“中华民族”的概念进行体认，使其形成了一个民族共同体的符号。

三、小结

秦汉大一统国家的建立，结束了华夏族的分裂状态，加强了其内部各方面的联系。虽然国家与民族是不同的社会范畴，有本质上的区别，但这两者在发展过程中是紧密相连的。国家政治的统一和因此带来的民族内部联系的加强，对民族的发展起到了重大的影响和作用。秦汉政治的统一，使华夏族（汉族）内部地区间经济文化发展逐步趋于平衡，从而也就加强了经济生活的一致性。在民族意识上，汉族的观念日益增强，特别是在与其他民族的关系中，这种共同的观念，就表现得更为明显和突出。^③自秦汉时期西南地区纳入到中央王朝的统治后，西南民族开始与中华各民族共同缔造伟大的祖国、共同开拓了祖国疆域、共同创造中华民族文化，共同培育中华民族精神，为中华民族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责任编辑：杨松禄

^① 《史记·南越列传》，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82年，第2970页。

^② 《史记·西南夷列传》，第2997页。

^③ 翁独健：《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180页。

历史与文化

云南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及保护问题研究

——以迪庆藏族自治州为例

杨绕才

(中共迪庆州委党校, 云南 香格里拉 674499)

摘要: 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人类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中华传统文明代代相承的鲜活见证。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及保护对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培育文明乡风民俗、巩固精准脱贫成果和助力乡村振兴等具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迪庆藏族自治州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丰富, 具有较高的历史、科学、文化、艺术等社会价值。近年来, 迪庆藏族自治州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及保护取得了一定成效, 但仍面临着传承主体后继乏人、“非遗”市场化程度低、经费短缺、传承保护长效机制不健全等困境。因此, 必须进一步构建传承及保护的长效机制, 加强队伍建设, 拓宽融资渠道和丰富发展业态, 发挥各方合力, 实现“全民传承”“全民保护”。

关键词: 迪庆藏族自治州; 非物质文化遗产; 传承及保护; 对策

中图分类号: G1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2811(2022)02-0091-08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加强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①。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的传承和保护, 对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培育文明乡风民俗、巩固精准脱贫成果和助力乡村振兴等具有重要的意义。迪庆藏族自治州是云南省唯一的藏族自治州, 地处世界自然遗产“三江并流”腹心区。特殊的地理环境和区位特点使其形成了以历史文化、民族文化为主体; 以佛教文化、东巴文化为轴心; 以自然净土为依托, 涵盖多民族和谐相处、多元宗教和谐共生的“非遗”。“非遗”中“蕴含许多和谐元素, 对规范人们思想观念、行为方式和调节人与自我、人与他人、人与社会之间关系有重要作用”^②。迪庆藏族自治州“非遗”具有多民族形成的文化多样性, 切合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本真性, 人与自然、社会交往的和谐性等特征, 承载着独特的历史、科学、文化、社会和经济价值。加强“非遗”的传承及保护是迪庆藏族自治州实现民族团结、文化繁荣、社会稳定和高质量发展的长久之策。

作者简介: 杨绕才, 中共迪庆州委党校办公室副主任、讲师, 研究方向为民族法学, 党建。

^①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2017年10月18日,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19epcnc/2017-10/27/c_1121867529.htm, 2022年4月29日。

^② 王文章:《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 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 2013年, 第89页。

一、“非遗”传承及保护的内在机理

(一)“非遗”传承及保护的主体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明确要求,“非遗”保护必须遵循“政府主导、社会参与,明确职责、形成合力;长远规划、分步实施,点面结合、讲求实效”的原则。我国“非遗”保护的主体是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呈多元化特征,涵盖政府、社会组织、人民团体、新闻媒介、学界商界及普通民众等,其中各级政府是“非遗”保护最重要的主体。政府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制定“非遗”相关政策,多渠道筹集资金,具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组织优势、政治优势和经济优势,在支持引导、监督管理“非遗”的传承保护中发挥着主导作用,但政府不是万能的,其政治职能、经济职能、文化职能、社会公共服务职能的发挥也存在缺陷。“非遗的传承主体是指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即在文化遗产传承过程中直接参与制作、表演等文化活动,并愿意将自己的高超技艺或技能传授给指定人群的自然人或相关群体。”^①“非遗”最大的特点是融入贯穿于人民群众的生活生产中,“非遗”传承人的能力素质和意识是“非遗”传承及保护的关键因素。因此,“非遗”传承及保护主要的主体是广大人民群众(包括传承人)和各级政府。

(二)“非遗”传承及保护的客体

“非遗”是指“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所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体系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②《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规定,“非遗”包括“传统口头文学以及作为其载体的语言;传统美术、书法、音乐、舞蹈、戏剧、曲艺和杂技;传统技艺、医药和历法;传统礼仪、节庆等民俗;传统体育和游艺;其他非物质文化遗产”。从定义上分析梳理“非遗”传承及保护的客体包括传承对象和保护对象两方面。无论是“非遗”传承对象还是保护对象,都是“非遗”全面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客体。

(三)“非遗”传承及保护的载体

广义上的“非遗”传承及保护的载体是群众的社会实践活动及其表现形式,社会环境、市场经济和传播手段等均属于“非遗”传承及保护的载体。从狭义上看,“非遗”传承人是“非遗”传承保护最主要的载体。

“非遗”的传承及保护是主体、客体和载体等要素共同作用的过程,“是依托于人而存在,以形象、声音等为表现手段,以口传心授为延续方式的一种活态文化”。^③“非遗”传承及保护的主体、客体、载体三者紧密联系、相辅相成。主体与客体是对立统一的两个方面,主体对客体具有认识和改造的能动作用并受客体制约,主体必须遵循客体发展的客观规律。同时,载体在主客体间发挥桥梁和纽带的作用。“非遗”的传承及保护要准确把握主体、客体、载体等要素之间的内在机理,尤其是各级政府要积极转变职能,加强“非遗”传承保护的机制体制建设,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提高人民群众对“非遗”传承保护的参与,科学有效地传承和保护“非遗”。

① 苑利:《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保护之忧》,《探索与争鸣》2007年第7期,第66页。

② 联合国公约与宣言检索系统:《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2003年10月17日, <https://www.un.org/zh/documents/treaty/files/ich.shtml>, 2022年4月29日。

③ 李树文、信春鹰、袁曙宏、王文章:《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指南》,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1年,第111页。

二、迪庆藏族自治州“非遗”传承及保护的现状

（一）迪庆藏族自治州“非遗”概况

迪庆藏族自治州是云南省唯一的藏族自治州，拥有丰富多彩、历史悠久、独具价值的“非遗”。迪庆州于2010年设立了迪庆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该试验区属于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试验区。据迪庆州“非遗”中心官网“迪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网”^①统计显示，截至2021年1月，迪庆州共有“非遗”保护名录项目国家级8项，省级29项，州级94项，县级79项。保护名录项目涵盖传统文化保护区、民间文学、传统舞蹈、传统技艺、传统音乐、传统医药等9个类别。其中，阿尺木刮、梅里神山祭祀、纳西族手工造纸技艺、热巴舞、锅庄舞、黑陶烧制技艺、藏医骨伤疗法为国家级保护名录项目。从普查工作所搜集的“非遗”线索来看，迪庆州“非遗”资源丰富，类别齐全，但也存在不平衡性。传统工艺与民俗类的“非遗”项目等级较高、数量较多，传统美术、曲艺、戏剧类等级偏低、数量较少。传承人方面，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7人，省级80人，州级83人，县级290人。大部分“非遗”传承人从事农业生产，无固定收入，传承的主要方式为家庭传承，少部分是师承。

（二）迪庆藏族自治州“非遗”传承及保护的实践

迪庆州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云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等政策法规和文件要求，坚持“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方针，建立了国家、省、州、县四级“非遗”保护名录体系。大批的“非遗”项目得到传承和保护，广大干部群众的保护意识显著提高，“非遗”传承及保护的机制初步建立。

1. 体制机制逐步健全，传承保护有保障。其一，成立“迪庆民族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领导小组”，由分管副州长担任组长，明确各部门的职能职责。2013年，迪庆州“非遗”保护中心正式成立，下辖的三个县（市）也相继成立了文化遗产管理所（保护所）和“非遗”保护中心，承担“非遗”的申报、传承和保护等各项工作。其二，鼓励、支持、引导社会参与，成立“迪庆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协会”和“迪庆州非遗保护专家委员会”，将“非遗”领域有一定威望的个人、民间组织、社团等纳入“非遗”保护协会。其三，制定《迪庆藏族自治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迪庆藏族自治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认定及管理办法》，进一步实现“非遗”项目和传承人管理的规范化、制度化和法治化。其四，建立代表性传承人的动态监督管理机制，每年与传承人签订传承协议，明确传承人权利和义务。按规定发放传承人补助，看望慰问与发放补助同时进行。国家级传承人传承补助经费由州“非遗”中心发放，省级、州级、县级传承人传承补助经费由各县（市）发放。国家级传承人每人每年补助2万元，省级传承人补助8000元，州级传承人补助3000元，县（市）级传承人补助1000元—1200元。常态化召开各级传承人座谈会，组织传承人学习培训，增强传承人的传承保护意识，提高其能力和素质。加强“非遗”的调研，关心传承人的生活。

2. 普查申报工作有序进行，挖掘整理有实效。通过民俗节庆活动、参观民间手工艺制作流程、抽样调查、重点访谈等方式，多渠道、全方位、大规模普查梳理“非遗”资源。积极申报各级“非遗”项目并制定四级名录，筛选出了一批具有代表性的“非遗”项目及传承人。整理挖掘出《迪庆藏族自治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国家级迪庆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概览》《梅里神山

^① 迪庆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迪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网：保护名录、传承人》，2021年2月2日，<http://www.dqich.cn/>，2022年5月20日。

祭祀纪录片》《傈僳族音节文字文献译注——占卜经》等28部具有较高价值的“非遗”资料典籍。

3. 基础建设不断加强,“硬件”条件有改善。迪庆州“非遗”保护中心、展示馆、传承基地、保护区等相继建成,乡(镇)均设有固定的传习点和开展民俗节庆活动的固定场所。目前迪庆州共有“非遗”展示传承场所传习馆13个,企业扶持和广大群众长期自然形成的传习馆2个,传习点135个,省级、州级公布命名的“非遗”保护传承基地12个,为“非遗”传承保护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4. 多措并举扩大宣传影响力,民众传承保护意识有提高。迪庆州积极开展民俗节庆和文娱活动,加大对“非遗”传承保护的宣传。如:维西县举办“丰收文化暨热巴保护传承成果宣传展示活动”,香格里拉市举办“尼汝传统手工纺织技艺展示赛”活动,德钦弦子节每年举办一次,通过民族民间文艺、服饰表演、弦子、热巴各种舞蹈表演,充分展示和传承了“非遗”;组织“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康巴涉藏州市文化艺术成果展”“非遗进校园”“锅庄文化高峰论坛”等系列“非遗”宣传展示活动;组织传承人参加云南省传统戏剧曲艺汇演、中国-南亚博览会等活动,充分展示迪庆州“非遗”特色,扩大影响力。

三、迪庆藏族自治州“非遗”传承及保护面临的困境

迪庆州“非遗”传承及保护虽取得了一定的进步和成效,但依然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只有把好“脉”才能对症下药,增强“非遗”传承及保护的成效。

(一) 主体认知存在偏差,“大保护”“大传承”格局尚未形成

“非遗”传承和保护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需要各级党委政府广泛动员群众自觉参与和承担义务。由于受诸多因素的影响,迪庆州部分干部群众对“非遗”传承及保护的重要性、长期性和紧迫性认识还不到位,缺乏主动性和积极性,“重申报轻保护”的现象普遍存在。首先,省级以上“非遗”项目及州级以下的民间文学、传统曲艺、传统技艺项目申报成功后再无大的作为,导致传承人无事可干,影响其传承保护的积极性和持续性。其次,“非遗”保护意识亟待提高。迪庆州干部群众对“非遗”保护政策和相关知识知之甚少,“非遗”传承保护多被认为是文化部门一家之事。长期以来,“非遗”中心、文旅部门“独角戏”唱得多,与其他部门联系少,缺乏多方力量协调机制,未形成齐抓共管的长效机制。同时,基层文化站的“非遗”保护职能作用发挥不充分,工作力度不够。再次,群众、社会团体“非遗”传承保护意识薄弱,社会不关心,群众不了解,宗教性和民族节庆类“非遗”群众参与度较高,而其他“非遗”群众参与度较低,自觉保护意识较弱。民间文学类《格萨(斯)尔》、传统音乐《阿迟木刮》仅有1位传承人,传统舞蹈《锅庄舞(迪庆锅庄)》、传统技艺“纳西族手工造纸技艺”仅剩2位传承人。传统医药、民间文学、传统曲艺、传统戏剧等传承保护困难重重,不少青少年对“非遗”缺乏兴趣,“非遗”后继人才匮乏。此外,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与“非遗”传承保护脱节,全社会“大保护”“大传承”格局尚未真正构建。

(二) “非遗”保护力量薄弱,传承主体断层断档、后继乏人

“非遗”传承和保护是一项长期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培养一支吃苦耐劳、乐于奉献、精通业务的工作队伍和掌握现代科学技术的专业人才。一方面,“非遗”保护机构编制紧缺,专业人才缺乏。迪庆州“非遗”传承和保护起步晚、起点低,队伍建设缺资金、培训少,“非遗”从业人员少、能力素质偏低。另一方面,各级名录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知识及年龄结构不合理,传承人受教育水平低。国家级、省级传承人年龄普遍偏高,后继乏人现象严重,传承人队伍梯次的传承性、

延续性现状令人堪忧。国家级传承人76—80岁年龄段者居多，“非遗”传承人面临着年龄老化、断层断档的严峻形势。此外，受外部环境干扰，部分“非遗”项目社会地位不高，经济效益不好，市场出路不广，从而造成吸引力不大，较少群众愿意去学习传承。加上大批农村青壮年迫于生计外出打工，“人在艺在，人亡艺绝”风险巨大。传承人经济待遇较低，迪庆州虽对各级“非遗”传承人给予一定补助，但补助还远不能维持和改善生活水平。国家级、省级代表性传承人的补助较多，省级以下传承人补助较少，传承人生活压力较大，迪庆州对后继传承者的再开发、再培养迫在眉睫。

（三）“非遗”产业化、市场化程度低，与文旅资源整合不够

迪庆州对“非遗”的旅游和产业化开发利用不够，“非遗”与旅游资源融合度较低，“非遗”传承保护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缺乏互动。如：同乐傈僳族传统文化保护区、省级以下100余项“非遗”代表性项目尚未真正进入到旅游产品中。目前，迪庆州主要的旅游产品结构单一，开发层次低，内涵缺乏，附加值不高，没有把“非遗”资源优势转变为旅游产业优势，游客对特色文化感受不深、消费欲望不强。

（四）投入不足、经费短缺困境的解局迫在眉睫

迪庆州“非遗”名录数量多，涉及范围广，保护任务艰巨。“非遗”项目和传承人资金投入不足、工作经费短缺是迪庆州“非遗”传承保护最大的瓶颈。迪庆州是全国“三区三州”深度贫困地区，经济总量小，地方财政困难，“非遗”传承和保护经费严重不足。迪庆自1998年开展“非遗”保护事业以来，“非遗”传承和保护的经费主要依赖于上级部门拨付的“非遗”名录项目的补助资金，没有来自社会团体、组织或个人资助等其他资金来源，融资渠道狭窄，直接造成专项办公经费缺乏，工作条件差，“非遗”传承和保护工作推进举步维艰。国务院批复的迪庆民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由于资金缺口大、申请困难、地方配套资金投入较少等原因，滞缓了保护试验区各项工作的推进。

（五）资源流失破坏危机仍然存在，传承保护长效机制尚未健全

1. 传承保护不平衡、不充分特征明显，学校教育传承不深入。迪庆州民俗类、传统技艺类“非遗”项目占总项目的73%，比重大、存量多，其他类别占比小、存量少。省级以上名录项目较受关注，保护传承状态良好，但州级以下项目保护现状令人堪忧。受众面较广泛的民俗及传统工艺类项目因紧贴群众生活，其内容形态的真实性、完整性保存较好，群众基础牢固。传统美术及戏剧类项目不仅数量稀少且等级偏低，传统曲艺及传统医药类均为单项等级高的项目，保护传承极易出现波动。同时，迪庆州尚未建立“非遗”学校教育的长效机制，“非遗”教育课程开发层次化、体系化、本土化不足，中小学“非遗”课程、“非遗”教育等还基本处于空白状态。此外，“非遗”的法治建设步伐缓慢，“非遗”项目创新能力亟需提高。

2. “非遗”资源流失破坏风险大，开发利用和生产性保护的矛盾亟需妥善解决。受市场经济的冲击和诸多因素的影响，迪庆州“非遗”的生存环境急剧变化，部分依靠口传心授传承的“非遗”濒临消亡、失传的危机。部分“非遗”受商业利益的驱使，原真性遭到破坏，祖传的民族服饰和手工艺品被现代日用品所取代，现代建筑代替了大量的传统民族民居，民族民间的口头文学、史诗等流失严重。由于迪庆州地广人稀、居住分散，部分偏远的高海拔农牧区尽管还保持着较为独特和完整的传统文化，但优质的“非遗”资源难以得到较好的开发利用和生产性保护。部分“非遗”在发展演变过程中逐渐失去了其本来面目和原始功能，逐渐脱离人们的现实生活，对生产生活的功能和实用性逐步降低，人们对“非遗”的需求性降低。此外，一些外国机构、团体或个人，借机无偿使用、剽窃掠夺“非遗”资源，造成民族文化资源大量流失，威胁到国家文化安全。

四、迪庆藏族自治州“非遗”传承及保护的对策建议

针对迪庆藏族自治州“非遗”传承及保护的困境，应建立健全机制，正确处理保护与开发、经济社会发展与“非遗”保护、传承与创新之间的关系，促进“非遗”挖掘、申报、传承、保护、研究之间协调共融，增强全社会传承保护意识，发挥合力，使“非遗”得到有效的抢救、传承和保护。

（一）厚植传承及保护根基，实现“全民传承”“全民保护”

1. 提高认识，落实传承及保护的主体责任。“非遗”保护工作是极其复杂而漫长的工程，各级党委政府要进一步加强对“非遗”传承及保护重要性的认识，充分发挥主导作用，将“非遗”工作与地区重大经济社会发展问题同谋划、同部署、同落实和同监督，建立“党委领导、政府主导、文旅牵头、‘非遗’中心落实、各部门配合、社会广泛参与”的“非遗”工作机制，明确主体责任。建立健全监督检查机制，做到“非遗”传承保护有组织领导、有规划措施、有监督评比。

2. 建立健全“非遗”社会培育长效机制，形成“大保护”“大传承”格局。“‘非遗’保护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全社会的参与。传承和保护的主体包括以传承人为核心的‘非遗’原生地民众，主导传承和保护的地方政府，作为研究主体的学术界以及提供资金进行开发利用的商界等。通过各主体的分工合作，完成对“非遗”的保护传承，并最终获得各自相应的收获。”^① 一是加强多部门联合，组织协调文旅、宣传、民族宗教管理、教育等部门和基层党组织等多方传承及保护“非遗”。二是鼓励高等院校、社会团体（如民俗学会、文艺协会、摄影协会、大自然保护协会、“非遗”保护协会等）、代表传承人及广大人民群众等社会力量广泛参与，形成合力。三是通过命名、表彰奖励、授予称号、资助扶持等方式建立行之有效的激励机制，加大对传承人的培养和扶持力度。探索成立“‘非遗’研究会”，建立“非遗”专家决策咨询机制，广泛联系内外专家学者，通过组织学术研讨会、专题座谈会、“非遗”论坛、青年大学习等形式，借助专家学者和社会组织的力量，关注“非遗”的理论和现实研究，推动“非遗”的发掘、整理、传承和保护，形成“大保护”“大传承”格局。四是建立“企业+非遗”发展机制，鼓励企业投入资金和管理，实现文化传承保护、传承人改善生活与企业商业经营的多赢。五是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力量，积极出台相关激励政策，倡导“非遗”传承及保护正能量，增强大众“非遗”传承及保护的意识。

3. 注重传播渠道多元化、立体化构建，增强文化自觉和保护意识。“‘非遗’溯危的很大一个原因是人民群众缺乏对非遗价值的认同，缺乏主动保护和主动传承的意识，导致了‘非遗’传承出现断层。”^② 这就要求“非遗”的传承保护必须加大宣传力度和宣传范围，创新宣传手段，充分让广大干部群众认识“非遗”、了解“非遗”、关心“非遗”、传承和保护“非遗”。加快完善“非遗”数据库建设，充分利用报刊、广播、电视、微信、微博等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开展多层次、全方位的宣传。与媒体合作组织系列活动，联合高校专家学者召开学术会议或论坛。制作公益片、宣传片，开展展览、展演活动，参加展销会、各类大型演出比赛等，打牢基础，织密网络，提高全民的传承保护意识，并将“非遗”逐步贯穿融入到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中。

（二）加强管理队伍建设和传承人的培育，让“非遗”薪火相传

1. 健全权益保障机制，解决传承人后顾之忧。传承人是“非遗”的重要载体，是“非遗”传

^① 尹未仙：《边疆民族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问题探析——基于云南省腾冲市的调查》，《中共云南省委党校学报》2019年第2期，第125页。

^② 王巨山：《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北京：学苑出版社，2012年，第148页。

承及保护的核心和灵魂。一是加快完善传承人的生活、医疗、社会、立法保障和人文关怀等长效机制，提高传承人的经济地位、政治地位、社会地位和职业荣誉感，激励和发展更多的人才积极参与到“非遗”传承保护中来，让“非遗”事业薪火相传、后继有人。设立“非遗”专项保护基金，对生活缺乏保障、年纪较大、身怀绝技、人数稀少的传承人进行专项保护。二是分层分类管理传承人，创新“非遗”津贴发放方式，调整津贴发放对象和发放额度。提高授徒数量较多、技艺超群、濒危项目传承人的津贴，加大对生产性保护且经济效益好的“非遗”传承人政策上倾斜和支持力度，如贴息贷款、减免税收、宣传和销路帮扶等。三是以“遗”养“遗”，完善“非遗”传承人补偿措施，形成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促进“非遗”与市场接轨，实现可持续发展。深入调研并制定“非遗”生产性保护信贷、税收、融资、土地使用等方面的扶持政策。实施公司+传承人+政府+农户的“非遗”产业化模式，统一组织、策划、营销和监管。对传统手工艺者进行补偿，根据不同条件以免费或减免房租形式安排“非遗”传承人从事传统手工艺文化经营并挂牌保护，有效保护、展示和传承“非遗”。四是加强对代表性传承人的动态管理和监督，定期总结、定期考核评定，创造和谐稳定的“非遗”传承发展的文化生态环境，使各级传承人能够乐于传承、安于传承、享受传承。通过严格考核和筛选，选择有一定“非遗”传承及保护基础的年轻人成为传习人，壮大传承接班人。

2. 健全人才培养培训机制，提升管理队伍和传承人整体素质。“打铁必须自身硬”，“非遗”传承及保护关键靠人才。一是着力解决“非遗”工作人员编制问题，增加“非遗”机构的人员编制，在公务员或事业单位招聘中细化“非遗”的岗位专业设置。充分利用省州内外的高校、科研院所及相关文化机构的力量，坚持“引进来”“走出去”培养相结合，有计划地引进和培养一批专业扎实、具有奉献精神的“非遗”传承保护工作队伍。二是进一步加强对“非遗”工作队伍的培训提高，加大对乡镇文化站人员的业务培训力度，提升其专业知识和信息化技术水平。建立“非遗”培训基地，创新培训方式，优化培训内容。三是依托对口支援的上海高校、科研院所，通过选派交流挂职、举办“非遗”培训班等方式，提升其工作能力和综合素质。四是着力培养本土“非遗”的“田专家”“土秀才”，坚持传统的师徒传承和现代教育定向培养相结合，积极为“非遗”传承人提供外出进修学习并获取学历和职称机会。加快制定“非遗”人才培养制度、拜师授徒制度、高龄传承人的抢救保护制度等。

（三）打好“非遗”与旅游开发“组合拳”，促进可持续发展

“非遗”是旅游的重要内容，旅游的可持续发展离不开“非遗”资源的反哺和支撑，“非遗”传承及保护与旅游开发有着共同的生存空间和实施主体。应坚持科学规划，正确处理“非遗”的保护与开发、传承与创新的关系，把“非遗”传承保护纳入到全域旅游发展规划中，深化生产性保护的实践，在保留“非遗”原有的文化底蕴和内涵的前提下，大力发展“非遗”旅游业，适度开发和盘活“非遗”文化资源，推动“非遗”产业化、生活化、现代化，提升“非遗”商业价值和附加值，实现“非遗”传承及保护与旅游发展良性互动，以传承保护带动开发，以开发促进传承保护，激发“非遗”的活力和生命力，促进“非遗”资源向旅游产品转化。

（四）拓宽融资渠道，完善文化金融服务体系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非遗”项目实施经费是开展传承保护工作的基本保障。首先，应加大对“非遗”传承保护的财政投入，设立“非遗”保护专项资金，为“非遗”事业发展提供经费保证。其次，以政府出资为主、民间出资为辅，建立“非遗专项保护基金会”，通过组织慈善、募捐等多种方式多方筹措资金，为“非遗”的深入调研、资料收集、影像制作、书籍出版、研习所的建设和宣传推介等提供物质保障。再次，用好涉藏州市各项对口支援、“三区三州”深度贫困区

的政策和机遇,将更多的财力、物力、人力引导到“非遗”传承及保护工作中来。同时,完善文化金融服务体系,通过特许经营、独资、合资、参股、合作等方式拓宽融资渠道。除政府投入外,要制定补贴、信贷贴息、税收减免系列优惠政策,引导、鼓励民间力量对“非遗”的投资、资助和捐赠。

(五) 多措并举,构建传承及保护长效机制

1. 从学校教育抓起,推动“非遗”保护教育进校园、进教材、进课堂。“社会公众特别是年轻一代参与保护的程度上从根本上决定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未来命运。”^①所以,应加强对中小学生的“非遗”文化的宣传教育,分阶段适当将民族文化教育、“非遗”课程纳入义务教育范畴,融入中小学的思想道德、文化知识、艺术体育、社会实践等各个环节中。积极编制“非遗”乡土特色教材,教材中增加传统风俗习惯、民族文化等课程,课外活动鼓励学生学习民族舞蹈、传统体育,制作“非遗”民族手工艺和阅读“非遗”民间文学等。利用校园文化宣传栏、教室板报、校园广播、主题讲座、课余活动等方式,讲好身边“非遗”故事、“非遗”人物、“非遗”项目,深化“非遗”的学校教育传承。

2. 建章立制,加快“非遗”法治化、规范化建设。一方面,以《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云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知识产权法》等法律法规为基本遵循,用足、用好、用活民族自治地区立法,制定完善“非遗”传承及保护的法律法规,规范政策措施,明确“非遗”的权利和义务主体,依法打击破坏“非遗”的行为。提高“非遗”成果知识产权的保护,保护“非遗”的注册权、使用权等,防止对“非遗”创作、保护和利用的剽窃。另一方面,建立规范的“非遗”经营审批制度,用制度约束、指导、监管经营行为。

3. 建立长效机制,实施科学管理。坚持重点突破和统筹兼顾相结合,坚持整体性保护、生产性保护和抢救性保护相结合,坚持活态保护和原生态保护相结合,加快建立“政府主导、专家指导、社会参与、社区为主、学校加入、党组织示范”的长效传承保护机制。要坚持与时俱进,不断地丰富和发展“非遗”的内涵,大胆创新“非遗”的表达方式和表演形式,增加“非遗”的艺术的厚度与价值的张力。坚持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相结合,拓宽“非遗”宣传展示空间和传播途径。建立利益补偿和利益联结机制,分类保护、因地制宜,实现“非遗”传承及保护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责任编辑:刘林华

^① 王文章:《增强非遗保护的文化自觉》,《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9月14日,第1版。

以微显宏：名人故居的国家叙事与文化实践

——以昆明市聂耳故居为例

罗夏梓平，孙俊烈

（四川旅游学院，四川 成都 610100）

摘要：名人故居作为国家叙事的产物，是以“记忆”的方式来重塑历史，并构建符合时代价值的民族精神和跨时空的社会影响。聂耳故居的国家叙事是通过物质景观文本、语言文字文本、仪式行为文本三种叙事路径，以凝练出具有爱国主义教育和社会宣教的空间话语。由此，聂耳故居成为国家话语体系的“道德原则”的生产，并在人民大众的文化实践中不断丰富其国家叙事的内容，进而在国家与不同社会群体的互动中构建起多重话语的文化实践，以共同指向聂耳及其精神的认同。

关键词：名人故居；国家叙事；文化实践；聂耳；民族精神

中图分类号：K928.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2811(2022)02-0099-08

名人故居的核心要素是已故历史名人和所居住过的场所。“名人”一般是在一定时期，一定区域发挥过较大作用且具有影响力的人物。“故居”则是名人曾经居住过的场所。它既包括名人出生地及其自有居所，也包括其他与名人人生、社会重要阶段相关的住所。因此，结合前述界定名人故居，应注重历史名人的人生经历与居住场所的关系及其社会价值而定。

名人故居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空间，与历史建筑旧址、工业遗产旧址等归属于旧址博物馆。^①三者的区别主要在于纪念的对象不同。历史建筑旧址侧重于展示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历史事件等承载某一传统文化的代表性建筑；工业遗产旧址则侧重于展示特定历史时期，人们为生产活动而建设的各类具有代表性的建筑。两者主要是通过纪念旧址建筑还原历史风貌和获取历史文化知识。而名人故居旧址主要纪念特定的历史人物及其与之日常生活和社会活动相关的历史贡献与社会价值。作为一种微观人物史，它所体现的精神文化价值成为跨越时空的社会影响。在国家意识形态的建构中，历史名人的一生依托物质性的建筑景观展示转化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符号。

现阶段国内学界关于名人故居的相关研究主要以保护和开发两种路径为主。比如，丁超、张

基金项目：四川旅游学院2021年度校级科研项目“作为‘叙事’的名人故居研究——以昆明市聂耳故居为例”（2021SCTUSK36）。

作者简介：罗夏梓平，四川旅游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现代民俗学、文化人类学；孙俊烈，四川旅游学院学生，研究方向为叙事翻译学。

^① 单霁翔：《实现保护性再利用的旧址博物馆》，《东方博物》2011年第1期，第4页，第5—21页。

秀娟从理论上提出了名人故居的认定和保护原则;^① 常青、王云峰从建筑学的角度探讨名人故居的保护,提出了“谦卑”修景的观念;^② 刘敏从建筑遗产的公众参与机制出发,探讨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保护路径;^③ 唐德彪、方磊利用加权合成法评价名人故居的旅游开发;^④ 沈实现、李春梅、徐华用系统考证、实测的方法对杭州名人故居进行分类评价,提出了名人故居景观、文化与经济系统发展的原则;^⑤ 黄林、张建华、郭安禧运用 IPA 等方法进行游客满意度调查,从而提出名人故居四种旅游发展策略。^⑥ 总体来看,学界对名人故居的研究较为统一,较少出现国家层面对名人故居的叙事研究。基于此,本论文将以昆明市聂耳故居为例,探讨名人故居如何从物质实体转化为符合国家叙事的精神文化。

一、名人故居与国家叙事的关系

叙事,就是“讲故事”,是对发生之事的重述。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叙事强调的是一种话语模式,它将特定的历史事件序列依时间顺序纳入一个能为人把握和理解的语言结构,并赋予意义。^⑦ 由此来说,叙事的目的在于构建一种有效的沟通方式及其意义结构。

国家叙事是基于特定国家构建的一种话语模式,它支撑着国家的存在,并推动着社会的运行。日本心理学者岸田秀认为,国家叙事在于囊括大多数国民的情绪以保持一致性,并对内给予国民荣耀与价值观的支持,对外得到别国的认可。这样,国家叙事才能在认知上实现连续性。^⑧ 笔者认为,国家叙事的内容应该注重历史的“人文关怀”。这一叙事思想在于肯定人性和人的价值,以最大限度获得国民的共鸣与成就感。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国家叙事的历史积淀性。叙事内容应承载着国民整体的历史记忆,体现集体的人文精神;另一方面,国家叙事的“人文关怀”。叙事内容要贴近民众的生活,让民众真切感受到叙事的“真实”,也就是要有“从民众中来,到民众中去”的叙事思维。因此,具有历史“人文关怀”的国家叙事不仅构建一种民族文化自觉与文化认同,还成为独特文化魅力的对外展示。

名人故居记录的是历史人物的生平及其与时代发展的关系,属于一种微观人物史。将其居所置于国家叙事中,采用一种“同在下性”取代“时序性”的话语模式,将历史人物的私人空间进行公共空间移位。名人故居得以成为一种叙事文本,具有明显的后现代叙事手法。西摩·查特曼区分了“故事空间”与“话语空间”,认为前者是故事或行为发生的当时环境,往往具有故事中人物的视角。后者是叙述者的空间,是叙述者的视角或物理位置。两者组成了叙事文本的“指示中

^① 丁超、张秀娟:《北京名人故居的三重属性及其认定与保护原则》,《北京社会科学》2006年第8期,第3—39页。

^② 常青、王云峰:《梅溪实验——陈芳故居保护与利用设计研究》,《建筑学报》2002年第4期,第22—25页,第68页。

^③ 刘敏:《天津建筑遗产保护公众参与机制与实践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天津大学,2021年。

^④ 唐德彪、方磊:《名人故居旅游开发的综合评价:方法与实证》,《怀化学院学报》2014年第6期,第20—24页。

^⑤ 沈实现,李春梅,徐华:《地域景观·城市记忆——杭城名人故居的景观特质与保护开发》,《城市规划》2005年第9期,第55—59页。

^⑥ 黄林、张建华、郭安禧:《上海名人故居游客满意度分析——以上海鲁迅故居为例》,《上海商学院学报》2014年第5期,第73—80页。

^⑦ 彭刚:《叙事、虚构与历史——海登·怀特与当代西方历史哲学的转型》,《历史研究》2006年第3期,第23—38页,第189页。

^⑧ [日]岸田秀:《ものぐさ精神分析》,东京:青土社,1977年,第27页。

心”，即叙事时空分别指向了有机本原与出发点。“视角”和“聚焦”是查特曼叙事模式的核心。^①由此看来，从普通民居旧址到名人故居的“标签化”，所呈现的是“故事空间”到“话语空间”的不同空间指向，以形成微观人物史与宏观的国家叙事的关系。因此，名人故居的国家叙事是基于具体的历史人物及其居所作为媒介的叙事策略。

名人故居作为具有纪念意义的旧址博物馆，在国家叙事中承载着民族的集体记忆。莫里斯·哈布瓦赫将记忆视为一种社会产物，个人记忆被圈定在一种“现实感”的集体记忆框架中。他认为：“社会思想本质上是一种记忆，它的全部内容仅由集体回忆或记忆构成。这其中只有那些在每一个时期的社会中存在，并仍然在其现在的框架当中运作的回忆才能得以重构。”^②正如名人故居叙事空间的转变是国家精神文明建设和文物保护事业发展的具体要求，在新的社会环境和社会机制中，国家叙事的建构策略赋予了名人故居新的“话语空间”，从而渗透到社会观念系统中成为一种文化象征符号。而作为一种记忆场，名人故居依托物质化的空间展示，表达着特定的国家叙事“知识”。从视觉的印象到思想的内化，这种集体记忆模式就更具有稳定性，也得以实现跨时空的共存。

二、聂耳故居国家叙事文本的建构路径

聂耳故居位于昆明市五华区甬道街73、74号。其始建于光绪十年（1884年），系重檐店铺房。光绪三十年（1905年），聂耳的父母从玉溪来到昆明，租住于此并开设了一个小医馆，取名“成春堂”。1912年2月14日，聂耳出生于此，他的童年基本在这里度过。1986年7月，聂耳故居被列为区级文物保护单位；2003年12月18日，升级为云南省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010年，聂耳故居进行修复；2011年，成立昆明聂耳故居纪念馆；2012年，聂耳故居挂牌设立为云南省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教育基地。

聂耳故居的历史考证、资料整理、建筑修缮等都与国家叙事文本的建构路径紧密相关。它展现的是这个时代国家的“话语空间”与集体记忆。聂耳谱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以高昂激越、铿锵有力的旋律不断激发爱祖国、爱人民、自强不息、勇往直前的情感和精神，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与自豪感。2003年10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被正式赋予宪法地位。^③聂耳的形象正如《义勇军进行曲》一样，成为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在国家叙事文本的建构中，聂耳故居承载的是民族精神与进步文化。

聂耳故居采取史料实证的历史叙事与民俗叙事相结合的方式，通过历史考证、文献查阅、深度访谈等方法进行国家叙事文本的建构。最终，聂耳故居呈现出物质景观叙事文本、语言文字叙事文本、仪式行为叙事文本三种。

（一）聂耳故居的物质景观叙事文本

聂耳故居与其他类型的博物馆一样，强调的是“人”与“物”的关系。“物”在博物馆的展示空间中被构建成景观叙事文本。简·塞特斯怀特根据杰克逊的设计提案《Jackson Street: Engaging the Narrative Landscape》提出了“叙事景观”一词，用以表达景观中的记忆、视觉参考与体验

^① David Herman et al.: *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Narrative Theor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5, p. 552.

^② [法] 莫里斯·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毕然、郭金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13页。

^③ 吴北光：《几度沧桑话国歌》，《人民日报》2004年3月31日，第9版。

三层意义。^①意味着,名人故居中的景观叙事文本是将历史故事浓缩于物态的景观设计中,以“讲故事”的形式述说过去,以拉近时空距离,唤起集体记忆。因此,时间在空间中的物质化是国家叙事的首要方式,也是体现名人故居各要素的主要手段。实际上,“景观”既是一种稳定的社会角色,又是一个综合的叙事系统。从聂耳故居的景观设计来看,主要呈现历史建筑、馆藏民俗文物和图片两类。

1. 历史建筑景观叙事

自2004年以来,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各级文物主管部门多次对聂耳故居的历史状况进行了详尽考证,并制定了《聂耳故居修缮方案》。2007年5月,云南省文物局同意《聂耳故居修缮方案》。修复后的聂耳故居复原了1912年时的原貌,被开辟成聂耳故居陈列馆,并于2011年6月23日重新对广大市民游客开放。

居伊·德波在《景观社会》中指出,这是一个“符号胜过实物、副本胜过原本、表象胜过现实、现象胜过本质”景观堆积的颠倒时代。^②聂耳故居从最初商住两用的木结构生活居所发展成为当下具有博物馆、旅游、教育等功能为一体的景观建筑,其本身已经改变了建筑的叙事方式。基于国家精神文明建设和文物保护的需要,相关部门充分利用建筑的日常生活“故事空间”进行国家“话语空间”的改造,将具有国家叙事特点的学术知识、文化知识融入其中,并结合昆明老街的商业、旅游开发,以形成政府主导下的多重文化功能诉求。就此,聂耳故居作为文物被修缮、保护,不仅成为民族精神和集体记忆的象征符号,还构建出具有建筑美学价值的区域性经济发展模式。

聂耳故居作为一种景观叙事的“物的语言”,在集体参与中成为不同民众身临其境的“人的语言”。在从微观的日常生活建筑到宏观的名人故居的界定,国家叙事为其提供了新的定位,使之以媒介的形式在“集体凝视”中引导思想、表达情感,从而创造出新的话语符号。

聂耳故居既是一座传统民居又是一座小型博物馆。其无论以什么身份呈现,都具有“容器”的功能。虽然在容纳个人日常生活和历史建筑景观时有着不同的叙事指向,但它都与不同时代产生着紧密的联系,并内蕴具有民族精神的“家国同构”的国家叙事思想。

2. 馆藏民俗文物和图片的景观叙事

聂耳故居中的民俗文物和图片内容展现的是特定时期民间社会生活的真实写照。其“物”的表征下隐藏着深刻的民俗文化内涵及其新的文化指向。关昕认为:“民俗器物被嵌入不同时期的公共文化结构里,体现了对传统日常生活差异性的文化转译。”^③因此,当历史遗物及图片背后应有的活态“故事真实”成为博物馆中的静态“话语真实”时,它所赋予的是当代社会共有的价值与意义。聂耳故居中的“物”不再是民俗意义上的认知重塑,聂耳的生活与社会的关系所体现出的民族精神被肯定、凝练、强化于国家叙事中,成为一种新的景观叙事。

聂耳故居中所展示的民俗文物和图片采用的是博物馆中常见的“陈列语言”模式,也就是通过模型、图片、雕塑、照片等实物向观众交流思想的工具。^④聂耳故居中收藏了聂耳和家人生前使

① 陆邵明:《浅议景观叙事的内涵、理论与价值》,《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美术与设计)》2018年第3期,第59—67页,第209页。

② [法]居伊·德波:《景观社会》,王昭风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57页。

③ 关昕:《从生活日用到文物藏品——民俗器物博物馆化的话语表征与意指实践》,《中国博物馆》2014年第4期,第45—52页。

④ 张翊华:《博物馆陈列语言的探讨——文字说明在陈列语言中的地位和作用》,《江西历史文物》1983年第4期,第52—55页。

用过的家具、日用品、乐器等富有生活气息的器物以及大量的人物图画、照片等生活图片。一楼入口厅房的左侧是聂耳父亲聂鸿仪的医馆，里面摆设了行医需要的桌椅板凳等器物。医馆正上方二楼是聂耳父母的卧室，里面摆设了睡柜、桌凳、箱子、梯子等日常家具、用具。一楼入口的厅房和右侧房间及其对应二楼的两房间主要展示了聂耳和家人的大量生活图片。同时，展柜中还放置了一些聂耳生前使用过的各类乐器、日记本、创作歌曲手稿复制品。这些复制品虽然不是历史的真实，但它们起到辅助展览，并帮助参观者理解的作用。在故居院子中，放置了一个石头水缸和一些盆栽植物，这些实物景观设计旨在还原民居中的样貌和体现生活气息，以丰富景观叙事内容。

聂耳故居中的民俗文物和图片建构出可视化的国家叙事符号。从聂耳吹小号、弹钢琴、参加求实小学乐队等与音乐相关的活动图片展示，到聂耳使用过的笛子、小提琴等器物展示，都是围绕“人民音乐家”这一主线展开叙事。这些物质景观所体现出的“生活真实”被归指向聂耳最为朴实的艺术人生与爱国情怀。国家叙事的符号化与生活化，从视觉上构筑起了历史与当下的生活联结，致使参与者在体验式的叙事交流中产生情感共鸣。

（二）聂耳故居的语言文字叙事文本

聂耳故居的语言文字叙事文本主要来自于文献史料和口述史记录，两者都属于“历史记忆”的范畴。王明珂认为，历史记忆包括“社会情境”（社会群体的资源共享与竞争关系，它与相关的族群、性别或阶级认同与区分）和“历史心性”（遵循的材料与叙述模式）。^① 聂耳故居基于国家在场的影 响，将凌乱、片断、无体系的文献史料和口述历史进行再次组织、选择与综合，形成新的国家叙事方式，用以构建一套符合当代国家价值体系的“故事线”，并在新的“社会情境”和“历史心性”中赋予聂耳故居新的社会认同体系。

聂耳故居正门口厅房前挂着一幅巨型的聂耳头像照，照片中的聂耳西装革履，是旧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典型装扮。照片上方写着“人民音乐家”五个大字，这与党的根本宗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有着共通性。两者所体现出的先进性和革命性形成互构，这为聂耳故居的国家叙事奠定了基调。由此，在以“人民音乐家”为中心的叙事中，通过《义勇军进行曲》由抗日战歌到国歌的形成、发展，来诠释聂耳的人生轨迹与中国革命及其国歌创作的关系。

聂耳的生平叙事依次分为“诞生与童年”“不朽的乐章”“生命的绝唱”三个部分。每一个部分的叙事内容都与音乐紧密相关，并串联成一条“故事线”。“诞生与童年”侧重叙述了聂耳的家庭与出生；慈母的言传身教对聂耳思想品德的形成；母亲讲故事融入民族音乐玉溪花灯对聂耳音乐爱好的启蒙；聂耳求学阶段不仅积极投身学生运动，还参加各种音乐活动，学习各类乐器。这些叙事内容为之后聂耳投身革命，谱写革命歌曲埋下了伏笔。“不朽的乐章”叙述了聂耳离开昆明前往上海工作的经历，侧重描述了聂耳对音乐的执着追求及其如何投身革命，并自觉地将自己在音乐上的发展与革命进步事业紧紧联系在一起。同期，聂耳走进群众中间，去体验和熟悉生活，创作了大量进步歌曲。《义勇军进行曲》便是这个时期的作品之一。这些内容虽然叙述了聂耳的革命事业与音乐的关系，但其中蕴涵着深刻的爱国主义思想。“生命的绝唱”主要叙述了聂耳人生最后的作品《义勇军进行曲》的定稿过程及其在日本鹤沼海滨不幸罹难，其骨灰安葬于昆明西山。同时，罗列出了聂耳1932—1935年期间创作的35首歌曲和4首器乐曲。这些乐曲以高昂的革命热情，揭露了社会的矛盾，唱出了大众的心声，具有很强的冲击力和感染力，是我国音乐史上不朽的乐章。总体来看，三个部分对应着“（出生）成长—成熟—死亡”三种人生阶段。无论从叙事

^① 王明珂：《历史事实、历史记忆与历史心性》，《历史研究》2001年第5期，第136—147页，第191页。

内容还是思想内涵来看,都呈现层层递进的关系。

聂耳故居的语言文字叙事材料所遵循的是个人与国家的共同性原则。这是从微观到宏观的国家叙事策略,目的在于将较为局限性、私人化的历史文献和口述历史转化为公共性资源分享,以在国家叙事中构建社会权力关系下的社会记忆产物。

(三) 聂耳故居的仪式行为叙事文本

聂耳故居作为一种特殊的意义空间,与当时的人类活动密切相关。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认为,我们只有在时间和空间的条件下才能设想人和真实的事物,它们构成一种相关联的框架。^①由此来看,聂耳故居的时空框架,凝聚着这个时代人们的共同主题与思想,并伴生出各种人类仪式活动。罗兰·巴尔特认为,空间的隐喻方法要比抽象定义更为重要。其作为特殊的容器,本身并无定义,但通过选择、排列、充实化来决定其意义。^②这意味着,物质空间的表征背后隐藏着人类意义的本身。时代的发展与社会的变迁,造就了建筑本身由微观“人间烟火”向宏观“象征符号”的功能转变。聂耳故居的空间设置体现出国家意识形态的话语建构,从而通过其空间设置凝练出“聂耳精神”的国家话语隐喻。正如日本建筑理论家香山寿夫所言:“场所就是在不断迭加的过程中,各种事情都在那里发生的地方,是一个将人类集团统合为一体的地方。场所是共同体的依靠和支柱。”^③因此,聂耳故居的国家叙事旨在构建公共的文化教育场所,以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聂耳故居的仪式行为叙事主要通过纪念性活动和各类主题文化活动来实现。

第一,纪念性活动。聂耳故居承载着记忆过去、缅怀历史、启迪当下、开创未来的多重社会责任。作为云南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聂耳故居每逢相关的纪念时间节点,便会迎来各类社会群体的纪念行为。比如,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民众参观聂耳故居,通过对聂耳生平和国歌诞生的了解强化了对历史的记忆,实现了自我的革命精神洗礼和对国家和先烈的崇敬;国庆日,由各县、区退休文艺工作者组成的聂耳故居音乐组通过演奏聂耳身前所创作的音乐作品,弘扬聂耳文化、传承聂耳精神,同时表达对祖国的热爱;国际博物馆日,省、市、区相关文旅部门打造的博物馆旅游活动,将聂耳故居纪念馆融入其中,不仅探寻昆明历史街区的风貌,还回顾了云南革命的历程。这些围绕聂耳故居开展的纪念性活动强化了人们对“聂耳精神”的记忆,通过政府的引导和民间社会的自发组织,形成“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各类纪念活动,进而在追忆历史的同时完成了民族精神的传承、个人道德的教化以及国家构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第二,主题文化活动。聂耳故居作为物质遗产和史料记忆场,在国家叙事中成为思想道德教育实践基地。依托主题讲座、专题宣讲、青年团校等形式,充分挖掘聂耳故居的红色文化资源。社会各界群体、机构单位每年都会开展各式各样的党建、团建等主题活动。比如,聂耳故居所在的昆明老街区建立了党群活动服务中心,打造了“党建+红色旅游”为主题的品牌,将老街的历史文化与红色基因融入到区域的经济发展中,在传承“聂耳精神”“革命精神”“爱国主义精神”中构建诚信道德的良好公共秩序。同时,昆明市五华区制定了《关于“党建引领、红色文创、爱党爱国”项目的实施方案》,以构建独具特色的党性教育品牌。五华区的长春小学作为聂耳的母校联合聂耳故居打造昆明市红色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并建成“聂耳精神教育基地——壮志摇篮”主题景观与“聂耳文化走廊”两项文化设施。以聂耳故居为中心开展的各项主题文化活动,成为“聂耳精神”新时代的传承方式。

① [德] 恩斯特·卡西尔:《人论》,甘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第58页。

② [法] 罗兰·巴尔特:《符号学历险》,李幼蒸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68页。

③ [日] 香山寿夫:《建筑意匠十二讲》,宁晶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6年,第135页。

三、聂耳故居的文化实践

国家叙事语境下的名人故居是以“记忆”的方式来重塑历史。作为一种记忆性的理性活动，在“回忆过去”时，往往以现实社会的国家价值体系为取舍标准对历史人物及其事件去芜存菁。英国心理学家弗雷德里克·巴特莱特认为，当我们回忆并重述一段历史故事时，我们是在自身的社会文化“心理构图”上重新建构这个故事。^①意味着，我们所重塑的故事是基于叙事者心理倾向的意义生产。聂耳故居的国家叙事正是国家话语体系中的一种文化实践，其所建构的是国家意义的“记忆之场”。一般而言，社会记忆是人类维系文化传承的基础，而任何一种社会记忆都是不断被重新建构的。^②这种重新建构的过程正是一个时代的文化之需，也是国家维系民族共同体的实践之路。

聂耳故居的文化实践是一个生产的过程。生产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方式，也是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分析概念。人类生产包括三个层面：即物质生产（吃穿住行等基本需求）、人类自身的生产（种的繁衍）、精神生产（文化生活的需求）。这三种生产分别对应了“个人的生命的生产”、“他人生命的生产”、“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③聂耳故居正是国家对个人生活史的再生产过程及结果，使之体现国家的意识形态。当地政府通过“生产”的概念将历史和时间统一到具体的空间中，以形成国家的意义生产与社会价值相统一的文化空间。正如法国马克思主义学者亨利·列斐伏尔提出“（社会）空间是（社会）产物”，^④用以说明文化空间是人类主体的有意识的活动产物。聂耳故居的空间生产具有历史性，它是在历史的进程中被赋予了人类社会实践、知识、概念的构造及其结果，并在社会的变迁中扮演着某种社会化的角色。聂耳故居在国家话语体系中的文化生产包含着两个层面：一是民族精神的建构，二是不同社会群体的文化实践。

（一）聂耳故居的民族精神建构

1951年10月，国家文化部颁布了《对地方博物馆的方针、任务、性质及发展方向的意见》，并提出博物馆是进行革命的爱国主义教育，通过博物馆让人民大众正确认识历史，认识自然，热爱祖国，提高政治觉悟与生产热情。^⑤这为新中国的博物馆事业奠定了教育发展之路。不仅如此，早在1895年，世界最大博物馆机构的创始人詹姆士·史密森也强调，博物馆的使命在于研究其专题，并以此来教育人。^⑥因此，名人故居作为博物馆的一类，所承担的主要功能是纪念，而纪念是为了实现宣教的目的。

聂耳故居作为公立性质的纪念馆，采取的是地方文物行政管理部门的管理体制。这为聂耳故居的文化生产及其社会运作建立起了正当性基础。聂耳故居的国家叙事以聂耳“人民音乐家”的形象为中心而展开，隐含着国家话语体系的“道德原则”，体现出了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国家叙事通过一个微观的人物史来表现宏观的革命服务精神，由此上升到中华民族精神的道德标准。而当地政府针对聂耳故居进行的故居修缮、文献查阅、民俗文物收集、口述史记录、专家论证等“输入”性的文化建构，才得以“生产”出具有爱国主义教育价值的文化空间。

① Frederic Charles Bartlett. *Remembering: A Study in Experimental and Social Psychology*,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32, pp. 199-202.

② 王晓葵：《记忆论与民俗学》，《民俗研究》2011年第2期，第28—40页。

③ 李益蓀：《马克思“艺术生产”理论研究》，成都：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2010年，第96页。

④ Henri Lefebvre: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Oxford: Basil Blackwell Ltd, 1991, p. 26.

⑤ 单霁翔：《关于博物馆的社会职能》，《中国文化遗产》第1期，第6页，第8—25页。

⑥ [美] 乔治·埃利斯·博寇：《新博物馆学手册》，张云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30页。

由此,聂耳故居在构建国家叙事主体与人民大众之间形成一种“会意空间”,以达成人民大众对国家叙事内容的理解。这一空间的叙事从聂耳的音乐之路到革命之路的发展过程,凝结出中华民族革命精神的乐章——《义勇军进行曲》。这一文化生产方式取材于人民大众耳熟能详的国歌,才得以将最为个人化的故事在这个意义上成为了公共叙事资源和公共话语的一部分。^①这是一个国家为弘扬民族精神,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所必须具有的共同历史与文化基因。

(二) 聂耳故居在不同社会群体中的文化实践

聂耳故居作为国家叙事的静态物象,在不同社会群体中构成多重话语的文化实践,从而共同指向聂耳及其精神的认同。“认同”一词源于心理学,由弗洛伊德最先提出,意指个人与他人、群体或模仿人物在感情和心理上的趋同过程。^②认同具有社会性,它是形成文化互动的基础。国家重塑聂耳及其人物精神的文化空间,旨在形成具象化的民族精神符号,从而成为社会共同体成员对信仰和情感的分享,以维系社会共同体的内在凝聚力。

与此同时,聂耳故居将不同的社会群体与事件以某种方式组合起来,使之成为有意义的关系结构。作为云南省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教育基地,聂耳故居不仅仅局限于青少年的思想道德教育,它还将这一文化空间扩展到游客的参与体验,民间的纪念活动,社团、组织的爱国主义精神宣讲,聂耳音乐作品的传唱等多元化的文化实践。这些多重话语便构成了差异性的叙事文本,以进一步丰富了聂耳故居国家叙事的内容。因此,聂耳故居和不同社会群体在共同的历史记忆“生产”中不断强化民间大众对聂耳及其人物精神的认同,以丰富时代的内涵。

四、结语

聂耳故居的国家叙事与文化实践的目的在于保护历史文物和弘扬民族精神,这是具有文化传承和凝聚民族共同体精神的双重意义的文化事业。实际上,聂耳故居的国家叙事在于将个人生活史转化为国家层面的话语结构,以构建具有公共性的道德原则和价值体系。同时,个人的生活实践进入国家的话语体系中,表现为个人叙事与国家叙事的互构,呈现一种国家与个人的时空对话方式。

同时,聂耳故居的国家叙事还应注重国家与社会群体之间的交流与对话,以形成一种交流式的文化实践活动。只有这样,才能营造出聂耳故居自我生存、发展的空间和环境,也才是文物保护和民族精神传承的最好方法。由此,国家话语体系中的聂耳故居的保护与利用,有助于将物质性的遗产转化成国家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而以新的叙事方式实现新的认识和理解。

责任编辑:郭周静

^① 刘子曦:《故事与讲故事:叙事社会学何以可能——兼谈如何讲述中国故事》,《社会学研究》2018年第2期,第164—188页,第245页。

^② 陈国验主编:《简明文化人类学词典》,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26页。

云南故事

云南统一战线历史文化宣传宣讲的特色优势与实践路径

念兴昌

(云南省社会主义学院, 云南 昆明 650031)

摘要:做好新时代统一战线工作不仅要提高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实效,更要善于发出统战好声音、讲好统战故事。云南是统战工作的“大户人家”,统一战线历史文化资源富集。运用云南独特的历史文化资源讲好统战故事,就要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用唯物史观辩证分析云南统一战线历史文化;深入挖掘具有云南特色的统战历史文化资源;运用网络信息技术,创新统战历史文化宣传宣讲方式;构建具有云南特色的统战历史文化课程体系。善于主动发声,把蕴含在历史文化中的精神价值转化为推动统战工作的思想基础和精神动力,积极构建统一战线话语体系,为推动统一战线工作高质量发展构建良好的社会舆论生态。

关键词:统战历史文化;统战故事;宣传宣讲;云南特色;课程体系

中图分类号: D6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2811(2022)02-0107-08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对我们共产党人来说,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多重温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的伟大历史,心中就会增加很多正能量。”^①统一战线史是党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推进党史学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需要把统一战线历史作为“四史”学习、教育和宣传的重要内容。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把“坚持统一战线”作为我们党百年奋斗的十大历史经验之一,指出“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是党克敌制胜的重要法宝,也是党执政兴国的重要法宝”。^②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政治优势和战略方针,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重要法宝。统一战线历史是中国共产党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开展统一战线历史教育是党史学习教育的重要内容。在统一战线历史宣传宣讲中,我们要充分运用丰富的统战历史文化资源,讲好统战故事,发出统战好声音,把蕴含在历史文化中的精神价值转化为推动统战工作的思想基础和精神动力,从统战历史文化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在统一战线领域进一步增进文化认同,凝聚政治共识,培养文化自觉,增强文化自信。

基金项目:2019年度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青年项目“新时代云南新的社会阶层统战工作创新发展研究”(QN2019014)。

作者简介:念兴昌,云南省社会主义学院科研处讲师,研究方向为统一战线理论与实践。

① 习近平:《以史为镜、以史明志、知史爱党、知史爱国》,《求是》2021年第12期,第4—12页。

②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70页。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背离或放弃马克思主义，我们党就会失去灵魂、迷失方向。”^① 马克思主义决定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前进的正确方向，是我国意识形态的灵魂。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有丝毫动摇。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政治优势和战略方针，具有鲜明的政治属性。做好新时代统一战线领域意识形态工作，必须坚持和加强党对统一战线意识形态工作的全面领导，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坚持高举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旗帜，自觉承担起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

统一战线工作从本质上说就是特殊的思想政治和舆论引导工作。^② 开展统战历史文化宣传宣讲是做好新时代统一战线舆论引导的重要内容，是加强统一战线领域意识形态工作的必然要求。讲好新时代统战故事，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作为开展统一战线领域历史教育的重点任务。紧紧围绕以共识教育为核心、以文化认同教育为基础的工作要求，在统一战线领域加强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和统一战线史的教育和宣传，切实增强广大统一战线成员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和信心，以文化认同增进国家认同、民族认同，引导广大统一战线成员切实捍卫“两个确立”、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寻求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凝心聚力。

二、深入挖掘具有云南特色的统战历史文化资源

历史是映照现实、远观未来的最好教材。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历史虽然是过去发生的事情，但总会以这样那样的方式出现在当今人们的生活之中。”^③ 历史始终对现实和未来有着深刻的影响，统战工作方法、原则和经验都是在总结历史文化传统和经验中发展形成的。2020年春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云南时指出，云南有光荣的革命传统，有很多感人肺腑的动人故事。要把这些故事作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教育的生动教材，引导广大党员、干部不断检视初心、滋养初心，不断锤炼忠诚干净担当的政治品格。^④ 云南作为全国统战工作的“大户人家”，在多党合作、民族团结、宗教和谐、侨乡文化、非公经济等方面都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不同历史时期和发展阶段保留下来的历史文化遗产是我们开展统一战线历史教育的富矿，值得我们深入挖掘和研究。

（一）重点挖掘具有统战特色、体现云南特点的历史文化资源

分类整理统战历史文化资源，分析和研究其时代价值是做好统战历史文化宣传宣讲的基础。一是要挖掘利用好云南丰富的民族宗教历史文化资源“富矿”。“在云南，不谋民族工作就不足以谋全局”的思想理念已经成为共识。云南多民族团结和谐发展的历史进程与实践路径，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产生、形成、发展的一个缩影。我们要重点挖掘云南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多宗

① 习近平：《论中国共产党历史》，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第122页。

② 杨卫敏：《新时代统一战线概论》，杭州：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379页。

③ 习近平：《论党的宣传思想工作》，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第89页。

④ 《习近平春节前夕赴云南看望慰问各族干部群众》，《人民日报》2020年1月22日，第1版。

教和谐相处的历史文化，如世界文化遗产（丽江古城、红河哈尼梯田）、世界记忆遗产（丽江纳西族《东巴经》手稿）、民族团结誓词碑、少数民族特色村镇、宗教中国化的云南实践经验等云南独特的民族、宗教历史文化资源。

二是重点挖掘红色历史文化，传承红色基因。红色文化是统一战线历史文化的底色。要系统整理、分析和研究云南红色文化资源，传承云南光荣的革命传统。如针对红军长征过云南的历史，要依托红军长征渡江纪念馆、红军长征过丽江纪念馆、迪庆红军长征纪念馆、柯渡红军长征纪念馆、会泽县扩红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红军长征元谋纪念馆、扎西会议纪念馆等地方历史展览馆及相关历史遗址、旧址进行重点挖掘和研究。同时要注意保护地方红色文化，要针对不同历史时期形成的红色文化进行深入调查，根据不同主题、不同类型开展专项调查研究。

三是要深入研究云南近现代革命斗争历史，传承云南优良革命传统。云南近现代革命斗争实践是中国革命的重要组成。要充分挖掘重九起义、护国运动、滇西抗战、滇南抗战等近现代云南革命斗争历史，运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旧址、云南陆军讲武堂、滇西抗战纪念馆、松山战役遗址、南侨机工回国参与抗战历史（南洋华侨机工抗日纪念碑、南侨机工抗日纪念馆、南侨机工历史文化纪念馆等）、飞虎队历史（昆明飞虎队纪念馆、驼峰飞行纪念碑等）、国立艺专旧址等历史文化遗址和旧址，充分挖掘其时代价值和统战价值，在全省进行统筹整合，进行分类挖掘打造。

四是针对名人旧居保护开发，要结合统一战线教育培训需求，梳理云南历史上具有代表性的历史人物，充分利用好现存历史文化资源进行挖掘和研究。如楚图南故居、方国瑜故居、艾思奇故居、李群杰故居、冰心默庐、朱自清和闻一多旧居、周培源旧居、中国营造学社旧址、梁思成和林徽因旧居、华罗庚旧居、冯友兰故居、费孝通旧居、宜良县“钱穆著书纪念馆”、昆明龙院村惠家大院、浦在廷故居、刀安仁故居纪念馆、李根源旧居纪念馆、曲焕章旧居、梁金山故居、李和才故居等相关历史名人旧居、故居和遗址。另外，云南民族医药文化作为民族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广大统一战线成员关注的重要领域，值得我们高度关注和深入发掘，如加大对傣医药、藏医药等民族经医药文化的挖掘整理、研究宣传和传承保护。

（二）开展统战历史文化资源普查工作，建立统战历史文化资源数据库

云南统一战线工作底蕴深厚、历史文化资源充沛，但在实际利用和保护中并未形成专项的规划和统筹，仍未充分发挥丰富多样的历史文化资源优势。随着新时代统一战线工作形势和任务发展，开展统一战线历史文化资源普查十分必要，在技术上、政策上都已经具备了建立统战历史文化资源数据库的客观条件。一方面，要在全省开展统战历史文化资源普查，根据档案资料、历史古迹、重要文献广泛收集素材，针对党外人士、多党合作、民族团结、民族文化、宗教和谐、爱国爱教爱家乡、非公经济、新阶工作、留学人员、港澳台侨、侨乡文化、华侨农场等涉及统一战线各领域的历史文化资源开展调查和摸底，掌握全省统战历史文化资源地域分布、保护、开发、运用、研究等发展现状。另一方面，要根据不同主题、地域、历史发展阶段等主题进行分类统计，在调查摸底、仔细梳理、系统研究基础上建立统战历史文化资源动态管理数据库，运用大数据、云储存、5G技术、区块链等信息技术手段不断优化统战历史文化资源管理数据库建设，为进一步挖掘、研究、运用和宣传统战历史文化打下坚实基础。

（三）打造具有云南特色的统战历史文化资源集群

在具体实践中，挖掘和利用统一战线历史文化资源就是把统战历史文化建设纳入文化强省建设的具体行动和举措之中。要借助中华民族视觉形象工程、少数民族优秀文化保护传承工程和少

数民族文化精品工程、“文化润滇”行动等文化工程建设机遇,^① 打造具有云南特色的统一战线历史文化资源集群。同时,按照《云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的建设民族文化强省目标,把统战历史文化挖掘和宣传纳入建设民族文化强省战略布局,抓住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工程、云南文化精品“五个一批”工程等云南文化发展政策机遇,^② 把统战历史文化资源挖掘与云南长征国家文化公园、中国植物博物馆、云南革命军事馆、云南自然博物馆等全省重大文化基础设施和文化项目建设同步推进。深入挖掘和整合云南在不同发展时期的历史文化资源,特别是系统梳理和研究涉及统一战线领域的历史文化资源。把统一战线历史文化资源挖掘和利用与历史文化保护传承结合起来,根据云南省多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在城乡建设中加强历史文化保护传承的实施方案》中“构建一批多样性的享誉全国乃至世界的云南历史文化保护品牌”目标,统筹协调全省统战历史文化资源,把具有民族特色、地域特点和时代特征的统战历史文化资源整合起来,积极开展统战历史文化旧址、遗址、文物等资源的挖掘、保护和利用工作。借助全省推出的10条非遗主题旅游线路设计,有针对性地打造统战历史文化资源集群。

三、推动统一战线历史文化宣传宣讲工作创新发展

在统一战线领域进行历史经验总结、理论创新概括、实践经验探索等,都是推动党的理论创新的现实需要。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强调:“要加强传播手段和话语方式创新,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③ 开展统一战线历史文化宣传宣讲是加强统一战线领域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方法和手段,这项工作在政治性、政策性、历史性、原则性等方面都具有很高的要求。统一战线历史文化宣讲要与“四史”学习教育紧密结合起来,特别是正在开展的党史学习教育,坚持用唯物史观来认识和把握统一战线历史文化。加强思想引导和理论辨析,用详实准确的史料支撑和深入细致的研究分析作为统战历史文化宣讲的学理基础,用令人信服的高质量研究成果消除历史虚无主义的影响,在理念、方法、形式和途径等方面推动统战历史文化宣讲工作创新。

(一) 坚持用学术讲政治,丰富统战历史文化宣传宣讲内容

开展理论研究能够为宣传宣讲提供学理支撑,也是用学术讲政治的必然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善于从政治上观察和处理问题,使讲政治的要求从外部要求转化为内在主动”。^④ 统战工作对讲政治的要求更高,特别是要从政治上学习、研究和把握统一战线历史文化。“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主要是政治领导,即政治原则、政治方向、重大方针政策的领导,主要体现为党委领导而不是部门领导、集体领导而不是个人领导。”^⑤ 统一战线宣传宣讲工作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政策性和艺术性,这就必须要正确处理好政治性与学理性、政策性与实践性之间的关系,特别要突出宣传宣讲的针对性和时效性。“我们的统战理论研究,要面向实际,面向群众,这是理论用之不

① 《构筑各族群众共同的精神家园》,《云南日报》2021年11月29日,第5版。

② 《云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云南日报》2021年2月10日,第13版。

③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313页。

④ 习近平:《总结党的历史经验 加强党的政治建设》,《求是》2021年第16期,第4—12页。

⑤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政治建设论述摘编》,北京:中共文献出版社,第130页。

竭、取之不尽的生命源泉。”^①开展统战理论研究就要以统一战线历史文化资源条件为基础，结合云南工作实际和统一战线成员发展需要，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切实弄清“讲政治”的本质要求、核心要义、主要内容，始终围绕“人心向背、力量对比”这个最大的政治开展调查研究。

讲政治是开展统战历史文化宣传宣讲工作的根本要求。把讲政治要求融入统战历史文化宣传宣讲全过程，就要坚持用学术讲政治。一是构建统一战线话语体系。在涉及统战历史文化宣传宣讲工作中旗帜鲜明讲政治，用政治眼光和立场审视历史文化，把政治文本、学术话语和工作实际结合起来，把历史政治话语转化为学术话语、宣讲话语，形成独具特色的统一战线话语。“构建统一战线话语权，必须加强统一战线理论建设，不断创新统战话语内容，提升统战话语引领力。”^②挖掘地方统战历史文化资源是丰富和发展统战话语内容的迫切需要，更是推动统战理论创新的现实选择。开展云南统一战线历史文化宣讲不仅要讲清楚云南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发展阶段最具代表性的统战历史文化，讲清楚云南文化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和重要特征，更要以培育正确的历史观、价值观、文化观为导向，从现有的历史文化资源中发现云南的历史文化之美，并结合新时代“治理形态的统一战线话语表达”^③特征，深入研究和分析云南统战历史文化服务国家治理现代化，特别是助推边疆治理现代化的时代价值。

二是推进统一战线学科建设，为统战历史文化宣传宣讲筑牢学理基础。1945年，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指出：“统一战线是一门专门科学，我们党内有很多人还没有学会，很多人不善于同党外人士合作，我们要学会这门科学。”^④统一战线学是哲学社会科学中一门重要的学科，虽然还未建立完善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但全国统战部门、社会主义学院和部分高校都在积极探索，如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湖南省社会主义学院、内蒙古社会主义学院、山东大学、湖南师范大学等，都针对建立统一战线学科开展了积极的尝试。推进统一战线学科建设，既是用学术讲政治的迫切要求，也是增强统战历史文化宣传宣讲说理性、为统战历史文化宣传宣讲提供学理支撑的现实需要。

三是建立团结协作的宣传宣讲环境氛围，形成理论传播合力。统战历史文化宣传宣讲工作者要有传播效果意识，要充分调动广大统一战线成员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充分发挥人才荟萃、智力密集、联系广泛的优势，与他们团结协作，互相支持，配合发声。在理论研究上建立联合机制和集体攻关机制，聚焦云南统战历史文化特色和重点，比如，要把发现和宣传云南历史文化之美与宣传中华文化之美统一起来，将云南历史文化融入到灿若星河的中华文明之中，深刻阐释云南统战历史文化所蕴含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和时代价值，用精深扎实的学术研究成果推动统战历史文化宣传宣讲形式创新，丰富宣传宣讲内容，拓展宣传宣讲广度深度。同时，在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基础上广泛凝聚共识，形成正向舆论场的合力。

（二）创新宣传宣讲方式，激发统战历史文化宣传宣讲的内生动力

统战历史文化宣传宣讲要特别注重“讲事实、讲形象、讲情感、讲道理”，推动宣传宣讲方式创新。2016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指出：“讲故事就是讲事实、讲

^① 中共中央统战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仲勋论统一战线》，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340页。

^② 丁俊萍、颜苗苗：《新时代统一战线话语的建构》，《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3期，第1—14页，第181页。

^③ 李俊、蔡宇宏：《中国语境下统一战线话语表达形态的百年演进》，《统一战线学研究》2020年第5期，第1—8页。

^④ 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415页。

形象、讲情感、讲道理，讲事实才能说服人，讲形象才能打动人，讲情感才能感染人，讲道理才能影响人。”^① 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要掌握讲故事的技巧，从事实、形象、情感、道理四个维度把握讲故事的重点，这为我们讲好故事、把故事讲出彩提供了基本遵循。思想理念是行动的先导和动力，决定了行动的方向。统战历史文化宣传宣讲者要开放思想、与时俱进，积极适应新时代统一战线理论创新与实践发展的新要求，坚持因材施教、按需设教；同时，针对不同统一战线成员开展分众化宣讲，综合运用报告式、互动式、情景式等多种宣讲方式，改变传统的灌输式、“大杂烩”、单向式的宣讲方式，增强统战历史文化宣讲的吸引力、感染力，提高宣讲实效性。同时，要坚持以人为本，调动统一战线成员的积极性，让广大统一战线成员参与统战历史文化宣讲，推动由“单向灌输”到“双向交流”的转变。

（三）创新传播方式，拓展统战历史文化宣讲阵地

新时代统战历史文化宣传宣讲既要牢牢守住宣传宣讲主阵地，又要不断拓展宣传宣讲新阵地。2021年12月，根据第49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我国网民规模达10.32亿，互联网普及率达73.0%。^② 随着第四次信息技术革命的深入发展，微博、微信、QQ、B站等网络信息平台已经成为信息传播的重要途径。同时，网络媒体发展呈现“更科技、更开放、更实效”的特征^③，互联网络已变成社会舆论发展的重要场域，特别是自媒体迅猛发展，更需要运用新的互联网思维去占领宣传宣讲阵地。“自媒体时代政治传播的格局正在由一元主体主导向多元主体共享转变，与此相应，政治信息的生产与传播也正在由‘垄断’向‘共生’转变。”^④ 统战历史文化宣传宣讲是引导社会政治传播的重要内容，必须应对现代政治传播的这一新趋势。与其他历史文化不同，统战历史文化宣传宣讲不仅要旗帜鲜明地体现政治性、政策性、原则性和时代性，更要拓展宣传宣讲渠道，创新宣传宣讲方式，主动适应网络信息传播的新形态、新模式、新趋势。首先，要充分发挥统战部门、民主党派、社会主义学院（校）、统战团体等统战系统在宣传宣讲中的主阵地作用。各级统战部门、民主党派组织、社会主义学院（校）作为统战历史文化宣讲的主阵地，必须积极承担起宣讲统战历史文化的主体责任，在深入调查、挖掘和研究基础上做好统战历史文化宣传宣讲工作。其次，要充分发挥传统媒体对统战历史文化的宣传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适应分众化、差异化传播趋势，加快构建舆论引导新格局。要推动融合发展，主动借助新媒体传播优势”。^⑤ 分众化、差异化传播就要突出宣传宣讲的精准性、针对性和时效性。统一战线历史文化宣传宣讲要综合运用传统媒体与新媒体平台技术，主动适应融媒体发展趋势。在主流媒体开辟专栏，宣传云南民族历史文化、革命历史、统战历史和人物、多党合作历史、宗教历史文化等统战历史文化。最后，要用好微信、微博、客户端等新媒体传播媒介和平台，抢占新媒体宣讲阵地，“用开放的、平等的、共享的、技术引领的思维模式，创造出理论传播的新形态、新渠道、新模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212页。

② 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第49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2022年2月25日，http://www.cnnic.net.cn/hlwfzyj/hlwxzbg/hlwtjbg/202202/t20220225_71727.htm，2022年3月20日。

③ 国家信息中心：《2021中国网络媒体发展报告》，2022年4月25日，<https://mp.weixin.qq.com/s/in4E9YbbjJoxfbksL9q5gg>，2022年4月26日。

④ 荆学民、于淑婧：《自媒体时代的政治传播秩序及中国调适》，《政治学研究》2020年第2期，第14—26页，第124—125页。

⑤ 《习近平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强调：坚持正确方向创新方法手段 提高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人民日报》2016年2月2日，第1版。

式。”^①网络信息技术变革带来的全媒体时代，为立体化、全方位宣讲提供了便捷的技术条件，营造了有利的舆论氛围。统战历史文化宣讲既要做好集中式、专题式的线下宣讲和培训，更要善于运用全媒体资源，利用数字化技术手段，精准开展网络宣讲，推动构建线上线下一体、全方位多层次的宣讲大格局。

四、构建具有云南特色的统战历史文化课程体系

社会主义学院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性质的政治学院、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联合党校、统一战线人才教育培养的主阵地，肩负着开展政治共识教育和文化认同教育的重要职责。社会主义学院要积极发挥联合办学、开放办学的特色和优势，整合社会资源，组织开展统战历史文化研究，打造具有统战特色的历史文化课程体系，开展统战历史文化教育，增强政治共识，做好“立德树人”“培根铸魂”工作，精准讲好统战故事，及时发出统战好声音。

（一）开展统战历史文化专项课题调查研究

调查研究是宣传宣讲的基础性工作，开展专项调研是为了进一步提高宣传宣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要针对云南统战历史文化进行深入调查研究，设立统战历史文化专项课题，根据新时代统一战线教育培训工作要求和现实需要，组织专家、学者从统一战线视角对不同历史时期的云南历史文化资源进行深入研究，建设具有统战特色、体现云南特点的统战历史文化课程体系。比如针对云南革命历史、多党合作历史、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宗教和谐历史文化、红军长征过云南历史、西南联大教育救国历史、滇西抗战历史、滇南抗战历史、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抗战历史等开展专题调查研究。

（二）系统梳理和总结云南统一战线工作历史经验

系统梳理和总结党的统一战线理论、方针和政策在云南的实践经验，是构建具有云南特色的统战历史文化课程的基础。2022年是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政策提出100周年，也是统一战线事业开启第二个百年的重要一年。系统梳理和总结百年统一战线发展历程、历史成就和经验启示，对于深刻把握统一战线事业发展的内在规律，推动统战工作高质量发展，为推动云南高质量发展凝心聚力，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1926年11月，中国共产党云南特别支部正式成立，这是第一个中国共产党云南地方组织。从此，党的统一战线理论、方针和政策在云南的实践和探索就从未停止过，云南统一战线始终围绕党的中心工作在云岭大地不断发展壮大起来。一方面，要从党的统一战线百年发展历程大视角审视云南统一战线的发展历史。毛泽东指出：“我们研究党史，必须全面看，这样研究党史，才是科学的。”^②统一战线历史是中国共产党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云南统一战线历史是党的统一战线历史的一个章节，我们需要在党的百年奋斗历史、统一战线百年发展历程中去研究和总结云南统一战线的历史经验和启示。

另一方面，要重点总结云南统一战线在不同历史阶段取得的重要成就和历史经验。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云南统一战线工作都是始终围绕党的中心工作来开展的，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都积累了很多工作经验，取得了许多历史成就，比如，抗日战争时期，针对地方实力派的统战工作，促成了云南地方实力派积极参与抗日战争；海外华侨也积极参与抗战，涌现出了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这样的统战英烈；在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掀起了爱国民主运动高潮，使昆明发展

^① 董山峰：《讲好中国故事要做五个创新》，《学习时报》2018年7月23日，第A4版。

^② 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06页。

成为“民主堡垒”；云南解放后，在“团结第一，工作第二”的工作方针指导下，慎重稳进地开展民族宗教工作；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民主党派在云南建立地方组织的工作取得了较大进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云南在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创建和脱贫攻坚专项民主监督等方面都交出了靓丽成绩单。同时，还要以此为基础，结合云南统一战线在各个历史时期发展的特殊性，系统梳理和总结云南统一战线的历史经验和启示。

（三）构建具有统战特色的历史文化课程体系

社会主义学院的教学工作“以政治共识教育为核心、以文化认同教育为基础、以能力素质培养为重点”，是打造统战历史文化课程体系和学科建设的重要主体。在统一战线领域开展政治共识教育、文化认同教育和能力素质培养是社会主义学院的中心工作，构建具有统战特色、体现云南特点的历史文化课程是社院教学工作的重要任务之一。社会主义学院要认真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和省委印发的《关于贯彻〈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的实施意见》、《社会主义学院工作条例》和省委印发的《贯彻落实〈社会主义学院工作条例〉实施细则》，充分挖掘云南统战历史文化资源，在深入研究基础上，构建符合新时代统一战线教育培训需求、具有云南特色的统战历史文化课程体系。一方面，要在社会主义学院教育培训中开设统战历史文化专题课，把云南革命斗争历史、民族历史文化、多党合作历史、抗日战争历史、港澳台统战工作和海外统战工作历史、侨乡文化、边疆治理历史等统战历史文化课程纳入社会主义学院精品课程、核心课程体系建设，打造具有云南特色的统战历史文化课程品牌。另一方面，要统筹全省统战历史文化资源，建立现场教学示范课程体系。充分利用云南丰富的统战历史文化资源，根据云南革命历史、多党合作、民族团结、多宗教和谐等主题建设统战历史文化现场教学课程体系，依托不同发展时期留存下来的历史文物、遗址、旧址等历史文化遗产，发挥统战历史文化资源集群优势，推出一批主题突出、导向鲜明、特色明显的统战历史文化现场教学示范基地。把专题研究与现场教学结合起来，精准开展统战历史文化教育，用典型的历史文物、丰富的历史素材、生动的历史人物、感人的历史故事、鲜活的历史场景激发广大统一战线成员的爱国主义热情和民族自豪感。始终围绕政治引导、思想引导工作重点，广泛凝聚共识，增强党外代表人士对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目标的思想认同、价值认同、情感认同，筑牢团结奋斗的思想政治基础，让广大统一战线成员坚定历史自信，真正做到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充分发挥广大统一战线成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把统一战线人才荟萃、智力密集、联系广泛的独特优势与中心所在、大局所需紧密结合起来，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谱写好中国梦的云南篇章凝心聚力。

责任编辑：郭周静

沧源“班洪抗英斗争”红色文化历史意义 及其时代价值探究

——对“八月回信”精神内涵的学习思考

杨逸平

(临沧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云南 临沧 677000)

摘要: 1934年发生在沧源的“班洪抗英斗争”历史,正当其时地以“民族团结,保家卫国”的红色文化实现了一个新的丰富的契合点。作为中华民族申张正义,坚强团结,誓死捍卫民族尊严和神圣国土的红色文化资源“班洪抗英斗争”,深深地蕴含在各族人民的精神世界中,滋养着一代又一代临沧人以优秀的民族精神品质去履行“兴边富民,稳边固边”的职责和使命,并创造出许多可歌可泣的时代故事和英模事迹。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八月回信”为契机,更加积极深入地挖掘研究和学习“班洪抗英斗争”的意义和价值,对带领各族人民从思想深处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面对世界百年之大变局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征程,谱写更多更好的红色文化精神主旋律作品,创造更多更好的“民族团结进步,边疆繁荣稳定”的辉煌篇章,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教育意义和深远的实践指导意义。

关键词: 班洪抗英斗争; 红色文化; 历史意义; 时代价值

中图分类号: G1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2811(2022)02-0115-06

2021年8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专门给沧源县班洪班老边境村的10名老支书发来回信。他说:“了解到脱贫攻坚给阿佤山带来的深刻变化,感受到了阿佤人民心向党,心向国家的真挚感情,我很欣慰。”他殷切地“希望你们继续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引领乡亲们永远听党话,跟党走,建设好美丽家园,维护好民族团结,守护好神圣领土,唱响新时代阿佤人民的幸福之歌”。回信言简意赅、内涵深刻,饱含着历史与时代的强烈情感,对临沧边疆经济社会建设发展前途的要求和希望之真切,彰显了最高领袖与人民群众、党中央与基层党组织、国家治理现代化与云南边疆稳边固边、中国特色社会思想实践与边疆各族干部群众使命感责任感之间的特殊关系及深远影响。作为“班洪抗英斗争”事件发生地的临沧,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八月回信”为良机,在临沧市委的重视和领导下,做好“班洪事件红色文化精神发掘研究和宣传弘扬”的时代课题,讲好“临沧精神之班洪抗英斗争精神”必修课,为临沧“兴边富民,稳边固边”大业提供强大精神动力,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作者简介: 杨逸平,临沧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民族宗教理论。

一、“班洪抗英斗争”的民族精神内涵及其红色文化遗产价值

(一)“班洪抗英斗争”的历史和影响

1933年10月,英国出兵500余人向阿佤山北部侵犯,占领了茂隆厂炉房等地。面对英帝国主义的侵略,班洪王胡玉山毅然召集各部落王召开紧急会议,共商爱国抗英大计,各部落王剽牛盟誓,决定联合一致出兵三路,内惩民族败类、外逐英国侵略军,饮马滚弄江。1934年2月8日爱国抗英的“班洪事件”发生了。战斗持续了十个月,有44位佤族英雄儿女为保卫祖国边疆献出了宝贵的生命。班洪人民爱国抗英斗争得到了全国人民的声援,全国各大城市、海外华侨、留学生以结社、游行发表文告向国民党政府请愿等形式声讨英国侵略行径,同年6月,李希哲等人召集景谷、双江、澜沧、岩帅、勐角董等地自觉声援班洪班老抗英斗争的群众1000余人,组成“西南边防民众义勇军”,驰援前线,与佤族武装并肩战斗,把侵略者赶出丫口、炉房、南大等地。

80多年之后的今天,这一事件以红色文化资源的宝贵财富和不朽的精神力量支撑和激励着新的时代。“班洪抗英斗争”发生在中国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伟大历史节点上,虽然二者在革命的对象、时间的长度以及艰苦卓绝的程度等方面不同,但其在维护民族尊严、传承弘扬中华民族优秀精神品质以及为后代积淀红色文化基因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这一事件是中华民族历史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任何时候都必须承认,“班洪抗英斗争”不只是边疆局部抗击外侵的孤立事件,它从一开始便在全国范围内创造了民族团结统一、共同保家卫国的思想力量和实践影响。

(二)“班洪抗英斗争”红色文化遗产价值和其蕴含的民族精神

中华民族跟世界上其他的优秀民族一样,有着赓续血脉,不忘根本的传统品格,无论走到哪里,走得多远,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心中都会记得“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这种真正意义上的乡愁感。中华民族不但把生养自己的这块土地、这块土地上刻留着的祖先们的故事与自己生存的意义、价值、使命和前途命运如血肉般联系在一起,更把这块土地孕育出来的荣誉和情感与国家民族如血肉般联系在一起,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1. 沧源红色文化传统和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

“司岗里史诗”“石佛洞文化遗址”“沧源崖画”等一系列文化信息,记录着佤族、佤德语系民族以及当时的古濮人在临沧这片土地上生产生活的历史,一草一木,一水一石,都是他们生命的一部分,历经三四千年的岁月一代接一代地炼铸成民族根深蒂固的文化基因,支撑着民族共同的精神家园。我们今天所崇尚的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就源于此。《告祖国同胞书》中,十七佤族部落王写道:“世授中国抚绥,固守边疆,迄今数百年,世及弗替,我阿祖阿公世世相传,守土有责。已聚众鏖牛,拭泪商议,断指发誓,曰:吾侪佤山,虽地瘠民贫,亦有数千里之地,数十万户之民,宁血流成河,断不做英帝国之奴隶,即剩一枪一弩一银一妇一孺,头颅可碎,此心不渝。”^①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能够实现心灵的默契并焕发强大精神力量,凝聚攻坚克难意志并产生强大的吸引力和影响力的,就是民族文化的自信。2021年8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写给沧源佤族老支书的回信中说“你们最懂得边民富,边疆稳的意义”,要“率领乡亲们建设好美丽家园,维护好民族团结,守护好神圣国土”,高度肯定了云南边疆民族地区各民族干部、群众高举爱国主义和民族团结旗帜,始终致力于富民强边、稳边固边的优秀品质和精神文化,明确了“兴边富民,稳边固边”的责任使命及其文化力保障,同时也包含了保护研究和传承弘扬红色文化的

^① 段世琳:《班洪抗英纪实》,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98年,第16—17页。

时代要求。因此，我们有责任让社会去了解一个完整的“班洪事件”，把这一事件中所体现出来的民族优秀品质和文化精神发掘树立起来，作为中华民族精神谱系中的“班洪爱国精神”，彰显其应有的意义和价值。

2. 班洪抗英斗争史实和功绩摘要

“班洪抗英斗争”的故事告诉我们，有牢固的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基础，才能支撑住深厚的家国情怀和保家卫国的坚定的决心。中国作为民族众多大国，历经 5000 多年的发展历程，各民族却能够风雨同舟、患难与共，团结得像“石榴籽”一样，最宝贵的就是“共同体”的传统意识早已成为一种文化基因代代相承。十七部落王在《告祖国同胞书》曾写道：“云贵川康，息息相通，唇亡齿寒之祸，岌岌可危，此我同胞所当留意之。而佻瓦山银矿之富，曾大利于中国，今已闻于全世界。”在地图上都难找到的沧源班洪班老地方，在遭遇民族危难之时，当地少数民族同胞却义无反顾地向全国同胞发出充满民族气节和家国情怀的告同胞书，很快在临沧、云南、中国以及海外引发强烈反响。1934 年 3 月 21 日，中国旅京同乡会分赴中央政治局会议、国民政府、行政院、外交部等处请愿，并在《告全国同胞书》中写道：“班洪在滇缅南段未定界内，系我上葫芦酋首住所，为上葫芦地之一部，东界双江，西与缅甸接壤，北界顺宁、镇康两县之耿马、孟定两土司，南界澜沧县属之孟定土司，五金宝石美玉蕴藏极富，地本我有。敞会同仁等，籍隶云南，然察英人野心之叵测，深痛我国边土之屡失，本匹夫有责之议，抱不失寸土之心，誓死反对英帝国主义之侵略。”^①这是“民族共同，爱国爱家”精神的发声和后盾，支持班洪班老的阿佤人在 1934 年 2 月 8 日清晨群起反抗英国侵略，当天下午便一举收复丫口寨。之后四个月时间中，在被烧毁的 7 个村寨的焦土上，阿佤人靠采集野果树皮充饥，仍顽强抗敌。勐角董土司罕富民、镇康县长纳汝珍、澜沧县长旃德荣，亲率傣、汉、彝、拉祜、布朗各族人民运送粮弹。澜沧县盐商李希哲出数万元供购置武器，并召集景谷、临沧、双江、澜沧、岩帅等地群众组成“抗英义勇军”赴班洪援战，成功地驱逐了侵略者，保护了国土，捍卫了民族尊严，为 1960 年 10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缅甸联邦边界条约》在北京胜利签署作出了重要贡献。

3. 沧源抗英斗争的红色文化价值共识

感受“班洪事件”这一份爱国情怀和民族共同体意识，发掘、研究和利用好这一红色文化资源，正是以古鉴今、“学史明理、学史崇德、学史力行”的大事。研究“班洪抗英斗争”始末，评估其红色文化遗产价值，应当达成以下几点共识。

(1) 临沧生活着 23 个民族，其中 11 个是世居少数民族，长期处于原始宗教文化、佛教文化、基督教文化、伊斯兰教文化和儒家文化的交流交融交汇之中。认真研究和贯彻党的宣传思想工作方针政策，努力构建起临沧民族传统文化、红色文化、社会主义现代文化学习研究和教育实践体系，把红色文化的发掘保护、开发利用作为传统与现代文明之间的桥梁和纽带，始终保持各民族人民“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才能在千变万化的历史进程中，在重大历史关头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展的关键时刻，充分彰显中华文化的凝聚力、一致性和自信心。这正是“文化先行”的本意。

(2) 临沧是我国世居少数民族最多、跨境民族最多、直过民族最多、民族自治地方最多的地区之一，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民族团结好比“定海神针”和“压仓石”，民族团结的基础和力量决定着经济社会建设发展的速度和质量，民族的团结统一极有利于实现“兴边富民”，也可保证“稳边固边”。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在新的征程上，我们必须坚持

^① 段世琳：《班洪抗英纪实》，第 12—13 页。

大团结大联合,坚持一致性和多样性统一,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广泛凝聚共识,广聚天下英才,努力寻求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形成海内外中华儿女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生动局面,凝聚起实现民族复兴的磅礴力量”。^①

(3) 临沧 290 多公里边防线始终是临沧最大的责任和使命所在。长期以来,“抗英斗争”“抗日斗争”“缉毒、防疫斗争”以及“改革开放”“脱贫攻坚”等等都围绕着一个“边”字。

习近平总书记两次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和 2021 年 8 月 19 日给边境村老支书们的回信精神,都针对“国土国门边民”的区位现实,十分突出“兴边富民,稳边固边”的战略思想和实施方针。他对老支书们说“你们长期在边疆地区工作,最懂得边民富、边疆稳的意义”,包含了对各级党委政府和边疆民族干部的充分认可、信任和期许,提出了对各族人民弘扬红色文化传统,发挥党的模范带头作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边疆的新时代要求。

(4) 面对世界百年之大变局,面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征程,必须坚持开展和不断深化“党的光辉照边疆,边疆人民心向党”红色文化教育实践,牢固树立“心向党、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念,始终保持临沧边疆经济社会建设发展在党的领导下,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

二、赓续“班洪抗英斗争”文化精神,构建临沧红色文化宣传教育体系

习近平总书记说:“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这种精神是凝心聚力的兴国之魂,强国之魂。全国各族人民一定要弘扬伟大的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不断增强团结一心的精神纽带、自强不息的精神动力,永远朝气蓬勃迈向未来。”^②

改革开放 40 多年以来,特别是脱贫攻坚取得胜利后,我国一个民族也不少地摘掉绝对贫困帽子,临沧各族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日益增加。对于临沧朴素忠诚、勤劳善良和最懂得感恩回报的各少数民族而言,在好日子日新月异的背后,是精神世界中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无限热爱和红色文化的深厚积淀,是包括“班洪爱国精神”在内的红色民族文化精神的坚定和延展。只有认识到这一点,并挖掘引导和开发利用,在习近平总书记所要求的“建设好美丽家园,维护好民族团结,守护好神圣国土”,“建设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边民富,边疆稳”等边疆民族地区发展战略中加以弘扬和拓展,“三个示范区”,“现代化边境小康村”等一系列临沧发展举措才会获得磅礴的精神力量,攻坚克难,砥砺前行。沧源“班洪抗英斗争”史实,作为临沧红色文化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不通过问历史的时候讲一讲,游客来到班洪看一看,找得到的遗物展一展,访问佤族老人听一听的这种形式和状态,是体会不出也难留下其红色文化精神烙印的。有效的方法和路径必须探索以下几点。

(一) 延展性多义性建设临沧红色文化

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精神、红色文化精神、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精神是一脉相承的,也是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建设发展过程,所以我们认为红色文化是延展的。战争年代抗击外侵,和平时期稳边固边,抗疫抗洪的舍生忘死,脱贫攻坚不惜鲜血和生命,边关上的缉毒英烈和军警民共同守护国土……都建立在“爱国主义”,“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些红色文化基因之上,有

^① 人民日报评论员:《新征程上,必须加强中华儿女大团结》,《人民日报》2021年7月12日,第1版。

^② 《习近平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会上发表重要讲话》,2013年3月17日, <http://cpc.people.com.cn/n/2013/0317/c64094-20816352.html>, 2022年3月1日。

传统的弘扬也有时代的烙印，有历史的认可也有现实的认同才会产生传承和弘扬的意义。在此认识下，班洪抗英斗争，镇康永德为前线的抗日战争，茶马古道传播革命文化，张从顺、张子权父子为代表的缉毒英烈，用青春和生命脱贫攻坚的干部群众等等，共同形成了既有普遍历史意义也独具边疆民族特色的红色文化临沧体系，是一个正当其时的民族文化精神科研课题。

（二）发掘整理“班洪抗英斗争”文化资源，打造临沧红色文化特色品牌

精神产品与物质产品一样，品牌具有巨大的榜样力量，影响广泛而深远。品牌效应不是“雨过地皮湿的”一般宣传所能比拟的，而是真实立体全面地表达和呈现，不是只讲道理，而是生动形象地塑造精神来以文化人。譬如根据《班洪抗英纪实》介绍，从1934年2月16日班洪王胡玉山向云南第一殖边督办腾越李曰垓和第二殖边督办普洱杨益谦发出《告急救援书》，到同年4月4日《申报》发表系列专文，迅速传播到全国的“班洪爱国精神”的红色声音，其间的班洪十七王《告祖国同胞书》《告全国同胞书》，各地声援的、揭露英帝国主义侵略行径的、论证班洪班老国土权属的、号召国人保家卫国的各类专文，各地各民族武装和后勤支援沧源的行动，远远不是一个“班洪抗英遗址展览馆”可以完全讲述的红色故事，也难以彻底完善全面地阐发“班洪抗英斗争”的红色文化精神。期待各方面尤其是临沧的宣传思想、哲学社会科学、文化艺术工作者勇担责任和使命，撰写“临沧红色文化史诗”。

（三）健全完善班洪抗英斗争文化宣传阵地，发挥红色文化的教化作用

在“党的光辉照边疆，边疆人民心向党”教育实践活动的基础上，规范化，科学化，常态化进行红色文化学习教育活动是“功在历史，利在当代，义在将来”的事情。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提升中国理论。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更加充分、更加鲜明地展现中国故事及其背后的思想力量和精神力量”。^①规范化是要在充分调查研究和规范整理的基础上形成顶层设计，常态化是党内外干部群众应遵循学习教育机制，而科学化则要求充分把握文化传播的规律和方法技术，国内国际充分交流、交融、凝聚和形成共识，尤其是要以能歌善舞的少数民族喜闻乐见的路径和方法进行。因此，“临沧红色文化史诗故事”“临沧边疆红色文化旅游产业”“临沧红色文化电影电视及舞台艺术作品”应成为临沧努力攻坚的课题。应以此为标志，建设临沧红色文化创造创新的新发展格局，强有力地讲好临沧红色文化故事，发出临沧红色文化声音。

三、以古鉴今学史明理，发扬光大“班洪抗英斗争”精神

沧源“班洪抗英斗争”是临沧，也是云南和全国近现代史上抵抗外来侵略斗争史上重要的一笔，短短四个月面对面武装斗争折射出来的是中华民族千百年练就的伟大的家国情怀和团结奋斗精神。在今天，我们构建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新时代文化精神体系，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过程中，其内涵和价值是个永不褪色的“亮点”，昭示我们在“兴边富民，稳边固边”的一切工作实践中，把“班洪抗英斗争”所体现出来的民族精神，作为中华民族精神基因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以较高的政治思想敏感性和传承弘扬的热情，“敬畏而付诸虚心学习，学习掌握而作用于实践”。本文认为，主要围绕以下几个方面：

（一）抓点示范，融类旁通，营造教育实践大势

在临沧这块土地上，除沧源“班洪抗英斗争”以外，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来，发生过抗击

^① 《习近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并讲话》，2021年6月1日，http://www.gov.cn/xinwen/2021-06/01/content_5614684.htm，2022年3月1日。

侵略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等不同性质和规模的多次革命斗争，各族人民展现出值得敬仰和传承弘扬的优秀品质和精神。我们应该做和重视去做的就是以“班洪抗英斗争”精神学习传承为示范，充分挖掘和调动临沧各族人民中蕴含的革命文化基因，“有机统一，统筹部署，有力举措，营造大势”，真正体现红色文化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

（二）创造性转型，创新性发展，铸牢红色文化时代烙印

习近平总书记说：“了解到脱贫攻坚给阿佤山带来的深刻变化，感受到了阿佤人民心向党，心向国家的真挚感情，我很欣慰。”我们应该深刻地领会到总书记欣慰边疆民族地区跟全省全国同步实现脱贫的背后是发展理念的创新，为有效衔接乡村振兴发展战略奠定了基础，在老支书们的带领下，听党话，跟党走，把革命老区拥有的红色文化精神外化到“兴边富民，稳边固边”的建设发展当中。从这一层面的学习领会出发，我们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有效衔接乡村振兴战略，面对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研究“三个示范区建设”的发展路径和实践方法时应当总结认识到，“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在其中的积极推动作用。基层党组织，下派驻村的第一书记和驻村工作人员，脱贫工作者，缉毒、防疫工作者，国门国土安全工作中涌现出来的英模和带头人，对口支援边疆的人，捐款捐物救助贫困人口的人，回乡规划家乡发展的人，首先要把革命文化精神化作投身边疆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建设发展的实际行动，以榜样的力量引导各族干部群众弘扬“班洪抗英斗争”所体现出来的民族优秀品质和精神。

（三）加强党的建设，增强党的力量，提高党的领导能力

习近平总书记专门给沧源边境村老支书们的回信，已经鲜明地体现了新时代加强党的建设的思想。2017年10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届一中全会上指出“党和人民把历史重任交给我们，是对我们的高度信任和殷切期望。我们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恪尽职守，勤勉工作，以身许党许国、报党报国，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而奋斗”。^① 2021年8月28日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努力建设一支维护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态度特别坚决、明辨大是大非立场特别清醒、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行动特别坚定、热爱各族群众感情特别真挚的民族地区干部队伍”。^② 这要求我们在新时代党的建设事业中，赓续“班洪抗英斗争”的“民族团结，保家卫国”的红色文化基因，继承老支书们一生忠诚于党和国家的优秀品质和坚强意志，担得起“率领乡亲们建设好美丽家园，维护好民族团结，守护好神圣国土”的重任。要进一步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八月回信”精神，以此指导保护开发和研究利用临沧红色文化资源的实践。

责任编辑：郭周静

^① 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届一中全会上的讲话》，2017年12月31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7-12/31/c_1122191624.htm，2022年3月1日。

^② 习近平：《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1年9月1日，第2版。

云南中华文化学院举办学术沙龙 阐释“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云南中华文化学院于2022年5月30日举办了主题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学术沙龙。来自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云南大学、云南民族大学、省委党校、云南中华文化学院（云南省社会主义学院）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统战理论、中华文化、国际政治等领域的专家围绕主题开展热烈讨论，深度阐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这一重大命题。

专家们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作了系统、精辟的论述，站在时代的制高点上，揭示了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精髓要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深植根于中华文化的沃土之中，深刻汲取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蕴含的丰富哲学思想、人文精神、道德理念、历史智慧，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典范。这一思想凝结着中国人民的伟大创造精神、奋斗精神、团结精神、梦想精神，具有强大的历史穿透力、文化感染力和精神感召力，有效激活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焕发出新的勃勃生机。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提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的重大论断，这是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新的理论概括，深刻阐明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华文化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认真学习、研究和阐释这一重大理论命题，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专家从中华“大一统”与政治共识和文化认同的塑造角度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国家观，认为中国历史和文化贯穿着一条重要线索，就是追求团结统一的“大一统”传统。充分阐明这个重要传统，有助于更好地学习和理解习近平总书记的国家观。历经数千年的执政实践、制度建构和伦理教化，“大一统”最终形成一整套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领域的独特文明内核。对于当代中国而言，“大一统”有助于凝聚人们的政治共识，增强人们的文化认同。当前，我们要立足“两个相结合”与“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等重要论断，对中华“大一统”传统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努力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

专家认为，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高度，用“四个共同”阐述了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坚实的历史依据。中华“和”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蕴含“和谐共生”“求同存异”“多元调和”“和而不同”等思想观念和价值追求。中国自秦汉以来逐步发展为多元一体的统一多民族国家，各民族在历史发展过程中能够实现统一共存、和谐相处，中华“和”文化的力量不可或缺。新时代维护国家主权和疆域完整、书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培育中华民族新的时代精神仍然需要中华“和”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不断增强中华民族的主体性，超越各民族的差异性，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专家认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的“和”文化孕育了中国协商民主，中国协商民主发展了中国的“和”文化，以“和”文化为内核的中国协商民主可以为世界提供民主政治建设的“中国方案”。中国人崇尚和平、和睦、和谐的理念，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绵延五千余载的悠久文明，在这样的文化沃土上生长出来的协商民主制度，已经被历史和实践证明了是行得通、有生命力、有效率的，真正体现了民主的真谛，为世界其他国家推动民主政治建设提供了中国方案。中国这种提倡和平、和谐、和睦的价值追求，合作、参与、协商的实践精神，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理念，反映了各国人民的共同心声，凝聚着国际社会的广泛共识，其价值必将随着中国和世界的发展进一步彰显。

专家探讨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与古代“天人互益”观念的关系，认为“天人互益”是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科学态度，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从古代“天人合一”确定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关系，从“道法自然”中创造性提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命题，进而从“取之有度”提炼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思想，最终从“仁民爱物”把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归结于“民生福祉”，这一系统思想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和中国古代天人互益观的有机结合。

专家认为，在新时代新的历史方位下，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强调挖掘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等核心思想理念。专家探讨了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仁爱”“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理念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关系，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充分彰显了习近平外交思想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刻关联，体现了中国智慧、中国气度、中国力量，充分反映了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中国化”进路，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价值观指引和中国方案。

专家们认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突显了中华传统文化中治国理政的智慧，激活了传统文化本有的生命力和创造力，凝聚了中国力量、中国精神，推动了党的理论创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体系，增强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提升了中华文化的软实力，是名副其实的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它植根中华文化传统，赓续中华文化文脉，引领中华文化发展方向，蕴涵中国精神气质，体现中国精神价值，彰显中国精神力量。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一步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让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强大精神动力，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夺取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胜利。

（文字：陈友康 责编：郭周静）

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季刊,1999年创刊)

2022年6月 第2期(总第94期) 第24卷

主管:中共云南省委统一战线工作部

主办:云南省社会主义学院

编辑出版:《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编辑部

印刷:云南省人大机关印务中心

发行:《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编辑部

地址:昆明市五一路221号

邮编:650031

电子邮箱:ynsyxbbjb@163.com

出版日期:2022年6月20日

ISSN 1671-2811

CN 53-1133/D

JOURNAL OF YUNNAN INSTITUTE OF SOCIALISM

(Quarterly,Started in 1999)

Jun. 2022 No.2 (Sum.94) Vol.24

Responsible Institution:United Front Department of the
CPC Committee of Yunnan Province

Sponsor:Yunnan Institute of Socialism

Edited and Published by:JYIS Editorial Department

Printed by:Printing House of General Office of Yunnan
People's Congress

Distributor:JYIS Editorial Department

Address:No.221 Wu Yi Road,Kunming City,PRC

Post code:650031

E-mail:ynsyxbbjb@163.com

Published: June 20, 2022

ISSN 1671-2811



定价: 9.00元